

《货币战争》是表象，《资本之谜》是本质，
本书为你呈现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资本主义的
演进历程、运行规律及周期性经济危机。

资本之谜

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美) 大卫·哈维 著
陈静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资本之谜

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

资本主义从产生至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七大活动领域是如何相互作用，才形成了今天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不同的生活状态？经济危机又是如何周期性爆发的？政治、经济、自然，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关系？

作者带我们回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和起点：资本。

- ◎ 资本是一切经济社会的血液，正是资本的流动，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食物、衣服、房子和车子，探究资本运行的规律便显得如此重要。
- ◎ 对当前经济所受到的破坏和创伤有更深刻和透彻的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如何去修复它。
- ◎ 建立一个公平、负责任、人性化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世纪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世纪畅优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century-vision.com>



咨询投稿：(010) 88254199

sjb@phei.com.cn

责任编辑：马晓云

本书贴有激光防伪标志，凡没有防伪标志者，属盗版图书。

上架建议：资本主义经济

ISBN 978-7-121-13328-2



9 787121 133282 >

定价：39.00元

资本之谜

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美) 大卫·哈维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Copyright © 2010 by David Harve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ofile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Profile Books Ltd. 授权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46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 /（美）哈维（Harvey,D.）著；陈静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5

书名原文：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ISBN 978-7-121-13328-2

I. ①资… II. ①哈… ②陈… III. ①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7039 号

责任编辑：马晓云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25 字数：225 千字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译者序

2006年，克里夫兰和底特律等地低收入居民区被取消住房抵押品赎回权的比率突然出现跳跃性上涨，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毕竟，泥足深陷的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而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麻烦不断的。2007年中期，这一灾难性事件逐渐波及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白人中产阶级，美国政府及媒体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事态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和掌控。截至2007年年底，将近200万美国人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还有400万人则处在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这块阴云的笼罩之下。美国几乎所有地区的住宅价格都开始出现跳水，很多家庭发现他们承担的房屋贷款额甚至已经高于房子的市场价值。于是，人们选择放弃住房抵押品赎回权，这反过来又导致房屋价值进一步下跌。这一不断自我加强的过程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危及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风暴——人们称之为“次贷危机”。

和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通过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数据、剖析细节来试图找出危机的成因不同，本书作者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尝试——回归传统，研究资本的流动及其运动轨迹，借此找到“为什么会爆发这次经济危机”这个问题的答案。作者指出，资本要想通过循环和周转过程实现资本

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积累，必须要克服 6 个方面的障碍：原始资本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生产资料，包括所谓的“自然资源”的稀缺；不合时宜的生产和组织形式；生产过程的无效率；市场上有资金支持的有效需求不足。上述 6 条中的任何一条出现阻滞，都会破坏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最终就会导致危机的爆发。对于当前这场危机，本书作者认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出在信贷体系和国家-金融节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但实际根源却在于和劳方比起来，资方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并凭借这些权力压低工人工资，进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以及另一地区新生产能力的扩张所掩盖了。另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管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是不同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是这次危机得以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只有深刻、准确地解读世界各国当前所经历的波折与挫败，才能找出其应对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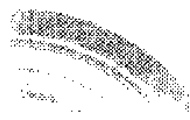
本书的翻译过程得到了要倩雅、王晓东、李琳、马小娇、田野、郝艳娜、王梓任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翻译中存在的不当与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前 言

本书是探究资本流动的。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之源，它像血液一样在其中流淌穿行，有时候像涓涓细流，有时候则波涛汹涌，并逐渐蔓延开来，不放过这个世界的每一点空隙和每一个角落。正是由于资本的流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才得以获得面包、房子、车子、手机、衣服、鞋子等各种生活必需品。正是由于资本的流动，在给人类提供娱乐性、教育性、支持性和精神性服务的过程中才创造出财富。正是通过对资本流动的各个环节征税，各国政府的政府职能、军备及保证国民高质量生活水准的能力才得以不断提升。如果资本的流动被阻碍、减缓，或者更糟糕的——出现停滞，那么我们将遭遇金融危机。那时，日常生活也将偏离我们熟悉和习惯的正常轨道。

弄清楚资本流动的规律及其曲折的轨迹，以及略显怪异的外在表现特征，对于我们理解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不同派系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对两个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即资本流动问题，以及如何判别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已经形成。然而，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逐渐偏离了这一重要的研究方向。相反，在铺天盖地的论文、报告和预测中，我们构建了复杂的数学模型，没



完没了地分析数据，一遍遍地研究数据表，剖析细节，将自己埋在有关资本流动的系统特征的所有概念中。

2008年11月，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诘问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大腕们为何没能预见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时(毫无疑问，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疑问，但是只有尊贵如女王，才有资格如此轻易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对方做出回答)，这些经济学家无言以对。在英国皇家学会的组织下，这些经济学家经过6个月的研究、反思，以及与主要决策制定者的深度对话，最后在写给女王的集体信中，他们也不过是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所谓的“系统风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迷失在了“隐瞒政治”(Politics of Denial)中。但是，他们到底在隐瞒些什么呢？

17世纪有一个与我同姓的科学家叫威廉·哈维，他被公认为首次准确、系统地描述了血液在人体中是如何循环的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医学工作者进一步发现了心脏病及其他疾病对人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害，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使人衰竭而亡。如果血液停止流动，那么生命也就终止了。毋庸置疑，我们现在对医学的理解要比哈维所能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但是，我们所有的医学知识依然构建在由他首次提出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上。

要想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面临的这场严峻的考验和动荡，在对资本流动的系统的本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商业巨头及政策制定者只能是要么重新实施一些传统的举措，要么应用一些后现代理念和方法。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结构性调整”计划或其他的伎俩(如突然将信用卡的收费增加一倍)，一些全球性信用机构及小打小闹者仍在贪婪地希望从世界各地的人们那里，不管他们有多贫困，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增加货币供给，甚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希望通过这种紧急输血治愈处于病态的经济。殊不知，这些经济体需要更彻底的诊疗和干预。

在本书中，我试图重现关于“资本流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问题的一些理解。如果我们能够对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受的波折与挫败做出深刻、透彻的解读，或许可以找到应对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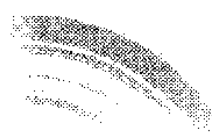
大卫·哈维

2009年10月于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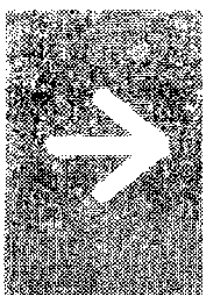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1 章 失衡的资本主义：2008 年的经济崩溃	1
源于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	2
走出危机的重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力的较量	13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信贷市场发展	17
金融市场暗藏的危机	22
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流动性过剩	28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34
第 2 章 资本的集中	42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资本循环和积累	43
国家政权与资本积累相结合	50
信贷体系参与资本集中：银行家的崛起	54
第 3 章 资本进入生产过程	60
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充足的劳动力	61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素：生产资料	69

自然资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	73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化	86
技术和组织形式不断创新	89
多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	101
第 4 章 资本进入市场	106
吃不下的大蛋糕：有效需求不足	107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多种成因	115
第 5 章 资本的演化	118
跌跌撞撞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119
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七大活动领域	121
七大活动领域相互作用、共同演化	124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穿插的运动和变革	130
第 6 章 资本演化的地域分布	137
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	138
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世界	141
资本运动的卫星云图	146
地理学准则一：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	152
地理学准则二：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155
地理学准则三：经济活动集中在某地区	158
资本地域分布的特殊例子：城市化建设	162
城市化成为全球性行为	168
城市建设中的获益者	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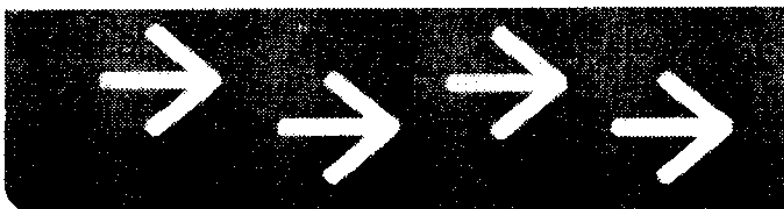


第7章 资本与资源	179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毁灭”	180
危机的另外一种解读：时空布局的错位	185
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与资本积累	187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区域组织方式	190
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191
战争造成的创造性毁灭	196
基于政治和经济两种逻辑的国家间力量对抗	198
危险的地缘政治	202
地理决定论	206
第8章 应对措施	208
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	209
谁将替代资本主义	216
充满各种可能的未来世界	219
以新的视角看待经济问题	226
弱势群体的反抗运动	230
有组织的变革运动	236
五种革命力量	240
新世界的呼唤	246



第 1 章 失衡的资本主义： 2008 年的经济崩溃

发生在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数次危机之所不及的。因此这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背景、影响都格外引人关注。



■ 源于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

早在 2006 年，美国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在包括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在内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低收入居民被取消住房抵押品赎回权的比率突然出现了跳跃性上涨。但不幸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都没有对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波及的对象是低收入群体，主要是非裔美国人、（拉丁美洲）移民或单身母亲家庭。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非裔美国人在住房贷款方面一直麻烦不断。1998—2006 年，在取消住房抵押品赎回权这一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他们因为参与所谓的住房次级贷款业务而造成的资产价值损失，据估计就已经高达 710 亿~930 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举措。就像里根政府时期爆发的艾滋病毒肆意横行一样，由于社会整体缺乏关注意识，当然还有偏见的因素作祟，相关方面未能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最终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文和经济灾难，被牵涉其中的民众数不胜数，损失惨重。

直到 2007 年年中，当取消住房抵押品赎回权活动开始波及美国南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及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各地的白人中产阶级时（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一些主流媒体也开始谈论事态的发展。很快，公寓和住宅群（通常位于“卧室社区”或城市周边地区）也开始受到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谷地的 3 个发展较早的城市被称为“卧室社区”，主要是教育程度不高的非技术人员和少数民族移民。——译者注）截止到 2007 年年底，将近 200 万人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还有 400 万人则处在丧失房屋赎回权这块阴云的笼罩之下。美国几乎所有地区的住宅价格都开始出现跳水，很多家庭发现他们承担的房屋贷款额甚至已经高于房子

的市场价值。于是，人们选择放弃抵押品赎回权，反过来使得房屋价值进一步下跌。

克利夫兰市看起来就好像遭受了一场“金融卡特里娜”飓风的侵袭，在贫穷的黑人居住区，被弃置、钉上了木板的房屋随处可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等镇，整条街道两旁都是空置的被房主放弃的房子；而佛罗里达州和拉斯维加斯市的公寓也大量闲置。那些放弃原有住房的人不得不另行寻找容身之地：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附近出现了由帐篷搭建而成的居住区。在其他地方，人们或者选择和亲戚朋友住在一起，或者把拥挤的汽车旅馆作为临时的栖身之所（见图 1.1 和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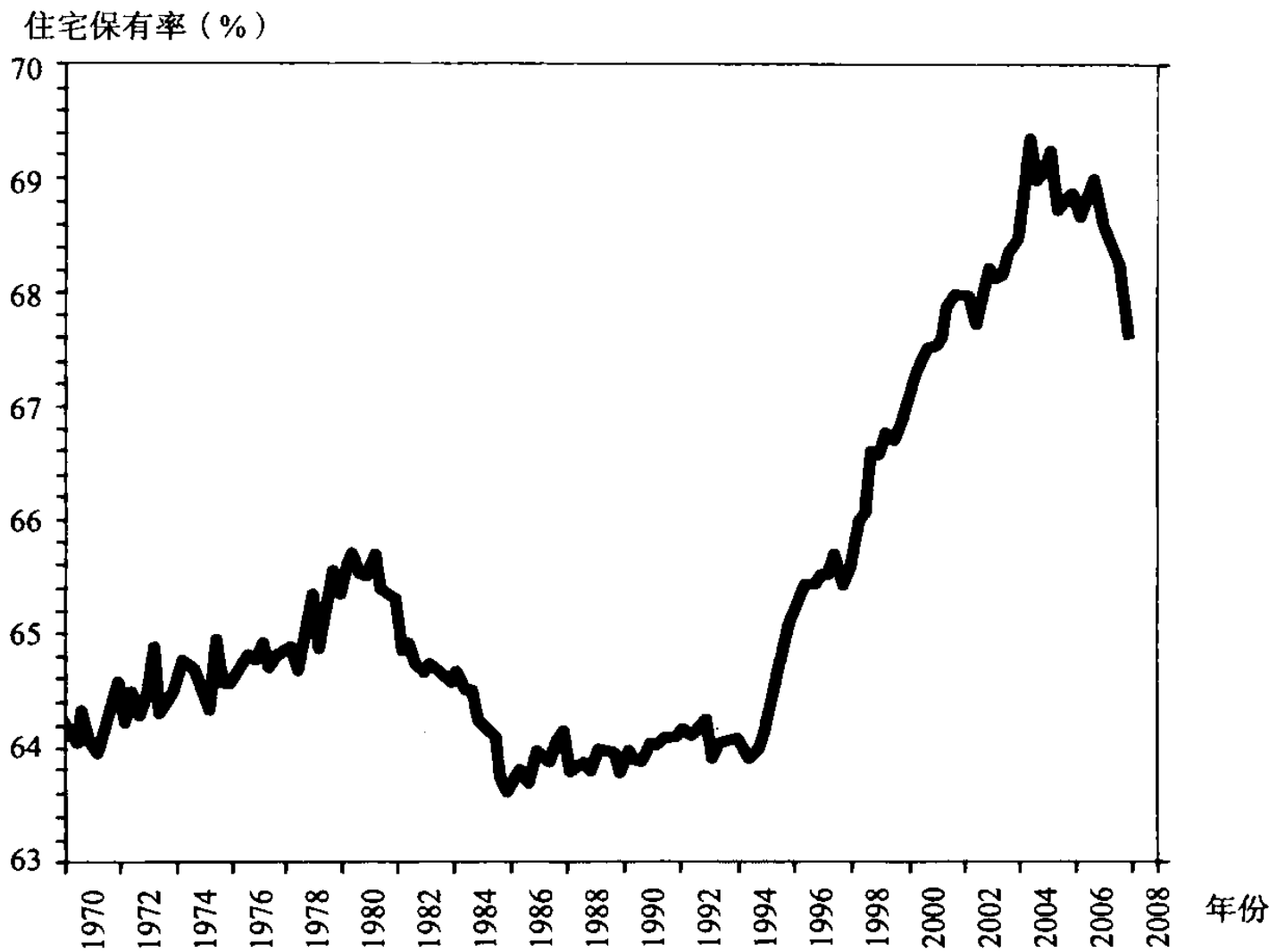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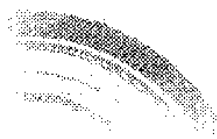


图 1.1 美国家庭住宅保有率（1970—2008 年）

最初，略有点奇怪的是，为这起抵押贷款灾难提供融资的幕后推手看上去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2008 年 1 月，华尔街的赢利破天荒地达到了 320



亿美元，几乎与 2007 年全年的赢利一样多。这是对他们摧毁全球金融系统的巨大回报！处在社会金字塔底层者的损失，几乎完全和处在金字塔顶层的金融大鳄们的所得相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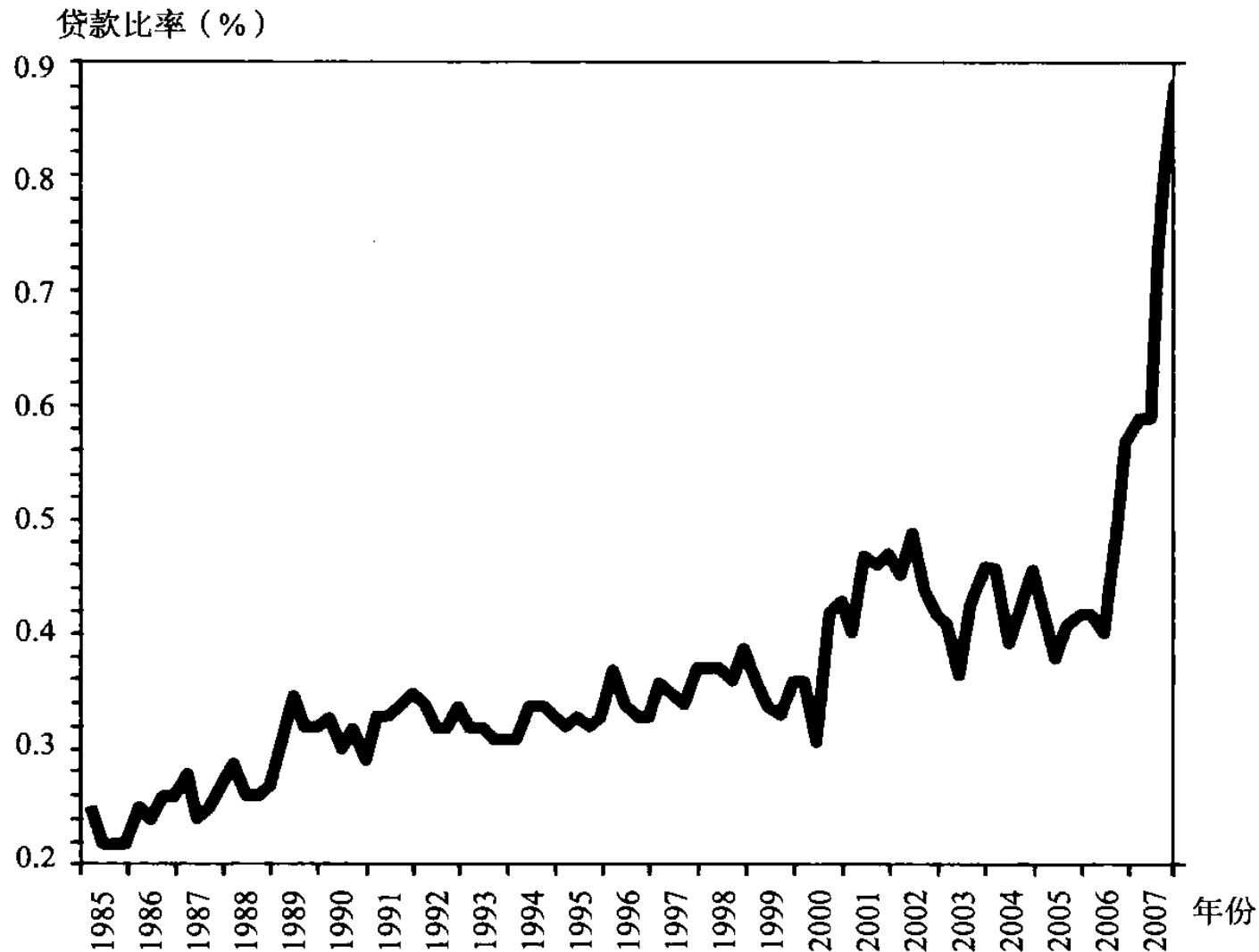


图 1.2 美国家庭住房抵押贷款被取消赎回权的比率（1985—2007 年）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次贷危机”——人们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正式称谓，引发了华尔街几家主要投资银行的覆没，整个行业重新洗牌，大量投资银行被兼并、重组或破产。2008 年 9 月 15 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一天，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全球信贷市场进入冰冻期，就像此前大部分借贷市场所出现的那样。正如美联储前主席、备受尊敬的保罗·沃尔克（5 年前，他和其他一些评论家一起，曾预言如果美国政府不强迫银行系统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那么金融海啸将是迟早的事情）所说：“事态恶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全球范围内步调是如此一致，可

谓前所未有。”到此前为止，世界其他国家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当然，英国是个例外，此前，其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问题，以致政府迫于无奈，不得不将最主要的一家房地产担保公司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国有化。而在这之后，其他国家也突然被牵扯进这起主要由美国金融体系崩溃所引发的“地震”中来。震源则是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它们或者被银行持有，或者被销售给了世界各地丝毫没有设防的投资者。每个人的行为表现似乎都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资产价格将永远处在上涨的通道里。

2008 年秋天，几乎足以致命的恐慌情绪从银行系统开始蔓延到资产抵押债券的主要持有人之中。美国政府出资创建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被国有化。“两房”的股东遭受重创，但是债券持有人（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益得以保全。全球各地那些丝毫不曾起疑的投资者——养老金机构、小型地区性欧洲银行，以及分布在从挪威到佛罗里达州这个广袤区域中的各地政府，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引诱而投资于“高收益”的证券化抵押资产，此时却发现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堆废纸，完全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甚至都没有能力支付员工的工资。使事情更加糟糕的是，像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的保险业巨头——它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银行的支付能力进行承保，面对庞大的理赔额，也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随着银行股东逐渐变得一文不值，股市也开始萎靡不振；养老金机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资金链开始断裂；市政预算大幅萎缩。整个金融体系都沉浸在一片恐慌之中。

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救助才能使各方对金融体系重新恢复信心。联邦基金利率基本上降低到零的水平。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不久，包括曾任高盛集团主席的财政部长在内的财政部官员、银行家及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经过商讨之后，撰写了一份 3 页的文件，提议对银行系统实施总额高达 7 000 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同时对市场宣战。

这一切看起来就好像华尔街和美国政府及所有美国人之间展开的一场金融大战。几周之后，在一条条的解释性说明和华丽辞藻的攻击之下，美国国会及总统乔治·布什终于还是屈服了，金钱如洪水一般，在没有任何约束性条件的情况下，流向了那些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

但是信贷市场依然没有解冻。一个此前看起来“流动性泛滥”（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的世界，突然发现自己深陷资金短缺的困境，而过剩产品则变成住宅、办公室及购物中心，同样处于过剩状态的还有生产能力，劳动力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都多（见图 1.3、图 1.4 和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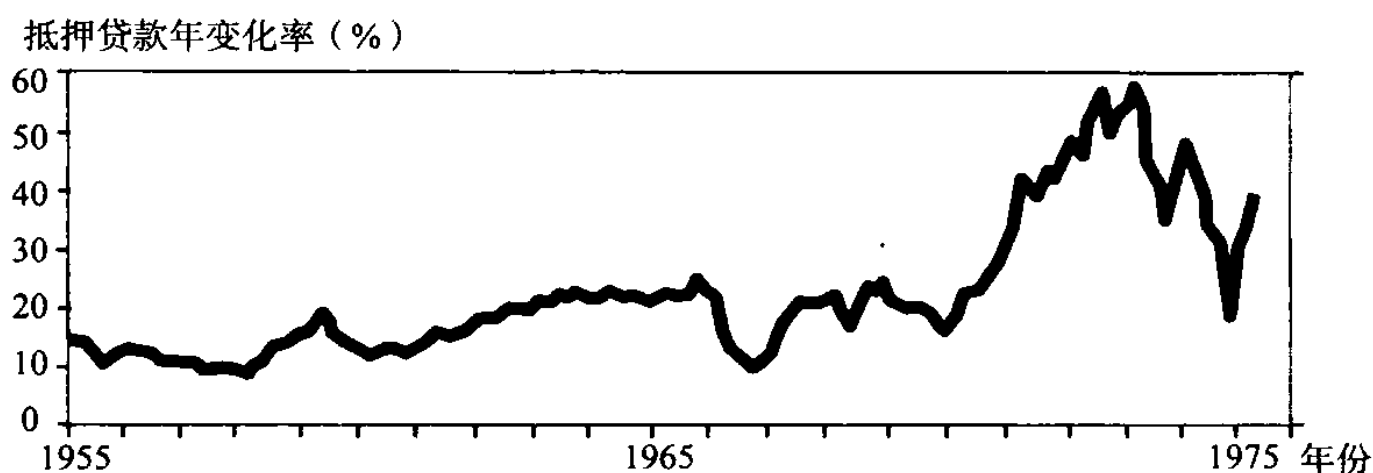


图 1.3 美国抵押贷款年变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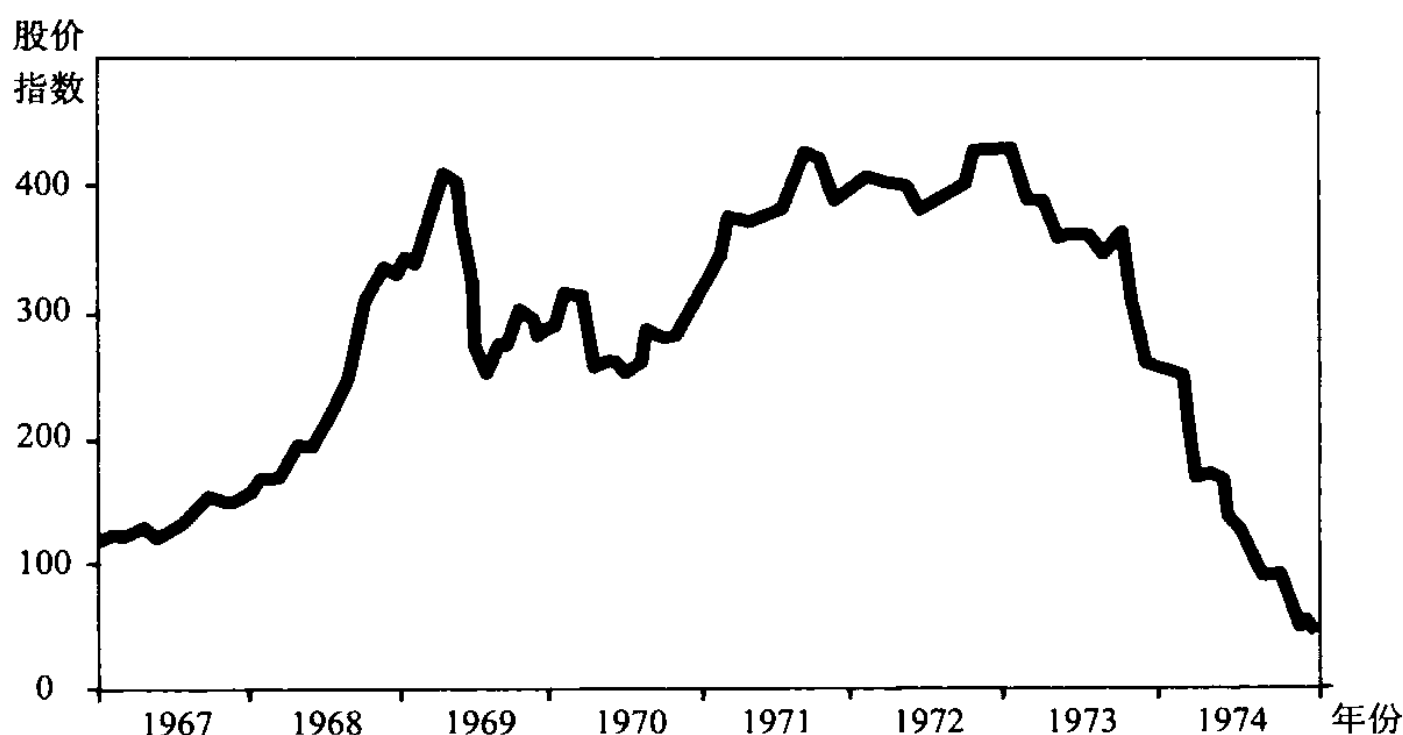


图 1.4 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股价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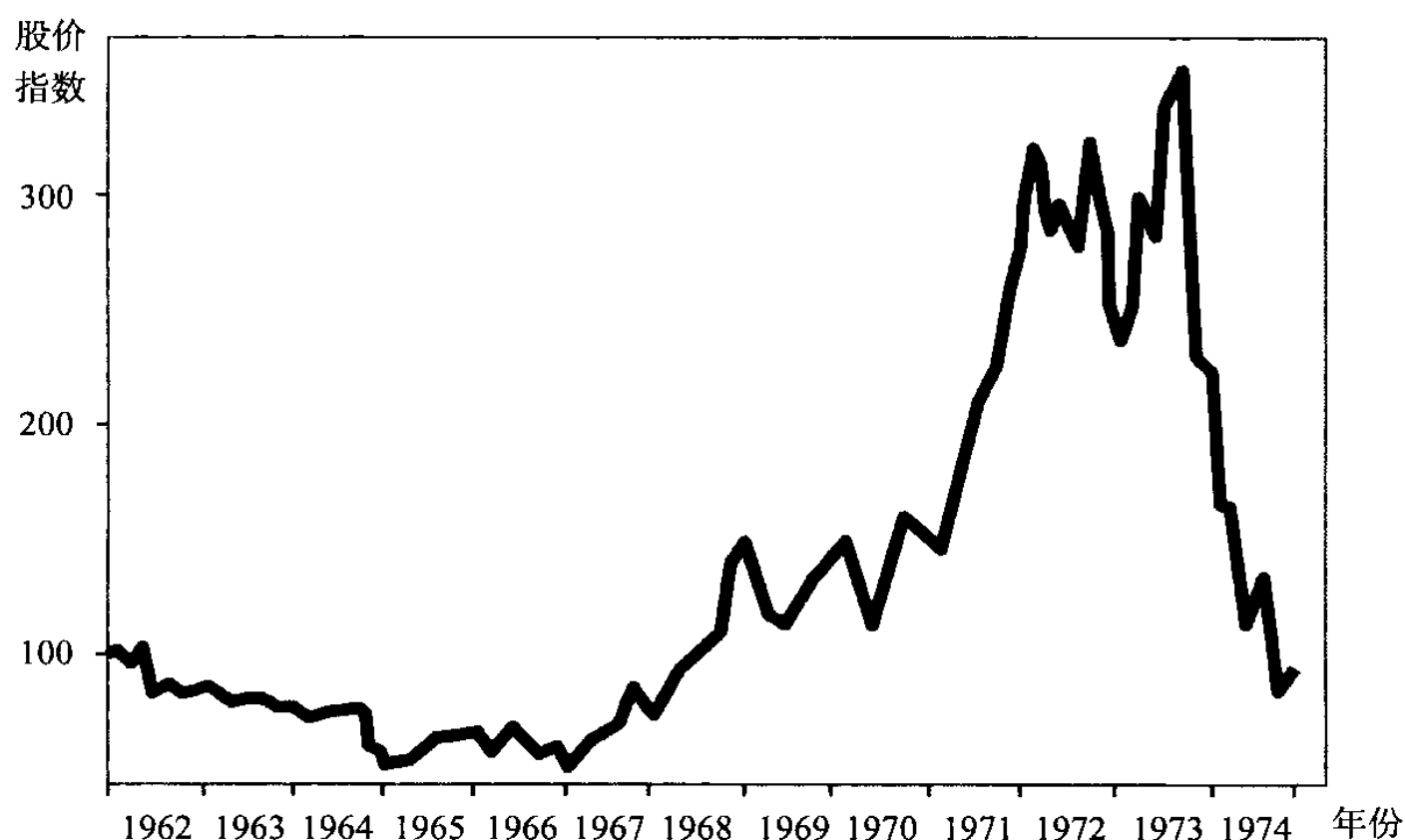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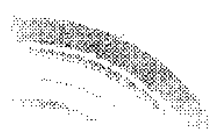


图 1.5 英国地产股价指数

2008 年年底，美国经济的每个组件都陷入了深深的麻烦之中。消费者信心下降，房地产业停止了一切开发活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商业零售额跌入谷底，失业率飙升，大量商店和加工制造企业关门歇业。甚至，美国企业中的中流砥柱，如通用汽车等，也濒临破产，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不得不临时组建了一个救助小组。英国的经济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欧盟各国也受到波及，尽管程度不一，其中西班牙、爱尔兰，以及不久前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冰岛的很多银行参与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冰岛甚至彻底破产了。

2009 年年初，一度凭借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或地区，出口贸易也开始急剧萎缩（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出口额在仅仅两个月内，就下降了 20%，甚至更多）。在短短几个月内，国际贸易额减少了 1/3，这给包括巴西和德国在内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原材料价格在 2008 年夏天一路走高，但是现在其生产商却发现价格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石油生产地，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湾地区，也陷入了麻烦之中。失业率开始以惊人的速度飙升。美国的失



业大军在几个月内就增加了 500 多万人（与前面提到的一样，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和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西班牙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了 17%。

截至 2009 年春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范围内损失的资产价值超过了 50 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各国一年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美联储则估计，美国家庭 2008 年一年损失的资产价值就高达 11 万亿美元。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银行将全球 2008 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设定为负数，自 1945 年以来还是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毋庸置疑，每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上述种种现象。但是，我们同样要把这些视为某种形式的金融危机的高潮，自上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以来（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经济危机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危害也越来越大。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给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带来巨大冲击，后来俄罗斯也未能幸免于难（1998 年俄罗斯曾拒绝偿还到期债务）；阿根廷在 2001 年也出现了地区性灾难，经济出现全面崩溃，进而引发政治骚乱，工厂被占领或接管，高速公路被堵塞，人们甚至组建了社区公社。就在同一年，美国的明星企业世通公司和安然公司倒下，其共同点是都牵扯了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活动，二者的倒闭和 1998 年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破产颇有几分类似，该公司管理层中有两位曾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此前，已经有大量迹象表明，日益为人们所熟知的“影子银行系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该系统位于场外金融交易市场，因而对其缺乏必要的监管，制度上的宽松使其自 1990 年以来的发展有如神助。

和 1945—1973 年为数不多的几次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 1973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经济危机多达上百次，其中一些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或城市化发展而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出现在 1973 年的春天，比阿拉伯产油国实行石油禁运进而导致油价高升足足早了 6 个月。这次危机的起源是全球房地产市场受到冲击，

大量银行遭到挤兑；此外，这次危机不仅使得市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例如，1975 年，纽约市政府在得到救助之前，理论上说已经破产了。更糟糕的是，很多州一级政府也深陷泥潭。日本经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持续繁荣伴随着股票市场的崩盘和土地价格的跳水（目前这一趋势仍在延续）而终结。在斯堪的纳维亚危机期间，瑞典银行系统于 1992 年被迫收归国有，这次危机的成因是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剩，它还波及挪威和芬兰等国。1997—1998 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则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等国家或地区的过度城市化，而国际炒家的大量涌入无异于火上浇油（见图 1.6 和图 1.7）。1984—1992 年，美国商业地产市场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储蓄与贷款危机，最终导致 1 400 多家储蓄和贷款公司及 1 860 家银行倒闭，给美国纳税人带来 2 000 亿美元的损失。这一状况给当时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威廉·伊萨克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1987 年他威胁美国银行家协会说，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他将采取国有化措施。通常来说，与对股市或银行系统造成直接冲击的短期、猛烈的危机相比，由于房地产市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故障而触发的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要更长一些。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房地产市场方面的投资具有贷款依存性、高风险、周期长等典型特征，一旦发现已经出现过度投资（迪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那么多年累积而成的金融混乱势必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扭转。

因此，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场灾难，除了其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外，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至于这场危机是否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统治地位的终结，答案取决于如何来定义“新自由主义”一词。

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是指自 19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形成的一股经济思潮，它标榜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定严苛的政策以重塑或巩固资本所有者阶层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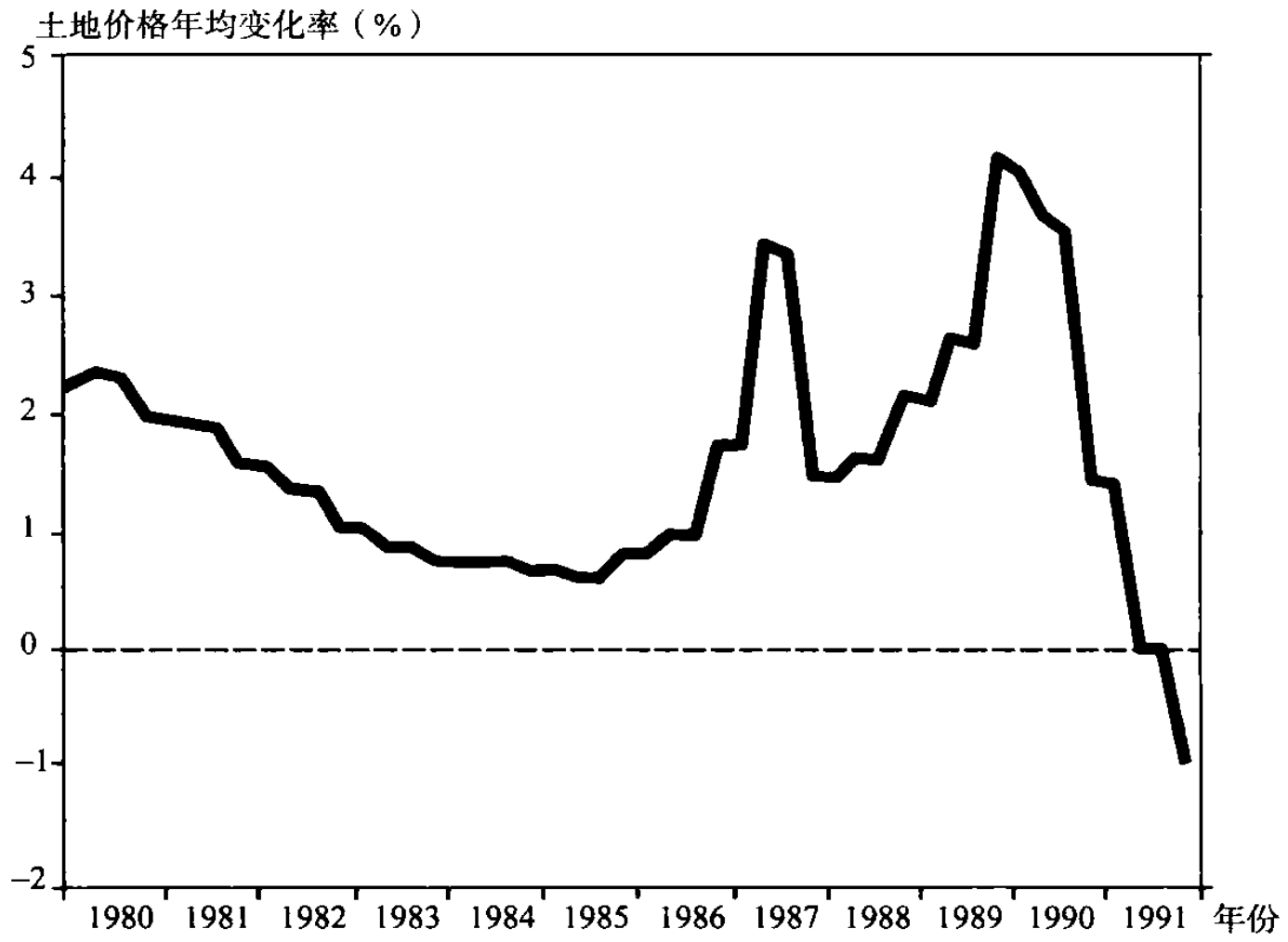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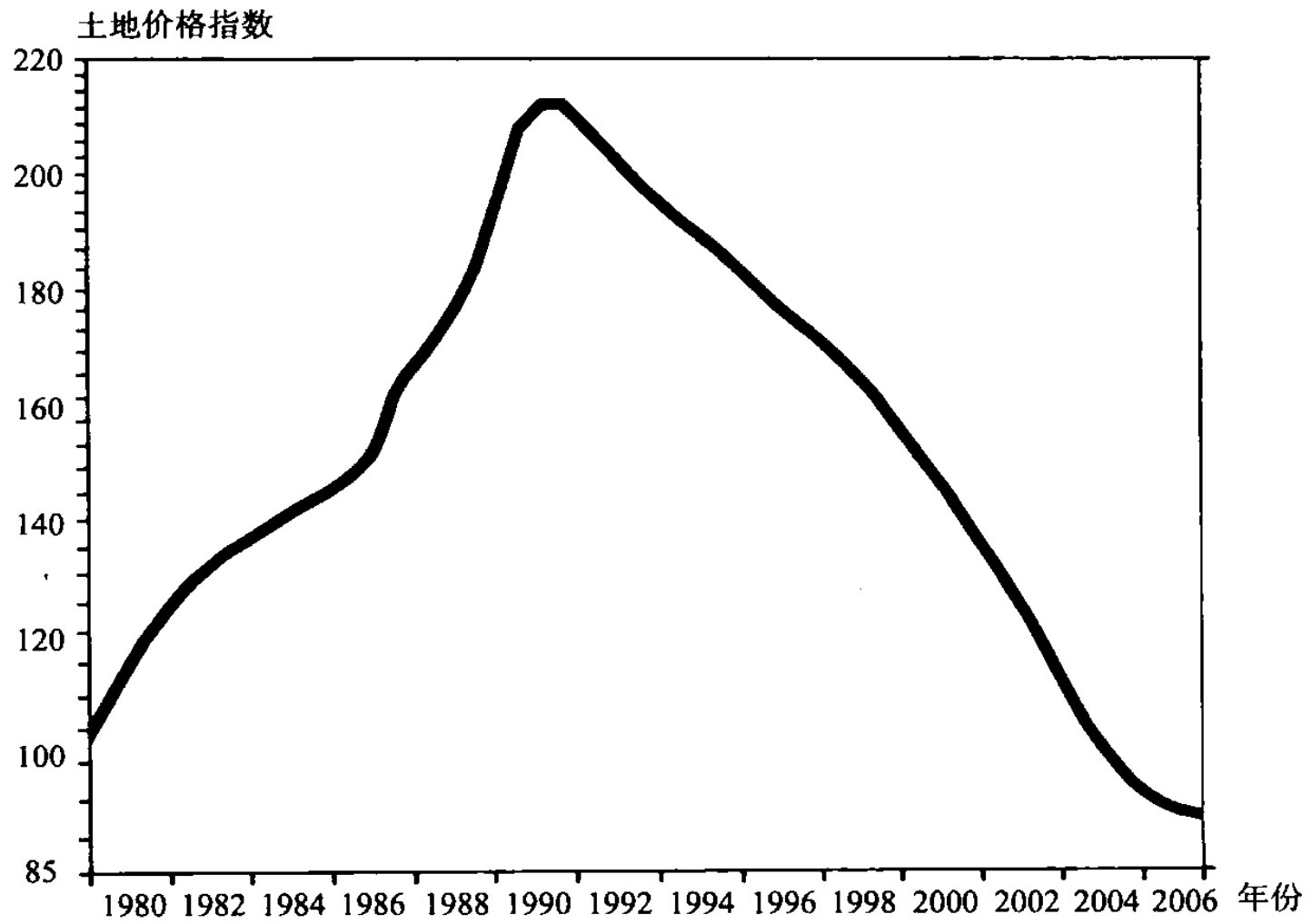


图 1.6 日本土地价格年均变化率



注：以 1980 年的土地价格指数为 100 计算。

图 1.7 日本全国平均土地价格指数

在那些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财富和权力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集中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衡量，这股思潮实现了既定目标，取得了莫大的成功。没有证据表明它将彻底终结。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政府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对金融机构进行保护。这一原则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纽约财政危机，明显与前面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干预主张相违背。但是，1982 年墨西哥信用危机期间，它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简单一点说，这一主张不过是：私人收益与社会风险的较量；拯救银行业，成本却由普通大众来承担。还是以墨西哥为例，1982 年实施金融救助之后，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接下来的 4 年时间里下降了 1/4。最后的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系统性“道德风险”。银行业绩极其糟糕，因为它们不必承担高风险行为造成的恶果，总有政府为其提供支持。当前针对银行业的救助措施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的力度更大，而且救助对象集中在美国。

就像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反应一样，今天我们所选择的路径将决定资本主义未来的演化特征。现有政策主张通过资本所有者阶层权力的进一步固化和集中化来击退危机。目前美国的大型银行机构不过区区 4~5 家，但是华尔街仍然有很多企业渴望能够拨云见日。例如，Lizard's 是一家专门从事并购重组业务的公司，其获利速度非常快；另外，高盛公司的表现也一直都很出色，现在，很多人都开玩笑说高盛与其叫 Goldman Sachs 倒不如改叫 Government Sachs，因为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反映其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力。当然，毫无疑问一定会有一些富豪在这次危机中败下阵去，但是正如安德鲁·梅隆（美国银行家，1921—1932 年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所言，在经济危机中，资产会回流到它们真正的主

人手中，如梅隆本人。他的这句评论一度非常流行，所以，现在又到了资产重新寻找主人的时候了，除非受到某种政治力量的阻挠。

经济危机的作用之一，是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从非理性状态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它们引导资本主义经济体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投资领域和阶级权力的新形态。但是，美国政客一直以来都奉行金融实用主义，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在。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顾问无一例外地属于保守派：拉里·萨默斯，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长的時候，也恰逢放松金融管制的要求达到巅峰；蒂姆·盖特纳，现任财政部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负责人，他和华尔街关系十分密切。不管民主党和共和党哪一个上台，“华尔街党”——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称呼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来自纽约的民主党议员查尔斯·舒默近年来从华尔街获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赞助，用做他自己及整个民主党的竞选活动经费。

克林顿政府时期对金融资产进行竞价的幕后推手现在成了幕后掌权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对美国的金融框架进行重构，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但问题是，他们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进行重构。他们会对银行实行国有化，将其转变成为民众服务的工具吗？又或者就像《金融时代》上的文章所呼吁的，将银行转变成受到监管的公共企业？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当权者会不会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解决银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把它奉还到那些使我们陷入当前困境的利益阶层手中呢？事实上，这将是事态最后的发展方向，除非政治上出现强有力的反对声音。在华尔街的边缘地带，一些“小型投资银行”已经蓄势待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接替雷曼或美林的地位。与此同时，那些幸存下来的大银行也正在积蓄资金，希望回到危机前的高红利时代。

走出危机的重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力的较量

我们能否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走出这次危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依赖于有多少普通民众会站出来高喊：“够了，够了，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即便是最普通的管道修理工，也有权利这么说。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大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没有实质性提高，同一时期，资本所有者阶层却积累起巨额财富。工人阶级没能分享到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我们已经忍受了 30 多年的工资增长停滞（见图 1.8、图 1.9 和图 1.10）。为什么会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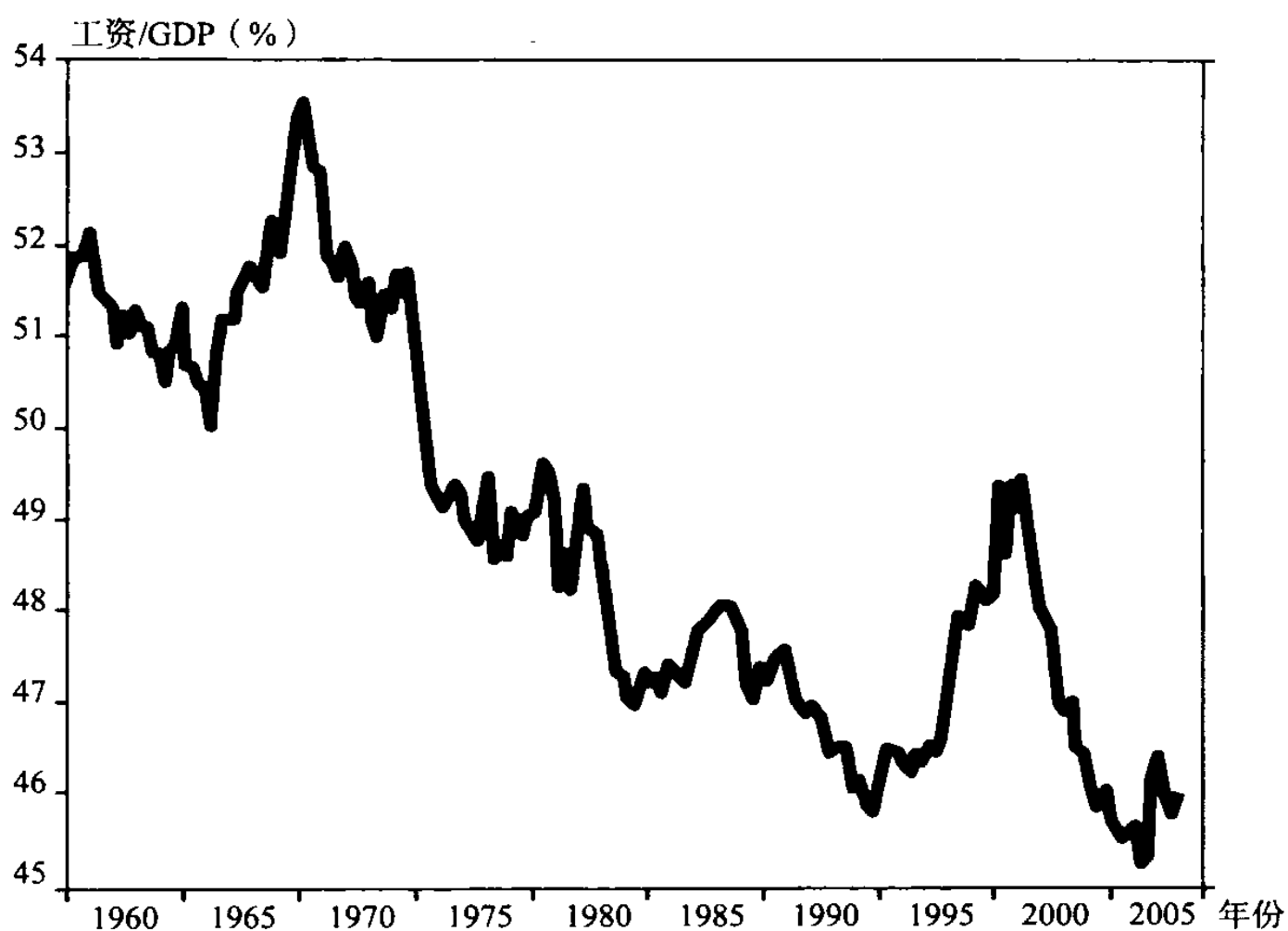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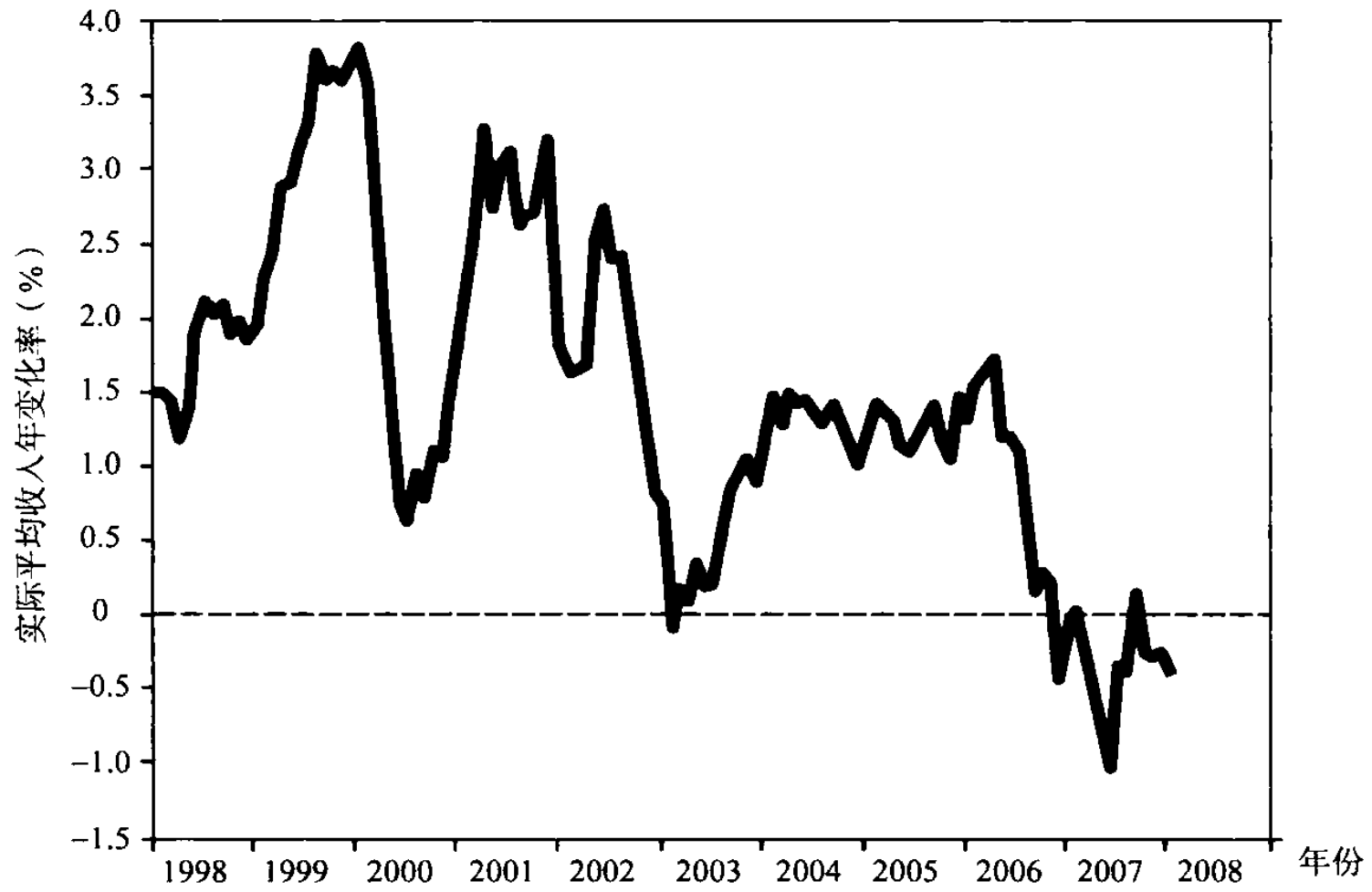


图 1.8 美国工资占 GDP 的比率



注：图中数据是年变化率，3个月的移动平均值。

图 1.9 英国人实际平均收入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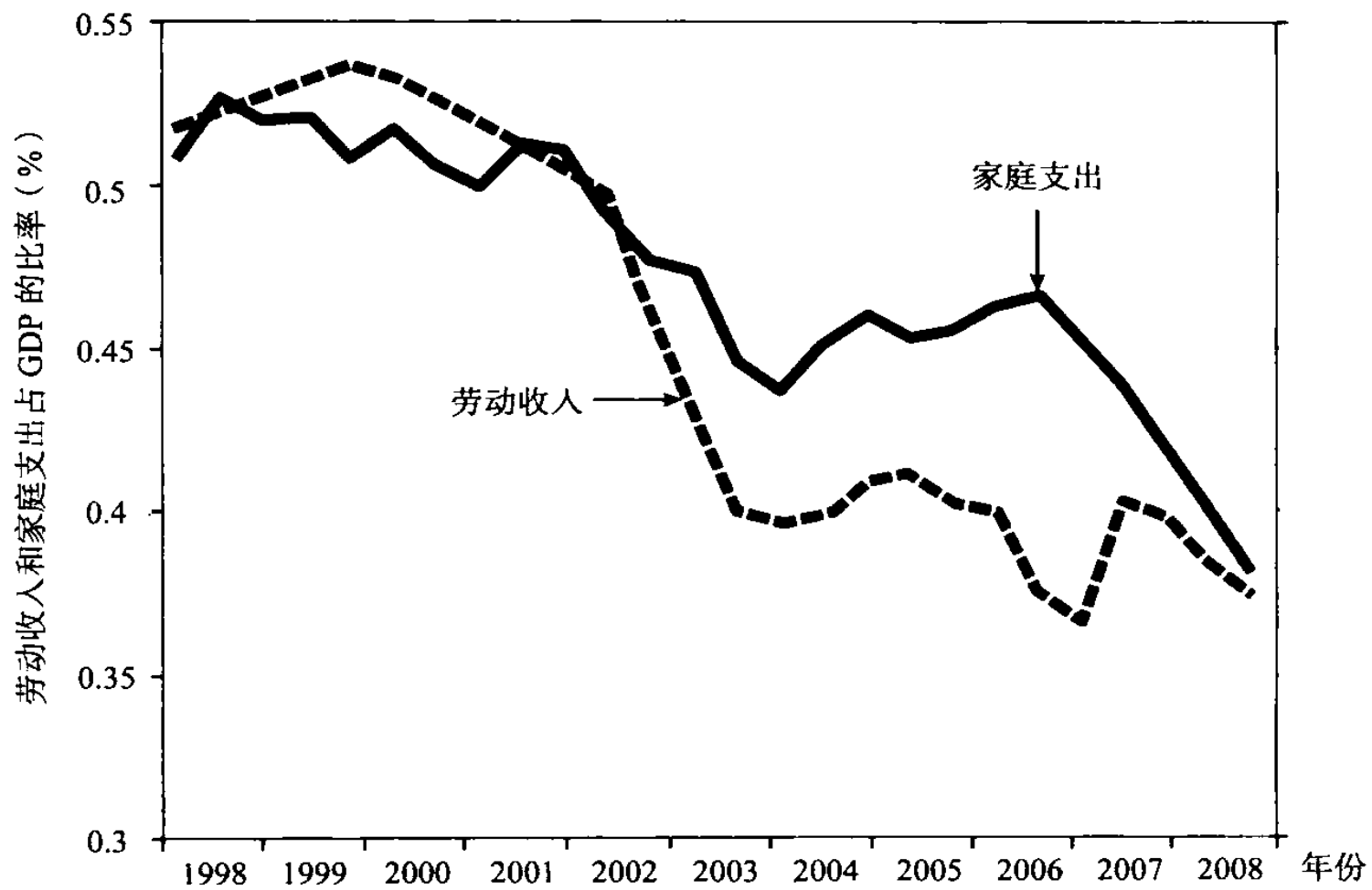


图 1.10 中国人劳动收入和家庭支出占 GDP 的比率 (1980—2008 年)

20 世纪 60 年代，对可持续的资本积聚及资本家阶层权力的固化来说，最主要的一个障碍就是劳动力因素。当时，不管是欧洲大陆还是美国，劳动力都处于紧缺状态。劳工被很好地组织起来，得到了合理的、可观的报酬，并且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是，资本需要的是成本低廉、性格温顺的工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选择。

方法之一就是鼓励移民。1965 年通过的《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废除了原有移民法中的种族主义因素，使美国资本得以和全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相结合。此前，只有欧洲人和白种人才拥有移民到美国的特权。20 世纪 60 年代末，法国政府对来自北非的劳动力输入进行补贴，德国从土耳其引入了大量的劳工，瑞典成为南斯拉夫的主要劳务输出国，而英格兰则主要依靠其过去的殖民地来缓解国内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方法之二是研制劳动节约型技术。例如，汽车生产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就大大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这类技术出现，但是遭到了来自劳工组织的极力反对，它们坚持要求履行生产率协定。此外，垄断集团势力的增强也弱化了人们对新技术的追逐，因为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通过制定较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引致了温和的通胀），这也是底特律汽车产业的“三巨头”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惯用手段，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它们的垄断地位才被打破。鼓励竞争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成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向更大程度的竞争的回归迫使企业不得不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即便前述两种方法都失败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像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及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这样的人物早已蓄势待发，他们秉持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随时准备利用国家权力对劳工组织进行破坏。在这一过程中，皮诺切特和巴西、阿根廷的领导人借助了军队的力量。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则和大型劳工组织展开了面对面的碰撞：1981 年美国航空管

制工人举行罢工，里根使出铁腕手段，声明罢工使得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要求工人们两日内必须复工，并解雇了没有执行其指令的 1 万多名工人；成功制服煤矿工人及印刷工人马拉松式的大罢工则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兰·布德后来承认：“20 世纪 80 年代所谓通过紧缩政策及减少公共支出来消除通货膨胀的说法，不过是为了掩饰对工人的打击。”这样形成一个“产业后备军”来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帮助资产阶级自此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利润。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截止到 1982 年，失业率在打击通货膨胀的名义下一路飙升到 10% 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工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贫困人口的职业率及入狱率不断上升，截止到 2000 年，被判入狱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200 多万人，逐渐上升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当然，资本也可以选择到劳动力充足的市场中去。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情景随处可见，从巴巴多斯到孟加拉国，从墨西哥的华雷斯到中国的东莞。其结果是，无产阶级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大，“传统”自给自足式社会的瓦解，以及全球范围内女性的贫困化。据统计，全球范围内女性被迫做佣人或从事卖淫的多达 20 亿人，她们涌入城市，住在肮脏混乱、条件极为恶劣的贫民窟，每天赚取的薪酬却不足 2 美元。

面对资本过剩的局面，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企业就已经开始尝试在国外从事投资生产活动，但是直到 10 年之后，到海外投资才逐渐成为一种风潮。美国企业在世界各地，通常来说是劳动力和原材料都比较便宜的国家，投资建厂生产零部件，然后将这些零部件在美国进行组装，并销售到临近的市场中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际汽车”或“国际电视机”开始成为稀松平常的事物。资本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和低

廉的劳动力实现了完美联姻。

与“全球制造”相伴而生的是交通运输部门的再造，这一过程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集装箱这种伟大的发明使得在巴西生产的大大小的零部件可以运到底特律并组装成汽车。新的通信手段使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巴黎时装店发生抢劫事件的消息，通过中国香港的糖果店，几乎可以马上传到曼哈顿。人为设定的贸易壁垒，如关税、配额等大大削减。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首先要创建一个全球性金融框架，使得资本可以顺畅地流入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放松金融管制的潮流在 1986 年之后进一步强化，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则发展到了势不可当的程度。

现在，对资本来说，劳动力的可得性不再是问题，但是在过去的 25 年却不是这样的。不过，一旦工人丧失了权力，就意味着他们只能接受低工资，而贫穷的工人阶级显然算不上一个有活力的消费群体。因此，持续的工资压抑带来的问题就是，相对于企业持续扩大的生产能力而言，工人的购买力，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看起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积聚的障碍之一——劳动力短缺，得以克服，但是以带来新的障碍和问题（即需求不足）为代价的。那么，又该如何解决第二个难题呢？

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信贷市场发展

工人阶级获得的工资与其可以支配的数额之间的“缺口”通过信用卡业的蓬勃发展及不断增加的信贷额得到了弥补。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每个家庭的平均负债是 4 万美元（以定值美元衡量），但是现在，如果把抵押贷款也计算在内的话，这一数字上升到了 13 万美元。美国家庭的债务飞



速增加，不过这首先要求有金融机构愿意为这些收入水平没有实质提高的工人家庭提供贷款服务。最初，这些服务的享有者仅限于有稳定收入的群体，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金融机构不得不寻找新的市场，因为眼前这个市场太小了，很快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这一次，金融机构的触角伸向了低收入人群。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企业都被施以政治压力，要求它们对每个人放松贷款的限制条件。于是，信贷额度极度充裕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放贷，即便它们的贷款对象根本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毕竟，如果没有贷款的话，身负债务的房地产开发商正在建造的那些精美的洋房、漂亮的公寓又该卖给谁呢？就这样，金融机构通过同时向开发商和消费者放贷，暂时弥合了需求的不足。换句话说，金融机构左手控制着房屋的供给，右手操纵着房屋的需求（见图 1.11 和图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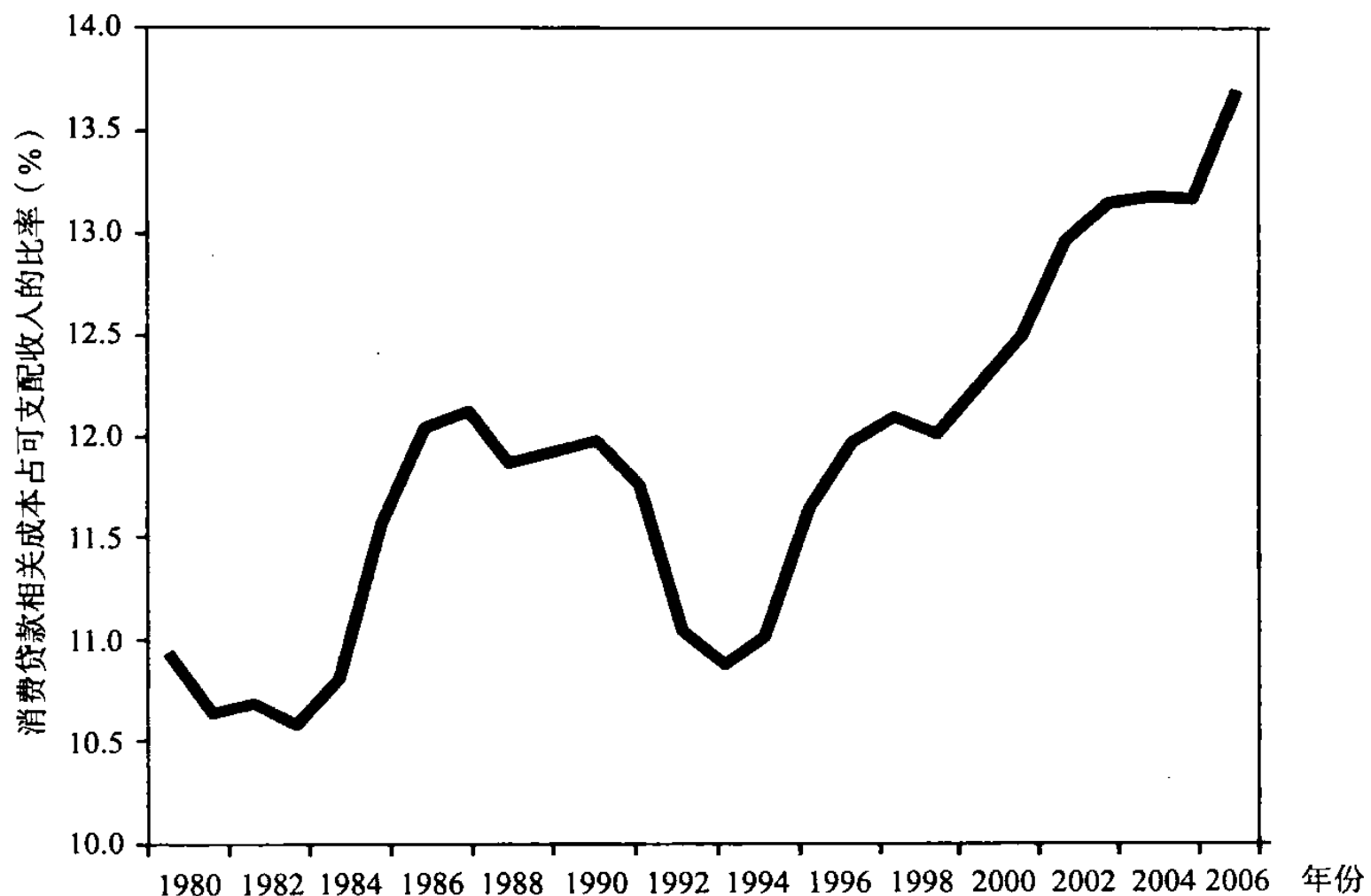


图 1.11 消费贷款相关成本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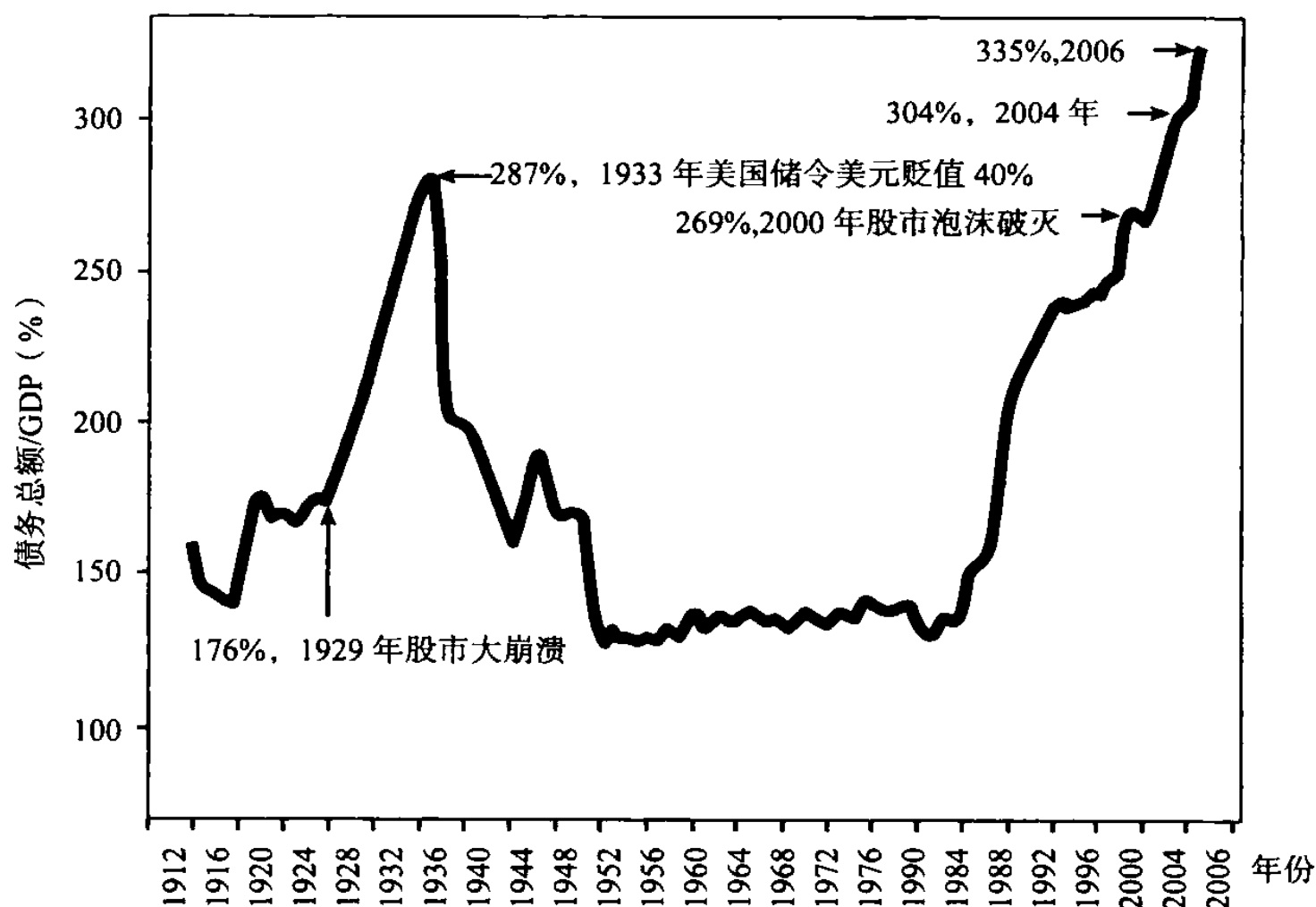


图 1.12 美国债务泡沫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消费信贷领域，大到汽车、锄草机，小到在玩具反斗城或沃尔玛为家人和朋友购买圣诞节礼物。显然所有这些贷款都属于高风险性质，但这一切都通过所谓的“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手段得到了很好的处理，通过贷款的证券化，金融风险得到了分散，甚至可以给人们造成风险已经完全消失的错觉。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金融资本开始大行其道，但是似乎并没有任何人想要阻止这种状况，因为相关人士看起来获利颇丰。与此同时，华尔街对政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还记得比尔·克林顿总统就职时提的那个问题吗？“你们是想告诉我，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我的连任取决于美联储和几个该死的证券交易员吗？”

有限需求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即资本的输出和在世界范围内培育新的市场。其实这种做法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纽

约投资银行从墨西哥湾沿岸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却因为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而头疼不已，美国国内所有的可获利项目都已经被充分挖掘了，于是它们开始向墨西哥、巴西、智利、波兰这些国家大规模放贷。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正如著名银行家、花旗集团总裁沃尔特·瑞斯顿所认为的，是因为国家永远都在那里——一旦有环节出现问题，你总是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到它们。

麻烦很快就找上门来，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79年当利率提高之后，主要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的40多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出现了问题。1982年，墨西哥威胁说要宣布破产，作为应对之策，美国马上决定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警察”身份，而短短一年以前，也就是在1981年，里根政府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曾试图令其解体。美国意在让IMF敦促不发达国家如实履行债务偿还义务，以保证美国的银行机构可以安全收回贷款。于是，在IMF的主导下，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债务重组”运动，要求债务国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节约资金以偿还贷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银行在国际上从事放贷业务时的“道德风险”大大增加。而且这种不顾风险的做法一度还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纪念墨西哥债务危机20周年大会上，来自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将银行大肆放贷的行为推崇为“提升人们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信心、促进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市场扩张、引领美国经济走向繁荣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所谓的救助说得简单一点不过就是对银行业施以援手，压迫普通民众为银行家欢天喜地地工作。

不过，要想让这一切真正奏效，首先就要在全球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内部关联系统。在美国，关于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逐步放松。在此之前，除投资银行之外（法律将投资银行和储蓄银

行明确区分开来)，所有的银行都只能在某个州的范围之内从事经营活动，而抵押贷款服务则不属于储蓄银行的业务范围，只能由存款和贷款公司提供。但是，和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一样，国际上的合作同样被认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导致了 1986 年全球股票与金融交易市场的互联。“大爆炸”是当时人们对这次股票交易改革的称呼，它将伦敦、纽约及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金融交易市场联结在了一起。就这样，银行终于可以自由地在世界各国开展业务活动。截止到 2000 年，墨西哥的大部分银行为外资银行，汇丰银行随处可见，它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别称叫“你身边的国际银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资本流动的技术壁垒和逻辑壁垒确实被大大降低了。资本随意在各个国家游走，等待或搜寻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机会。1999 年，美国彻底打破了投资银行和储蓄银行之间的界限，此前的分业经营模式是由 1933 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的，于是，银行业进一步整合为一个拥有不可忽视的金融影响力的庞大网络。

但是，随着金融系统的全球化发展，以伦敦和纽约为代表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也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一些国际银行，如高盛、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等的分行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内部竞争。举例来说，假如伦敦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比纽约略微宽松的话，那么伦敦分行将比纽约分行得到更多的业务。由于其逐利性，资本总是会流向管制最为宽松的市场，因此，政府部门面临的要求放松管制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 2005 年发布的一次报告中就曾经提到，美国对金融机构的过度监管已经危及纽约市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华尔街的每个人，以及国会中的“华尔街党”也都曾表达过类似的抱怨和不满。

■ 金融市场暗藏的危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低工资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得富有者变得更加富有。这通常被认为是对社会有利的，因为那些富有的人将进行新的投资，当然，首先要满足他们大肆消费的欲望。没错，他们确实进行了投资，但是不一定是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投资于各种形式的资产。例如，他们把钱投入股市，于是股票价格上涨，这反过来又刺激他们把更多的钱用于购买股票，完全不理睬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业绩表现究竟是好是坏。还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关于道琼斯指数将上涨到 35 000 点的预言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没有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金融骗子存在，股票市场本身也带有庞氏骗局的性质（庞氏骗局描述金融市场中由于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而导致的投机性泡沫不断扩大并最终破灭的过程。——译者注），这是由其内在结构决定的。那些富有者选择的投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从股票、房地产、矿物资源、石油及其他商品期货到艺术品，不一而足。通过出资建造博物馆或为各种文化活动提供经费，他们把投资的触角伸到了文化产业，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所谓的“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备受各大城市推崇的发展战略。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能获得的赞助费大约减少了 1/3（参见图 1.3 和图 1.4）。

各种新奇的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也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影子银行系统的前身，在这些市场中，人们从事信用换汇、货币衍生品等诸如此类产品的交易活动。而在期货市场上，几乎所有人们能够想到的东西都可以进行交易，从排污技术专利到关于天气预报的打赌。1990 年时，这些市

场的总价值还几乎为零，但是到了 2005 年，这一数字飙升至 250 万亿美元（当时全球的总产值也不过区区 45 万亿美元），2008 年则可能进一步达到 600 万亿美元（参见图 1.15）。现在，投资者不仅可以就资产的衍生品进行交易，甚至有一天可能连资产衍生品的保险合约的衍生品都会成为他们的投资对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冲基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自然也给基金投资人带来了相当丰厚的回报。而那些管理对冲基金的人也完成了财富的积累。2007—2008 年，很多对冲基金管理者的年薪超过了 1 亿美元，而那些表现卓越者的年薪高达 3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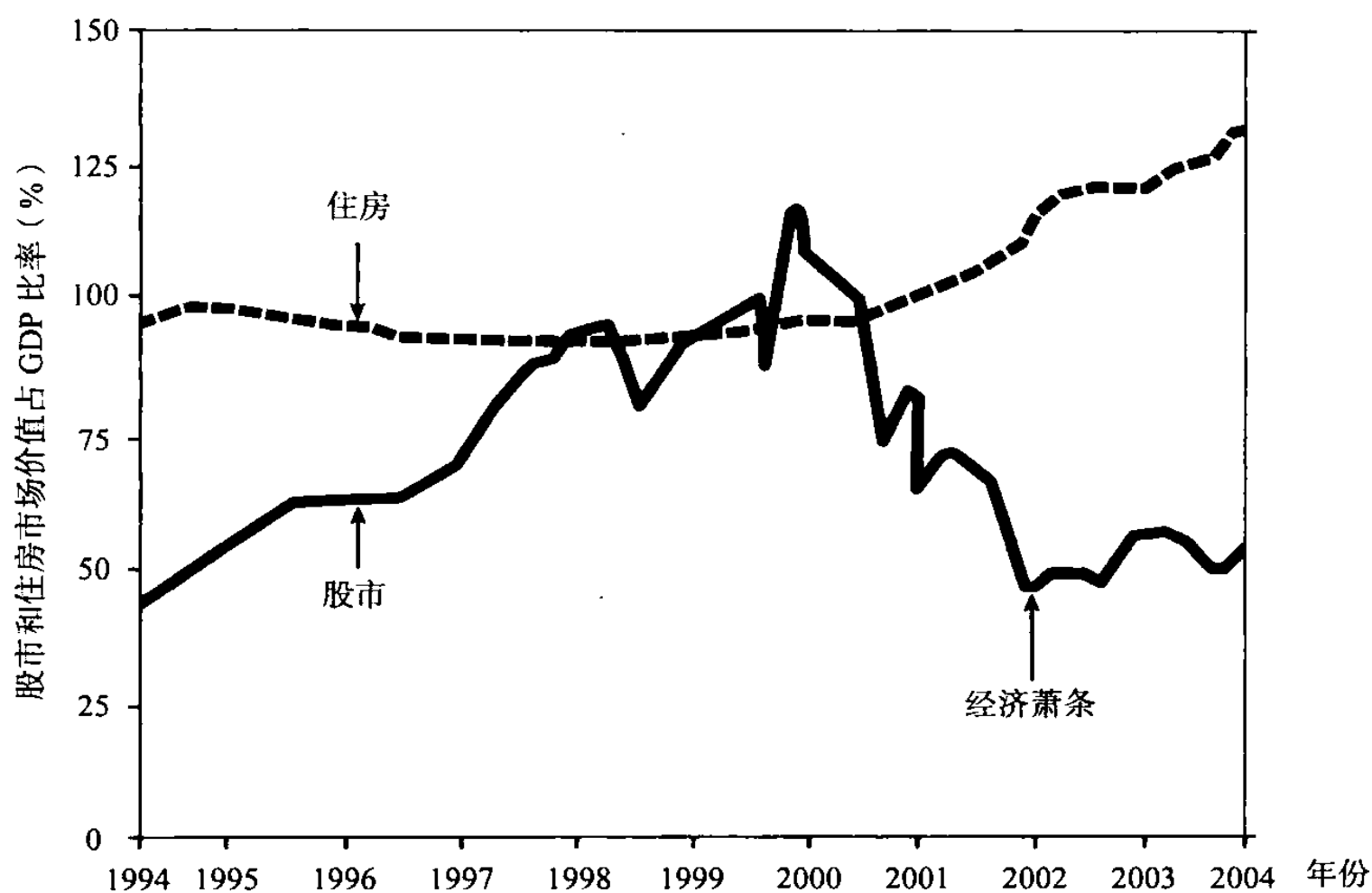


图 1.13 美国股市和住房市场价值占 GDP 比率

投资领域的这一趋势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时不时地，有关大型非金融企业通过从事金融活动赚取的利润远远超出其主营业务带来的利润的消息就充斥着各种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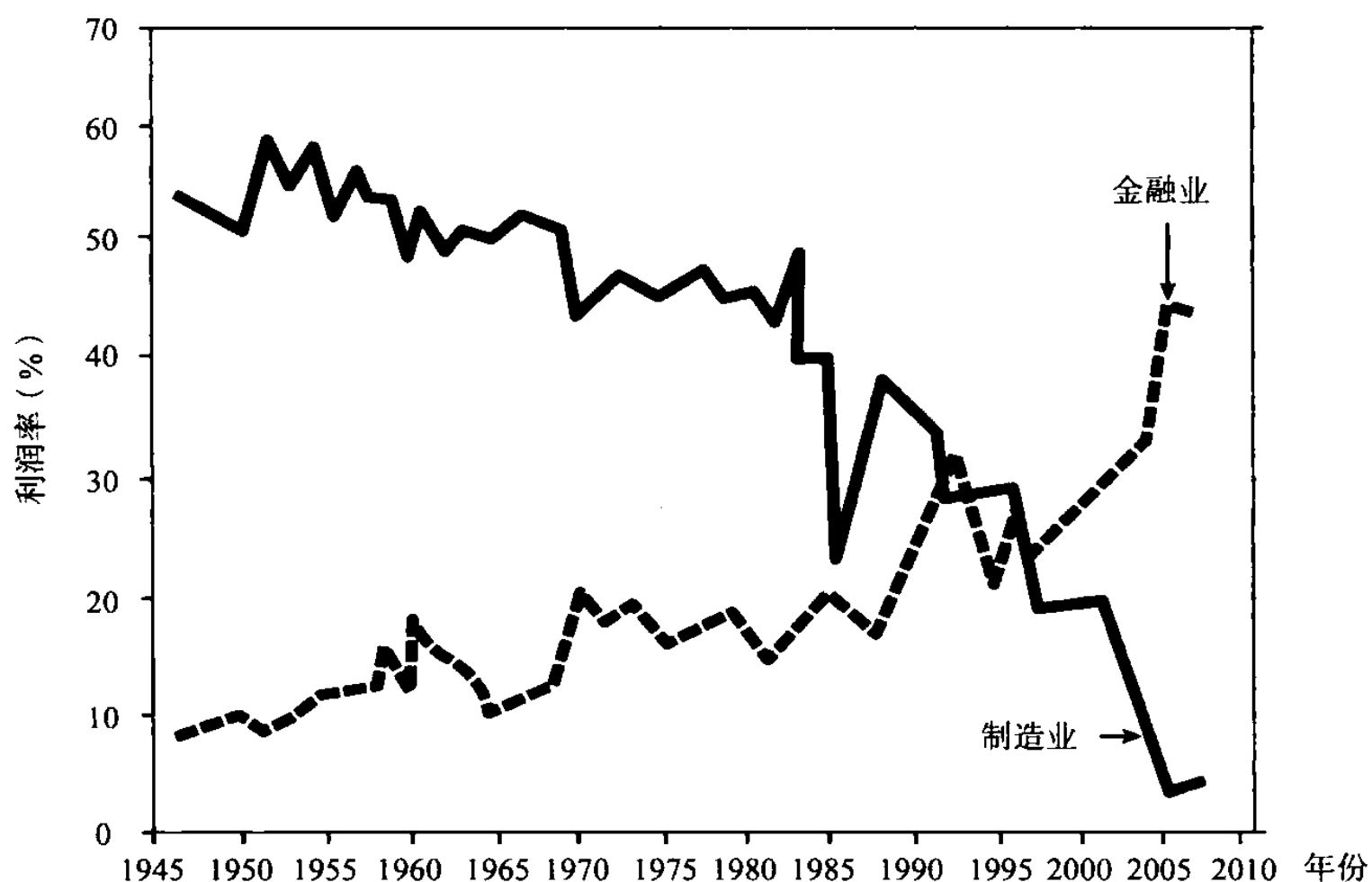


图 1.14 美国制造业和金融业利润率走势（1945—2010 年）

汽车产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汽车制造企业的核心员工不再是工程师，而是会计。它们设立金融业务部，负责向消费者提供贷款，并且实现了很高的投资回报率。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很快就发展成为住房抵押贷款领域最大的私人放贷者，同时其汽车贷款业务的利润率也让人非常满意。不过更重要的是，一个在世界各地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交易为投机分子创造了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对价格、利润表的适当处理，将利润转移到税率水平最低的国家进行申报，同时，币值的波动也被他们充分利用以谋求获利。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这些公司依然会想方设法对冲预期之外的汇率变动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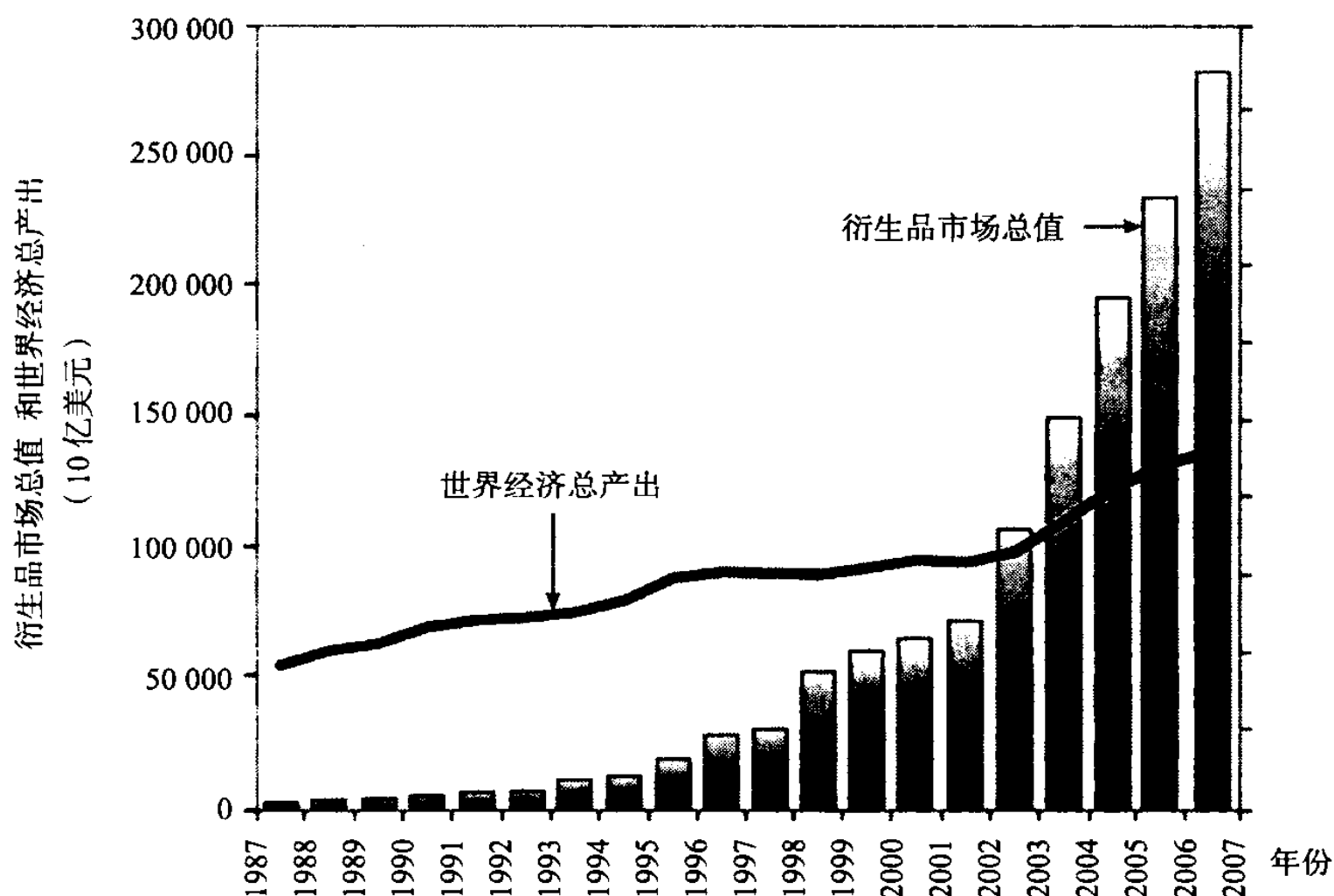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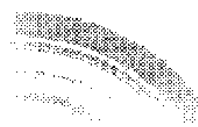


图 1.15 衍生品市场总值和世界经济总产出

1973年，20世纪60年代通行的固定汇率制度瓦解，这意味着将有更灵活的货币汇率制度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出现了第一个货币期货交易市场，虽然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它有严格的“游戏规则”。紧接着，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控制汇率的波动性，对冲交易（即同时买进卖出等额的货币期货）开始变得普遍起来。就这样，在监管框架及交易所的各项规则之外，出现了一个场外交易市场。事实上，规避监管是20世纪90年代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包括信用违约互换、货币衍生品、利率互换等）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这些新生事物构成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和管制的影子银行系统，并且很多企业逐渐成为这个市场上的“常客”。如果影子银行系统在纽约行得通，那么为什么不把它推广到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和新加坡等地呢？为什么还要把业务活动交由银行处理呢？在人们的印象中，安然公司应该是一家能源生产与销售企业，但是该公司发展到最后却仅从事能源期货交易，2002年当它宣布破产倒闭时，人



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何时安然公司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家衍生品交易公司，而且已经被这个风险极高的市场牢牢套住。

这一切听上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例子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1986年，年仅29岁的安迪·克雷格加入美国信孚银行，此前他曾在著名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并且在货币期货交易方面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克雷格有幸赶上了“大爆炸”式变革的时代。他发现了一个很完美的数学公式，可以用来对货币期权进行定价并保证获利。此外，他还曾试图操纵市场，方式是设定买入期权，即在将来某个时刻大量买进某种货币，诱使其他交易员跟风操作，不断拉高这种货币的价格，而克雷格则在到期日前不断将自己持有的这种货币高价卖给那些跟风的人。显然，他损失了期权的保证金，但是通过以高价位卖出这种货币，他早已赚了很多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些交易是在“场外”进行的，即私下签订买卖合同，不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监管范围之内。克雷格“玩”得很大，他有一次甚至以整个新西兰为赌注（毫无疑问，这使新西兰政府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即便是在1987年他仍然成功赚到了2.5亿美元左右，要知道，那可是个经济危机年，他的同事们大部分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凭着一己之力拯救了整个信孚银行。此前他曾经被许诺可以得到公司赢利的5%作为奖励，在当时，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所以收到应得的300万美元之后，他“按规矩”辞职了。与此同时，他的老东家信孚银行却在没有对他提供的数字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出于提升公司股价的目的，一再对外界宣扬自己的赢利状况。结果，发现克雷格提供的赢利数字虚报了8000万美元，但是信孚银行却不肯承认其利润消失了，相反，他们想尽各种创造性的会计手段，希望能够抹平这个差额。而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公布的数字有误。

在这个例子中，有几个要素值得注意。第一，游离在一切管制之外的场外交易允许任何形式的金融创新手段及暗箱操作，并给当事人带来丰厚回报。第二，银行也支持这类操作，尽管它们并不完全清楚其中的原理（尤其是数学方面的问题），但和它们的核心业务比起来，场外交易能带来更高的利润，进而可以提升它们的股票价格。第三，“创造性”会计手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在市场存在波动性的情况下，资产的账面价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五，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交易员，他过人的天分和技能让他很快使一群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弗兰克·帕特诺在《传染性贪婪》（*Infectious Greed*）一书中提到此事时，写道：

在短短几年间，监管者就丧失了他们对市场中介那原本就微不足道的控制权，市场中介也丧失了他们对公司管理者那原本就微不足道的控制权，而公司管理者则同样丧失了他们对员工那原本就微不足道的控制权。这种连锁式的控制权丧失行为导致很多公司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只不过它们成功地躲过了公众的视线。简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控制只是一个传说。

当资产价格被炒高时，整个经济都会出现价格上涨的趋势。股票和房地产完全是两码事。对很多人来说，在曼哈顿买房子，甚至租房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大量举债。几乎每个人都被资产价格的上涨套住了，当然也包括那些收入根本没有增长的普通工薪阶层。如果那些超级富翁们可以，那么工薪阶层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贷款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毕竟，贷款条件并不算苛刻，然后把它当做一棵摇钱树，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用做孩子上大学的学费，或者来一次浪漫的加勒比之旅。

但是，任何资产的价格都不会永远涨下去。现在，轮到美国人来承受资产贬值的痛苦了，尽管美国政府还在尽一切可能向世界其他国家灌输一些错误的资本主义理念。

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流动性过剩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以来事物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债务与资产或服务的未来价值有关，这通常包括了预测的成分，即通过设定利率水平，推算资产未来的价值。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债务水平的增长这一外在表现和一个关键的本质性问题有关，我称为“过剩资本吸收问题”。资本家不断以利润的形式制造剩余，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他们又不断对原本就已经在膨胀的一部分剩余进行再投资。这种状况要求资本家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安古斯·麦迪森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收集、核对有关资本积累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他通过计算得出，1982 年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为 6 940 亿美元（以 1990 年的定值美元表示）；到了 1913 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2.7 万亿美元；1950 年进一步上涨为 5.3 万亿美元；到 1973 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产值达到 16 万亿美元；2003 年则接近 41 万亿美元。据最近公布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9）》预测，目前这一数字约为 56.2 亿美元（以现值美元表示），其中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值约为 13.9 万亿美元。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其增长的实际复利率接近于 2.25%，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增长率为负值，但是 1945—1973 年，这一数字要高得多，接近 5%。目前，经济学家及金融领域的相关人士一致认为，一个“健康的”，即大部分资本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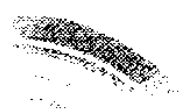
主义经济每年的增长速度应保持在 3% 左右。如果增长率低于这一水平，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已经陷入低迷。如果年均增长率低于 1%，则可以视为经济衰退，或者说经济危机，此时大部分资本无法实现赢利（见表 1.1）。

表 1.1 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 GDP 变化（1950—2030 年）

单位：10 亿美元

国家或区域	1950 年	1973 年	1990 年	2003 年	2030 年	1990—2003 年	2003—2030 年
西欧	1 396	4 097	6.033	7 857	12 556	2.05	1.75
美国	1 456	3 537	5 803	8 431	16 662	2.91	2.56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180	522	862	1 277	2 414	3.07	2.39
日本	161	1 243	2 321	2 699	3 488	1.17	0.95
“富国”	3 193	9 399	15 019	20 264	35 120	2.33	2.06
东欧	185	551	663	786	1 269	1.33	1.79
俄罗斯	315	872	1 151	914	2 017	-1.76	2.98
其他独联体国家	199	641	837	638	1 222	-2.17	2.43
拉丁美洲	416	1 389	2 240	3 132	6 074	2.61	2.48
中国	245	739	2 124	6 188	22 983	8.56	4.98
印度	222	495	1 098	2 267	10 074	5.73	5.68
其他亚洲国家	363	1 387	3 099	5 401	14 884	4.36	3.83
非洲	203	550	905	1 322	2 937	2.96	3.00
“其他”	2 148	6 624	12 117	20 648	61 460	4.19	4.12
世界	5 341	16 022	27 136	40 913	96 580	3.12	3.23

注：表中数据以 1990 年美元为标准。



英国首相乔治·布朗——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在 2009 年秋天曾争辩说，未来 20 年我们有望实现世界经济总产值再翻一番。奥巴马总统也表达了希望美国经济可以在 2011 年回到年均增长率 3% 的正常轨道上来的美好愿景。如果这些期望都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到 2030 年，世界各经济体产出水平的总和将超过 100 万亿美元。到那时，将有 3 万亿美元新增投资等待寻找获利机会。这着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让我们换个方式考虑这个问题。18 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仅仅局限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及其他一些热点城市周边 50 英里的范围之内时，资本年复一年地以 3% 的复利率进行积聚，看上去似乎并不会带来什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想想看，资本的这种积聚不仅出现在北美洲、太平洋地区和广袤的欧洲大陆，还出现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及非洲各国。让资本主义世界保持目前的速度持续发展下去，根本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是，为什么 3% 的经济增长率要以 3% 的再投资率为前提条件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规模越来越大的过剩资本应该如何吸收，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很令人头疼，1973—1982 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这一问题则显得尤其突出。过去一段时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权威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经济中的流动性出现过剩”，换句话说，寻找可获利投资项目的闲置资本越来越多。回想一下，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由于石油价格的高升，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同样有大量资金蜂拥而入。后来这些资金通过纽约的投资银行毫无限制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贷款，回流到世界各个经济体，并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整体来说，生产领域所能吸收的过剩资本越来越少（尽管中国还在飞速向前发展），因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可

获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资本所有者近乎绝望地尝试找到更多的途径来吸收这些剩余资本，最后的解决之道是他们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场私有化浪潮，他们宣扬说国有企业先天就是松散、低效的，要想改善其经营业绩，唯一的途径就是将国有企业推向私有化。但是这一“信条”却是在未经过仔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诚然，有些国有企业确实缺乏效率，但是有些却并非如此。

如果你乘坐火车经历一次环法旅行，然后和英国或美国糟糕的铁路系统做一个比较，你马上就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另外，可能没有哪个机构比美国的私人医疗保险服务系统效率更低，更浪费资源了，这是因为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补助制度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政府主导的产业就像被诅咒了一般，不得不对无处可去的私人资本开放，包括水、电、通信和交通运输在内的所有公共事业单位，更不用说公共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了，都不得不“敞开怀抱”，接受私人企业及市场经济的祝福。在某些情况下，私有化的的确确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不过，确实有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那些通常以很低的折扣接手了公共资产的企业家们摇身一变，变成了亿万富翁。

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在《福布斯》杂志2009年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三，他正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早期墨西哥电信业的私有化发迹的，这次私有化浪潮使得一些墨西哥人在一夜之间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榜单。与墨西哥类似，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的“休克疗法”使得国家近一半的产值一度处在7个寡头垄断集团的掌控之下。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在任期内一直在和这些寡头“作战”。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随着有更多的剩余资本进入生产领域，生产商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给价格施加了向下的压力，通过向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低价的沃尔玛现象可以看出这一点。1990 年前后，尽管有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可供利用，但是生产者的利润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减少的局面。低工资和低利润看起来是一个很怪异的组合。结果，在逐利性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了针对资产的投机活动。试想一下，如果你可以在日本市场上以零利率借到资金，并将它们以 7% 的利率在英国市场上投资，同时可以对冲掉日元和英镑之间的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投资于利润率很低的生产活动呢？因此，在这一时点，信贷规模急剧扩大，新的衍生品市场突飞猛进地发展，它们和互联网公司一起，成为大量剩余资本的栖息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有谁会考虑投资扩大再生产呢？也是在这一时点，资本主义危机真正开始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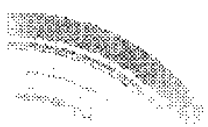
将经济增长率永远维持在不低于 3% 的水平上面临很多困难，比如，环境的制约、市场的制约、利润的制约，以及空间的制约。举例来说，尽管几乎整个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都被掠夺性开采，但是只有一些核心地区及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通常来说比较偏远的内陆地区还完全处在资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自 1973 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化趋势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它提供了解决过剩资本吸收问题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些过剩的资本、过剩的流动性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时已经非常清晰：不断提高的杠杆率（即负债率）。通常情况下，如果银行贷放出去的资金总额达到其理论上所能吸收的存款总额的 3 倍，那么储户将永远无法同时提取款项。如果真的出现“银行挤兑”行为，那么除了“关门”之外，银行无计可施，因为它们绝对不会有足够的现金满足所有储户同时提款的要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银行不断通过互相借贷提高贷款—存款比率。银行系统的负债率比经济中的任何其他部门都高。到了 2005 年，贷款—存款比率甚至惊人地达到了 30：1。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银行系统创造出来的过剩的虚拟资本正在吸收过剩资本！这看上去就好像银行系统的人躲进了资本主义的阁楼里，他们通过内部交易及金融杠杆的作用不断制造出大量的货币，完全不理睬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工薪阶层怎么过活。

但是，一旦有个别银行陷入困境，银行之间的信任之墙就会垮塌，继而那些虚拟的流动性也将消失不见。于是，去杠杆化的过程开始了，其结果就是银行资产贬值，损失惨重。直到这时，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人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过去 20 年间那些住在阁楼里的人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勾当。

而政府的政策助长了，而不是抑制了银行盲目放贷的行为。所谓的“国家救助”一词严格来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是纳税人拯救了银行，是纳税人拯救了资本家，是纳税人替他们偿还了大量债务，是纳税人原谅了他们的罪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错。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所有的救助资金最后都流向了银行，而不是那些被取消了资产赎回权的家庭，或者更笼统地说，普通百姓。银行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是借给任何人，而是用来降低它们自身的负债率，或者收购其他银行，它们只是忙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不公正待遇激起了那些站在社会底层人士立场上，反对金融机构所作所为的平民主义者的不满，当然，右翼分子及很多中间势力则指责很多家庭敢做不敢当，不负责任，盲目借贷以致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不至于影响到资产阶级未来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政府还是出台了一些针对穷人的救助措施，虽然这一切到来得实在是太晚了。如果银行重新开始放贷的话，我们能否回到此前依靠信用来维持的经济？如果不能，那是为什么？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过去 30 年，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及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以及国家保护主义的存在对这次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想实现和维持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定繁荣，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固的全球性政治协商与贸易框架，并且在这一框架下，参与各方原则上来说必须可以实现共赢。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利用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在几个重要同盟的支持下，建立起了新的全球秩序。新框架追求非殖民地化，削弱了此前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的势力范围，并且催生了联合国及《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签署于 1944 年的协定确定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冷战”爆发后，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向所有选择加入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提供”（出售）保护。

简言之，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确立了霸主地位。它领导着一个全球联盟，促使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区为过剩资本的吸收打开方便之门。它追求一己私利，但是看起来就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操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在欧洲和日本实施的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计划是这一战略的最好例证。它的行为方式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方式。

1944 年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呼吁建立一个独立于任何单一国家势力范围之外的全球性货币单位，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坚持要求通过在美元和黄金之间确定一个固定的兑换比率，让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其他货币则按照固定的汇率兑换美元，以便利贸易结算。很显然，此时货币期货市场根本没

有存在的必要，因为 6 个月内的汇率是既定的，当然，偶尔出现的灾难性货币贬值是个例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低，我们强调“金融危机”这个说法是为了和 1958 年、1966 年因为产量过剩而造成经济低迷的危机区分开来。金融资本的作用虽然很重要，但是却受到了限制，而且相对来说是透明的。

只要美国人自我克制，不滥用货币发行权去谋求一己之私，那么这一体制将保持正常运转。但是，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争的爆发及“大社会”反贫困计划的提出（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黄油加大炮”战略）导致了 1968 年前后美元的危机。几乎也是在同一时期，美国企业开始向其他国家输出过剩资本。大量过剩的美元，已经完全不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不断在欧洲银行系统积聚。最后，关于美元可以和黄金保持固定兑换比率的信念垮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历史。紧接着，人类须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制度来代替固定汇率制度呢？

1969 年，凯恩斯关于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构建一种中立的国际通用货币，其价值依据 5 种主要构成货币的币值及比例来确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管理，他的这一主张再次被人们提起。但是这无疑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更容易接受的解决方案是，放弃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例，世界上各主要货币和美元之间实行浮动汇率。虽然说这样做给国际贸易体系既带来了灵活性也带来了波动性，但是国际储备货币仍然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来说，这一安排不过是用一个挑战代替了另一个挑战。如果美国想维持美元的强劲地位，那么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即便不能比对手更好，也至少要和它们一样。不幸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无论是从生产率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衡量，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表现明显超越了美国，同时，其他一些可以威胁到美国领头羊地位的因素也逐渐开始显露



出来。美国已经无法回到保护主义的时代。如果他还可以做什么的话，那就是继续一马当先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此作为吸收经济中的剩余资本的方式之一。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开始朝着国际化竞争的方向发展（一个例证是，日本和德国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占领了美国汽车市场很大的份额）。金融资本，不管是美国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不得不冲在最前面，将剩余资本分配到那些利润率最高的地区、行业。

事实证明，在很多产业，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场所并不是在美国，尤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作为工业中心的美国东北部或中西部地区，反而是西部或南部地区。其结果就是，生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这是一个无情的、令人备受折磨的过程。先前曾作为生产活动组织中心的城市开始了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波及面从美国的匹兹堡、英国的谢菲尔德、德国西部城市埃森的钢铁工业到印度孟买的纺织工业。与此同时，一些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区域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新的工业中心，特别是那些拥有特定资源优势或组织优势的地区，比如，中国的台湾地区、韩国、孟加拉国及墨西哥的马基拉朵拉工厂（免税装配厂）为代表的特别生产区，以及像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出口贸易基地。与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相伴随的，还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你追我赶，而且这些技术大多是劳动节约型的，给全球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虽说在生产领域美国丧失了先前（尽管并不那么突出）的主导性地位，但在金融领域，它仍然保持了巨大的影响力。美国逐渐开始依靠收取“租金”过活，或者利用自己在技术和金融创新方面的突出地位，或者利用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不要对金融行业施加太多的监管。

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危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霸

主地位。美国通过我行我素的举债行为实现经济复苏的计划不仅面临国内保守主义者的坚决反对，而且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累积的巨额债务的约束。近年来，美国一直以平均每天 20 亿美元的规模借债，而债权人，如中国人民银行或亚洲其他国家及海湾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之所以愿意持续借钱给美国，是因为美国经济“太大了而不能倒”，债权国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持续扩大的影响力非常明显。与此同时，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已经受到威胁。中国已经提出，要求尝试凯恩斯的最初设想，创建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而对这种提款权的管理工作则交由相对来说比较民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完成，这样一来，中国在国际金融问题上无疑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毋庸置疑，这势必将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

“冷战”的结束带来的一个影响是，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军事保护显得不合时宜，尽管苏联、越南等国都通过不同的途径，融合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来。诚然，这为解决剩余资本的吸收问题带来了新的机会，但这同样加速了剩余资本的产生。动员其他国家躲进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之下，共同对抗另一个敌人的努力，即所谓的反恐战争，同样没有取得成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许我们有必要仔细阅读一下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在奥巴马就职后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其中客观而审慎地预测了 2025 年世界的面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的官方机构预测提到，那时美国虽然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绝对不再是世界的主导。世界将越来越多元化，而不再是以哪一个国家为核心，非国家组织（从恐怖组织到各种非营利组织均在此列）的作用将逐渐提升。但是，首先，“此前从未发生过、但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财富与经济权力从世界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将延续下去”。

这种“前所未有的转移”逆转了自 18 世纪以来，欧洲和拉丁美洲对东

亚、东南亚及南亚地区财富的榨取，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这种榨取行为表示了遗憾之情。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70年代亚洲“四小龙”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崛起、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90年代期间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突然爆发的工业化进程，这一切都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轴心，尽管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例如，1997—1998年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短暂但是强劲的资本回流到华尔街及欧洲和日本的银行的现象。

如果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种极端的自我矫正方式，那么当前美国将通过赤字政策帮助自己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而这些赤字很大一部分由那些节省了大量盈余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及海湾地区诸国来弥补，这一事实或许证明现在到了进行调整的时刻。甚至，我们可以把美国、英国当前面临的困境解释为，这是对华尔街及伦敦等城市1997—1998年间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所作所为的一种报复，他们归还一切的时候到了。

这种结构性转变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对此，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锐基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有着详细的描述。阿锐基提到，在金融化过程中的哪些阶段会出现霸权地位的转移存在着清晰的模式。为了适应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霸权从较小的政治实体（如威尼斯）转移到较大的政治实体，如荷兰、英国和美国。通常来说，占据霸权地位的也是剩余生产量最大的实体，或者是以剥削或其他形式占有他国剩余的帝国主义政权。2008年世界各国的总产出达到了56.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贡献了13.9万亿美元，并因此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仍然占据着“控股性股东”的地位，继续对全球政策的制定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就像他作为最大的股东之一，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所做的那样。

但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生产活动和财富积累的分布图和 20 世纪 70 年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已经飞快地迎头赶上，曾经，中国一些临近香港的小渔村，如深圳、东莞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全球性生产基地，创造了数千万美元的产值。这些新兴的经济体吸收了大量的剩余资本，同时为了给其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创造便利条件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机场、港口等）也成了剩余资本的一个归宿。生产活动将流向哪里并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由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区域性因素决定的，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所谓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因素及区域优势。例如，墨西哥北部地区临近美国市场。此外，一国政府实施何种政策对于吸引资本流入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完善基础设施、补贴投资活动、墨西哥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优惠政策，以及马基拉朵拉工厂的建立、中国 1980 年之后设立的经济特区等。

不同国家吸收的剩余资本的规模是不同的，既而导致的危机严重程度也是不同的。那些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过程中最不自律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毫无疑问是这次危机的“震中”，但是除了它们之外，仍然存在很多情况没这么糟糕但也不容乐观的地区。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受影响最大的是纽约和伦敦，在住房抵押或其他形式的贷款分割、打包、证券化的过程中，在创新用于贷款营销和交易活动的金融工具的过程中，以及在二级市场上对债务进行保险、对冲和掉期交易的工程中，它们联合充当了领头羊。而 1986 年“大爆炸”式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之后确立的金融结构则意味着，伦敦和纽约金融市场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立刻传递到世界其他市场。在这个市场体系中，1995 年，一个叫尼古拉斯·里森的股票交易员在新加坡通过在日本股票市场的交易最终搞垮了具有 200 年历史的一家英国老牌投资银行巴林银行。这也是国际金融体系受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影响会如此之大的原因。

不过，依据经济活动对信贷市场依赖程度的不同，信贷市场崩溃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冰岛，我们可以将其看做一个信用机构或一家银行，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就丧失了全部资产价值，不仅给投资者（主要是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使政府部门陷入瘫痪。东欧很多不久前才加入欧盟的国家也存在大肆举债的行为，因为无力偿还贷款，它们也面临破产的危险。

另外，那些没有将金融领域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相对来说就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同时，当消费者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时，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家庭负债额超过其收入的国家，受到的冲击和那些针对失业的社会保障措施很少的国家受到的冲击也是有差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各国要好一些，因此它们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刺激计划。那些以美国作为主要产品出口市场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最后也被拉下水了，而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没能独善其身。原材料价格在 2008 年年初一路走高，原材料企业及产品生产商因此曾一度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灾难，但是到了下半年，随着原材料及产品价格不断降低，它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麻烦之中。2008 年夏天，石油价格曾飙升至每桶将近 150 美元（激起了人们关于“石油峰值”的激烈讨论），但是几个月之后已经跌回每桶 40 美元，给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和海湾地区国家在内的产油国带来了无尽的问题。随着海湾地区由石油产业的利润推动的建筑业繁荣的终止，大量来自印度、巴勒斯坦及东南亚国家的外出打工人员纷纷踏上了回乡的路程。

墨西哥、厄瓜多尔、海地及印度喀拉拉邦地区的居民以在海外就业的亲人的汇款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随着在海外从事建筑工作的机会不断减少直至消失，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被解雇，这些家庭完全丧失了收入来源。在很多贫困国家，因为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或死亡人数大幅增加，打翻

了一直以来的一种欺骗性说法，即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边缘化人口不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

危机波及一个又一个领域，国家或地区一个接一个地被危机俘虏，引发了一系列看起来已经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和恶性循环，更不要说终止或者逆转这些结果了。最初人们的反应看起来确实是被事态的发展吓傻了，但是很快就开始抗议国际资本的运行方式。

1999 年年底西雅图爆发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标志着此类抗议活动的开始，但是 9·11 事件之后这类抗议活动消失了。这一次抗议国际资本运行方式风潮的目标更明确，当然，和以往一样，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法国工人举行大罢工，印度农民揭竿而起，希腊则爆发了学潮。在美国，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士开始抢占被取消了赎回权或被遗弃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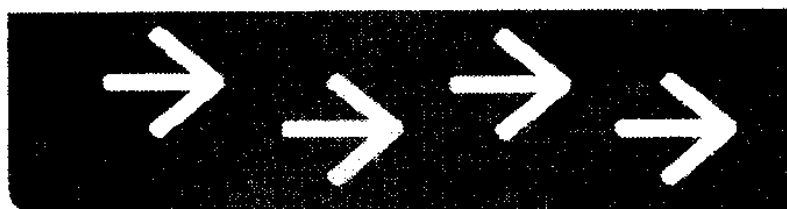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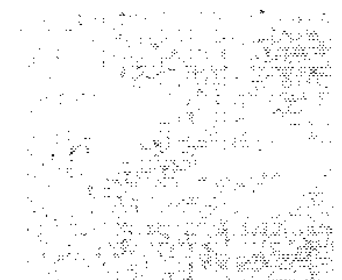
我们确信无疑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英美模式虽然在“冷战”结束之后占据了常胜将军的位置，但是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表现确实值得怀疑。

为什么资本主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须要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和解读。但问题在于，那些未能对危机的爆发做出预测的经济理论和正统学说仍然是我们讨论的主题，它们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政府进行决策的准绳。如果不对此做出调整，那么就像撒切尔夫人很喜欢说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而只能重新回到起初让我们陷入泥潭的那种资本主义模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与生俱来蕴涵着危机的种子这一特质呢？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我们才能识别出一种替代方案呢？这些都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要讨论的话题。



第 2 章 资本的集中

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为什么说它本身就蕴涵着危机的种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想阐述形成资本积聚的一些必要条件；其次说明对经济的持续永久性增长来说，存在哪些潜在障碍，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常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最后分析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碰到的主要困难和阻碍。



■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资本循环和积累

资本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金不断地追求增值，变成更多的资金。推动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是资本家，他们分饰不同的角色。金融资本家通过将资金借给他人并收取一定的利息来赚取更多资金；商业资本家低买高卖；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及资产属于稀缺资源；拥有知识的人通过版税或知识产权来获利。资产交易员则通过他们的交易头衔（如股票和股份的所有者）、债务或者合同（包括保险合同）赚钱。甚至连国家都可以表现得像个资本家一样，比如，政府利用税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并为自己带来更多税收收益。

但是，自18世纪中叶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循环方式是所谓的产业资本，或者生产资本的循环。这种循环过程从拥有一定数量资金的资本家开始，他们选择特定的技术和组织方式，进入市场并购买需要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工厂、中间产品、机器设备、能源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通过在资本家监督之下的劳动过程，实现了结合，结果就是商品被其所有者即资本家拿到市场上出售并获得利润。接着，资本家从以前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定的比例将其转化为新的资本，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始新的生产过程，我们很快就会说明资本家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如果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没有变化，那么更大的生产规模意味着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便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利润。这一过程不断继续下去，循环往复。

服务和娱乐产业的资本循环过程看上去略有不同，因为劳动过程本身就是要出售的商品。例如，理发或者为他人提供娱乐服务，因此商品的生

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之间不存在时间差（尽管可能需要大量的事前准备时间）。另外，考虑到提供的服务具有个性化特质，投资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不是很强，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扩大再生产服务活动的例子，如连锁式商店、影院、咖啡馆，甚至私人高等教育机构。

资本循环过程的连续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出现中断，就一定会招致巨大的损失。同时，资本家有强烈的动机去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那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和竞争对手比起来，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周转速度的提升几乎总是会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后来人们非常重视可以提高速度的创新活动。计算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资本循环或周转过程的任何中断都可能会给这一过程中的资本带来损失或贬值。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任何商品、服务、人员都被禁止流入或者流出纽约及其他一些城市，金融市场也曾一度关闭。但是只用了3天时间，人们就清晰地认识到，不管是人员的流动还是资金的流动都必须马上恢复正常，否则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大麻烦。于是，政府想方设法鼓励美国人走出家门，去购物、旅行、消费，以及积极投身各种商业活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商业活动。通过个人消费帮助美国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甚至被视为爱国主义行为。总统乔治·布什先生更是前所未有地以自身为表率，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就从华盛顿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芝加哥视察，希望以这种行动说服普通民众放下心中的恐惧，继续乘坐飞机出行。

类似于9·11事件这种暂时性冲击很容易就可以应付过去，经济长期缺乏动力对资本主义来说则意味着危机的到来。

另外，资本的循环还包括空间位置的转移。资本从各个地方集中到一

起，被引流到某个特定地方，并在那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我把钱存在位于巴尔的摩的家附近的银行里，但是这些钱最后却流到中国东莞的一位企业家手中，他用这些钱建造制袜工厂，并且从农村地区雇用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年轻妇女）从事生产。这意味着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在一个地方购买，而生产的产品则要带到另外一个市场进行销售。这种空间转移过程存在摩擦和壁垒，这需要时间去协调解决，因此降低了资本周转的速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减少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摩擦，或者减少阻碍产品流动的障碍。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的创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打开国门，开放商业和金融领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自由贸易寻求恰当的法律框架，从长期来看，也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想象一下，如果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没有彻底打破，将会是什么样子。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个例子：将某一地区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并向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进行销售，被看做将资本短缺的地区和资本过剩的地区以风险最小化的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种途径。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一直都存在一种普遍趋势，即减少各种空间障碍，加速资本周转。而社会生活的空间与时间形态每隔一段时间也会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如19世纪铁路的出现及今天互联网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资金、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流动越来越快，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一进程并不顺利，而且也并不是绝无逆转的可能：保护主义可能死灰复燃；各种壁垒也可能重新恢复；战争马上就可以终止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流。此外，空间或世俗关系的变革也会带来压力与危机，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当生产活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时，先前那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核心国家普遍出现去工业化浪潮时，当地居民所经历的痛苦、艰难的转型。这一问题我们稍后还会进一步展开探讨。

资本家为什么要投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将赚取的利润用于自己的享

乐呢？这是因为竞争法则的作用。如果我，作为一个资本家，没有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而我的竞争对手这样做了，那么不久之后我很有可能会被淘汰出局。我要保护并不断扩大我的市场份额，不得不进行新的投资，以保持我作为资本家的身份地位。然而，这要求存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面对垄断化趋势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和关税壁垒，自由竞争的氛围和环境是如何得以延续、保持下来的？我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这个话题。

除了竞争的压力之外，资本家愿意进行再投资还存在另外一个激励因素。金钱是可以为私人所用的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金钱还是不存在任何局限的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存在极限，一个人所能掌控的实物资产的数量也存在上限。

当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后，人们发现其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拥有 6 000 双鞋子，其生活可谓奢靡，不过她依然面临限制，那就是她不可能拥有数十亿艘游艇或豪宅，但是一个人名下的金钱的数量则是毫无限制的。

金钱的这种特性及人们对金钱所代表的社会权力的永无止境的追逐，使得资本家有足够的社会和政治动机希望得到更多的金钱。而得到更多金钱的一种方式，便是将昨天获得的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从而在明天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当然，我们或许会感到很悲哀，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要想获得金钱所代表的社会权力，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诈骗、贪污腐败、抢劫、走私等。但是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合法方式，尽管大量证据表明，非法行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非偶然现象，国际贸易领域最大的组成部分中就包括贩卖毒品、非法制售枪支及倒卖人口。

金钱代表着无上的权力这一性质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2005 年，纽约重要对冲基金经理的年薪平均为 2.5 亿美元，2006 年顶级基

金经理的收入为 17 亿美元，2007 年对全球金融业来说是灾难性的一年，但是这并不妨碍有些经理人（乔治·索罗斯是其中之一）稳赚 30 亿美元的收入。这正是我所说的“金钱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无限的”这句话的含义。设想一下，如果索罗斯得到的回报不是钱而是鞋子，他还会像现在这么努力吗？

当然，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只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体制一直都在竭力避免因为拥有大量金钱而导致的私权的过分集中。比如，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学家将富有者在精心准备的仪式上宣布捐赠、放弃，甚至直接毁掉自己积累起的物质财富的时刻看做一场盛会。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仁慈博爱也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盖茨及索罗斯等人创办的一个又一个慈善基金是最好的证明。那些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共机构，如天主教堂，有时也会接受私人财产。中世纪时期，天主教堂向那些富有的商人出售“宽恕”，即进入天堂的通行证。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累进税制，通过高额遗产税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这一举措某种意义上也抑制了私人财产及私有权的过度集中。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财富及其代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放松了管制，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简单地用突然滋生出“传染性贪婪”来解释就像格林斯潘所形容的那样，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人们对金钱的强烈渴望从未消失过。为什么克林顿总统那么容易就对债券持有者屈服了？为什么拉里·萨默斯在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时，会强烈地反对金融监管？又是为什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现在自诩为左派，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发现自己主张的那些政策措施不无偶然地使得富有者变得更加富有？乔治·布什总统支持对富人有利的税收制度，仅仅是因为他更喜欢他们，或

者是需要他们的支持以赢得连任？仅仅因为不管是在国会还是在行政机构，“华尔街党”都成了真正的掌权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英国首相、工党主席布朗先生也赞同类似的主张呢？难道也是因为伦敦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世界各地，从俄罗斯、墨西哥到印度，再到印度尼西亚都普遍出现了富有者变得更加富有的现象？

在不存在任何限制和障碍的情况下，不断进行再投资以保持资本家的身份这一需要迫使资本家不断开疆扩土。这又进一步催生了寻找新的领域以吸收再投资资本的需要，以及产生了“过剩资本的吸收问题”。新的投资机会源于哪里？是否存在限制？显然，资金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存在任何固有的极限。这一点在 2008—2009 年显得格外明显，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向经济中注入资金，希望可以拯救摇摇欲坠的金融部门。

但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还存在其他的难题，而且这些难题中的任何一个一旦失控，都可能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此，我们将危机定义为过剩的生产活动及再投资活动受到阻滞。到那时，经济将停止增长，相对于可获利的生产机会所需要的资金量来说，流通中的货币显得有点过多了。如果经济增长无法恢复，这些过剩的资本的价值将会下降，甚至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不乏这种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其中有些可能是局部性的，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如 1992 年瑞典银行体系的崩溃；有一些波及面则要更大，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长期大萧条；还有一些则可能是系统性的，甚至会逐渐发展成全球性的危机，如 1848 年、1929 年、1973 年及 2008 年爆发的危机。危机爆发后，通常来说会有大量资产贬值。贬值资产的形式多种多样：闲置或荒废的工厂，空荡荡的写字楼和购物中心，大量积压无法售出的过剩商品，找不到任何获利机会的资金。价值不断下跌的股票、债券、土地、房屋及艺术品等。

卡尔·马克思和约瑟夫·熊彼特都曾经详细地阐述过资本主义内在的这种“创造性毁灭”倾向。尽管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创造力的尊崇，他及后来的列宁和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晰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过程。熊彼特主义者则更多是对资本主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的顶礼膜拜，至于毁灭的部分，他们则简单地将其视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常规成本，尽管他们也很遗憾地承认，有时候这种毁灭性的代价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虽然说毁灭的成本要比熊彼特主义者通常认为的大得多，但是至少迄今为止，如果从长期的角度来看，熊彼特主义者的观点却是基本正确的。自18世纪中叶以来，虽然多次出现挫折和反复，但是整体来说世界的总产出，以及用人们实际享有的物质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来衡量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显著的提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世界人口总量从不到20亿人增加到68亿人。纵观资本主义过去200年的发展历史，它确实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不过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马克思的描述，而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与阶级的不平等在一个波动性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进一步加深了。此前资本主义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大萧条发生前的20世纪20年代就经历了这种不幸。

就是在各种关于其行将灭亡的预言声中，资本主义历经艰辛发展到了现在。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有足够的应变力和灵活性去跨越诸多障碍，尽管就像历史上的周期性危机所表明的，这一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激烈残酷的自我校正。关于如何看待这一问题，马克思在他的写作草稿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这部草稿在1941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名正式出版。在书中，马克思比较了资本积累的潜在无限性和物质活动（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潜在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无法超越这些有限性，这些有限性的每一个方面，看上去都是一个有待逾越的障碍。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图

景中，资本家总是在竭尽全力地把一些看上去绝对性的局限转变成可以超越或回避的难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局限性又是什么呢？

考察资本在生产中的循环过程揭示了 6 个对资本积累来说需要解决的难题：① 原始资本不足；② 劳动力供给不足；③ 生产资料，包括所谓的“自然资源”的稀缺；④ 不合时宜的生产和组织形式；⑤ 生产过程的无效率；⑥ 市场上有资金支持的有效需求不足。上述 6 条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阻滞，都会破坏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如果这种状况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最终就会导致危机的爆发。接下来我们将对这 6 个难题进行分析。

■ 国家政权与资本积累相结合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充斥着暴力、掠夺、窃取、诈骗等肮脏的字眼。通过这些非法手段，窃贼、教士和商人们在放高利贷者的助力下，完成了初始资本的集中，使货币作为资本开始了系统性的循环过程。西班牙人对印加人（古代秘鲁土著人）所拥有的黄金的强取豪夺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证。不过，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并不是直接通过生产活动进行循环的，相反，它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农业资本、贸易资本、地租或国家贸易资本，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形式都不足以吸收流通中的资金。换句话说，资金太多，而商品太少。其结果就是 16 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直到 1750 年前后，资本家学会了通过雇用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完成资本的循环，才真正实现了经济的复合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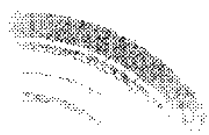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凭借金钱的力量逐渐开始影响和重构国家的组织形式，并且最终在军事机构、行政和立法系统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这样一来，他们

就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地瓦解和破坏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秩序，加快资本的集中。资产阶级不仅在本国采取这种手段，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的圈地运动、租金的货币化，而且还通过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行径大肆侵略他国，如在印度征收土地税。其结果就是国家和金融体系之间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国债的发售（通常是出于战争原因）。

信用体系的核心是由一系列制度所组成的我所谓的国家—金融节。这一概念意指国家和金融权力的融合点，它取代了以往将国家和资本截然分开的分析方式。

但这并不是说两者过去曾经，或者现在融为一体了，而是说国家对资本形成和货币流的管理成为资本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两相分离的领域，一个监管框架出现了，比如，对过去的货币生产部门，也即现在的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的监管。反过来，随着税收和借款成为国家资产的一部分，随着国家职能的货币化、商品化和私有化，金融权力对国家也存在一个反作用。

随着昨天创造出来的剩余资本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今天的新增资本，今天进行的投资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昨天创造的利润。这看上去似乎可以使得资本的积累不必再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样充满血腥和罪恶。但事实上在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强取豪夺仍然是常见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资本家采取了各种手段，合法的、不合法的都有。比如，最近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被揭露出来的暴力、犯罪、欺诈等行径，或者更进一步，在毒品交易过程中的诸多做法。合法的手段则包括将此前人们意识中的公共资源（水资源、教育等）私有化，利用手中的特权侵吞资产，进行大范围兼并、收购及各种实现“资产剥离”的操作，通过破产程序免除养老金或医疗保障基金应承担的义务等。在这次次贷危机



中，很多的资产损失都可以视为对资产的一种强占，投机者今天以很低的价格买入这些资产，希望将来市场恢复之后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将它们卖出以获取利润，从而完成自己的资本积累过程。这也正是 1997—1998 年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家和对冲基金所做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惨重损失换来了主要金融中心的巨额资产。

如果只有昨天积累下来的货币才能被资本化用于今天的扩大再生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看到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个人手中。但是信用体系的产生使得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通过各种途径迅速地将资本集中起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像 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所说的那样，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联合”使得维持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必需的铁路等大型项目工程得以开展。这也正是 19 世纪著名银行家皮埃尔兄弟（圣西门的追随者）的成功之处，19 世纪 50 年代，通过创办信贷机构，他们帮助欧斯曼男爵改善了法国巴黎的建筑环境，巴黎如今随处可见的林荫大道基本上也是在那时建成的。

19 世纪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及其他一些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成熟，大量资本的控制权从众多小私人储蓄者手中被集中并转移到少数几个企业经理或主管手中。企业间的收购（不管是恶意还是善意）、兼并及杠杆收购等也早已发展成熟，而这类活动通常也会伴随着新一轮的资本积累。最近几年比较风行的潮流是，私人资本集团（如黑石集团）接手一些国营企业，对它们进行重组、资产剥离，解雇多余的工人，然后以丰厚的溢价再将它们转手卖掉。另外，市场上还充斥着大资本驱逐小资本的各种把戏，政府对小企业的监管格外严格，这导致了资本的进一步集中。逼迫个体经营者（社区商店和家庭农场等）为大企业集团（连锁超市和农业综合企业）“让路”（一般都会有信贷机构参与其中）也是长期以来的惯常做法。

但是，在资本循环的起点上，可供利用的货币资本的组织、来源、数量等问题却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不管是修建钢铁厂、铁路，还是新增航线，在生产过程正式开始之前，无不要求投入巨额的初始货币资本，而且从投资开始到正式建成投产之间通常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举个例子来说，直到最近，私营的联合资本才有能力承担像连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英吉利海峡隧道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以来，只有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随着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赢得这样的大型项目对资本家来说越来越有必要。

为了便于资本的国际流动从而将资本过剩地区和资本紧缺地区联系起来，还须要建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网。同样，金融服务产业的创新活动、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也拥有悠久的历史。所有这一切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跨越资本流动的所有潜在障碍，实现资本在全球市场的自由流动。这样一来，也就为过剩资本的吸收问题大开方便之门。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那么就把这些资本输送到获利空间更大的美国、阿根廷及南非。中国台湾地区也有过剩资本？好办，只须要引导这些资本到中国大陆或越南开办制糖厂即可。20世纪70年代的海湾地区充斥着过剩资本？那就让纽约的投资银行把它们转移到墨西哥吧。

前述种种资本跨国流动行为要想高效率地进行，最终都要求创建一个类似于国家的国际性组织，如按照《布雷顿森林协定》成立的那些为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提供便利并对这种流动进行监管的组织。其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发挥着核心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各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积极寻求合作，希望为国际化的国家-金融节建立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全球金融框架，其他一些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七国集团 G7（后来发展为八国集团 G8），以及发展到现在的 G20 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关于国家-金融节的作用有两点值得加以强调。第一，它获取部分利息或税收作为提供相关服务的报酬。第二，它在资本循环中的关键性地位，使其可以从那些需要其服务的人或机构那里获取垄断租金。另外，为了吸引闲散资金重回资本循环过程，它或者能为储蓄客户带来安全感或交易的便捷性，或者能为储户带来一定的回报。换句话说，它收取的利息和服务费与提供服务的成本和向存款人支付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就是它的利润所在。但是银行贷放出去金额有可能会超出它们所能借到的储蓄额。银行发放的贷款额是它们吸收的存款额的3倍还是30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杠杆率不断提高，其含义非常明显，那就是银行赚取的利润大幅增加。毫不例外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酝酿过程，也就是金融部门利润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5年，美国经济的总利润中可归因于金融部门的比例从15%上升到了40%。

信贷体系参与资本集中：银行家的崛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信贷体系及那些帮助实现了货币的集中和分配的机构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著。但是信贷体系结构上的缺陷及其内部偶尔爆发的危机，正如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危机，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来说，也构成了潜在的障碍。

通过信贷体系实现的资本集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意义深远。最起码的一点是，它赋予银行家这个高级群体以巨大的社会权力，使他们凌驾于生产者、商人、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工薪阶层及消费者之上。此外，资本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也使垄断力量逐渐增强、竞争力量逐渐减弱的危险出现，而这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于是，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时

候会发现，为了鼓励自由竞争，它们不得不通过法律手段向垄断集团宣战，如美国的反垄断法、欧洲的反垄断委员会。但是最终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却是，国家-金融集团在集中化的信贷压力的操控之下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对它最好的称呼，这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很多批评家所描述的情形，例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 1966 年出版的相当有影响力的著作《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影响颇大的法国社会党的官方口号就是，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反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可以说，资本循环过程先天就蕴涵着风险因子和投机因素。投机，通常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过量的资本被投入到回报率原本为负值，但市场的狂热力量掩盖了这一事实的活动中。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安然公司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损失，就像后来整个银行系统所做到的那样，甚至在面对切实损失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仍在想方设法虚造利润。这只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投机潮”的一个具体事例。

但是，牢记所有的资本循环过程都存在投机性是非常关键的。“你必须明白，” 19 世纪后半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左拉曾经写道，“投机和赌博是这个机制的核心，就好像人类的心脏一样。没错，它吸收血液，通过细小的血管将它们从不同地方引领过来，汇集在一起，然后输送到流向四面八方的河流中去，从而实现了货币的大规模循环。这是那些大型企业的生命之源。”

在资本循环过程的起点投入的资金在循环过程结束时不一定都能实现利润。如果成功了，我们会为企业家的雄才伟略、远见卓识及创造力而鼓掌欢呼；如果失败了（这一结果往往和企业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

则通常会谴责资本家为投机分子！对此，安然公司首席执行官肯尼斯·雷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备受敬仰的天才企业家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骗子！

尽管可以保证资本循环过程结束时产生并获得增值的方方面面因素都被考虑了进来，所有能做的事情也都做了，结果却不一定像资本家预期的那样。这意味着在决定是否将资金投入循环过程中时，期望、信仰、信心、欲望及“兽性”，就像凯恩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所形容的那样，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什么比信任将小额储蓄汇集起来贷放给资本家以赚取利息的金融系统更漠视投资者心理感受的做法了。如果我无法相信银行，那么我很可能会把自己拥有的钱兑换成金条，藏在枕头下面。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那么银行可贷放给资本家的资金流无疑就要出现中断。“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安全可靠”这样的话很多时候表现的正是人们的信心。对此，马克思指出，信贷体系非常像教徒，它唯一的基础和凭借就是信仰。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期望会逐渐膨胀，融资活动也开始出现不负责任肆意挥霍的现象，以至于前所未有地从银行系统内部爆发了金融危机。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清晰的阐述：

昨天，资产者（这里我们不妨理解为华尔街）还被繁荣所陶醉，对未来充满自信，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我们可以理解为房子）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可以理解为流动性）才是商品！’像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在危机期间，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应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

在矛盾的背后，人们的期望开始因为恐惧而颤抖，不管是房子还是英格兰银行都不像此前想象的那么可靠，金融系统因为资金匮乏而无法继续

支持更多的资本积累活动。

虽然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长期以来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大特色，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危机的严重程度都显著增强了。因此，我们须要探究危机背后的原因，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找到相应的对策。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活动以几何级数增长给国家-金融节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它们找到新的方式实现货币资本的集中和配置，而且这些资本必须被投入到可获取最大利润的领域。近年来的金融创新中有很大大一部分都以规避现有的制度性安排或监管条例为目标，因此，放松管制看上去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所有这类举措无一例外地都可能会使金融机构变得“疯狂”，从而导致危机的爆发。这正是我们前面曾提到的皮埃尔兄弟创办的动产信贷公司和不动产信贷公司在1868年危机期间崩溃的原因，也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系统出现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家-金融节都扮演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角色。只要表现其功能的信号出现混乱，危机几乎确定无疑就会发生。当代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公众来说都充满着神秘色彩。威廉·格林德1989年时曾对美联储是如何运转的进行了调查剖析，他将这部令他精疲力竭的著作命名为《圣堂的秘密》(*Secrets of the Temple*)并不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曾把金融业高度发展的世界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梵蒂冈”。100多年过去了，现在或许更具讽刺意味的说法是称其为“克里姆林宫”，因为这个世界的控制权最后很可能是落入银行家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手中。国家-金融节具有封建组织所具备的一切特征，充满阴谋和秘密，不仅对资本的循环和积累过程，而且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横加干涉。对国家-金融节这种特权的合理性的盲目信任，构成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永续发展极为关键的信心和期望的基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形式的国家-金融节。各地在制度安排方面存在



相当大的差异，一些国家间的合作机制，如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做出了影响世界贸易体系未来的金融架构的重要国际决策，参与到这类制度的建设中的国家，通常来说充当着精英和专家的角色，技术官僚色彩浓厚，也不大民主，而且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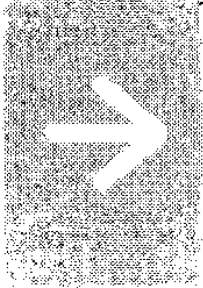
不过，围绕着国家-金融节，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反对者来自各个阵线，他们打破了阶级联盟的限制，斗争的对象则集中在控制着国家-金融节的阶级派别身上。20世纪90年代末期爆发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50年足矣”（Fifty Years is Enough）运动，将各个利益集团（如劳动者和环保主义者）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并且在1999年西雅图爆发反世界贸易组织示威游行活动后，将“海龟操控者”确定为自己的标识和理念。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各个国际机构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从其自身来说，劳动者在诸如此类的政治斗争中的参与程度并不深。但是，他们很容易就被卷入各种民众抗议活动中（通常是在小资产阶级或民族主义分子的鼓动和引导下）。回想一下，1956年，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森曾对他嘴中的“苏黎世魔鬼”（苏黎世的国际银行家）掌控着英国经济表达过强烈的不满。通常来说，平民主义者更关心金融巨头们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获取的巨额财富，以及他们常用来摆布所有其他人生活的强大社会权力。2009年，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抗议银行家得到的高薪和高奖金的骚动，这是对平民主义运动及其局限性的最好诠释。在美国，这场运动的影响可以和指责银行家及金融业人士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抗议活动相匹敌。据说当时，普通民众对专门抢劫银行的雌雄大盗邦尼和克莱德被警方击毙抱着极大的同情心。

任何两个国家的国家-金融节的运行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影响其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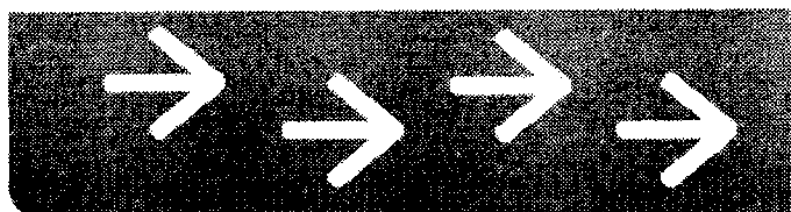
方式的社会力量与在劳资双方之间苦苦挣扎的阶层也有些许不同。我并不是想说工人运动对通过政治力量反抗金融系统不感兴趣，因为事实上他们显然是关心这一问题的。但是在很多方面，从税收、关税、补贴到内、外部的监管措施，产业资本和在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有组织的劳工的利益是被捆绑在一起的，而不是站在对立的角度上。2008—2009年对美国汽车产业的救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汽车制造商和工会为减少失业和避免企业走向破产而并肩作战。另外，除了劳工组织之外，还有很多利益集团和金融系统也存在冲突，正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发生的那样，当金融组织开始凌驾于其他一切部门之上时，当那些被监管者反过来控制了国家的监管机构时，国家-金融节的政策主张就会不可避免地向他们倾斜，而不再是体现最广大民众的诉求。此时，民众持续通过各种运动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对社会体制恢复均衡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一旦金融系统和国家-金融节的运转真的出现问题，就像1929年和2008年那样，每一个人，不管是劳方还是资方，都会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存续开始受到威胁。为了挽救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是不可商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这看起来就好像，尽管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体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和抱怨，但是如果真的离开它，我们又没有办法过活。



第 3 章 资本进入生产过程

一旦资本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被集中到了恰当的人手中，它大显神通的时刻也就到了：它把原材料、厂房、设备、能源及劳动力等调动起来，开始生产商品。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启动生产过程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



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充足的劳动力

资本以几何级数不断积累的前提条件是，有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储备。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对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张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另外，这支后备军还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可得性、社会化、有纪律、符合特定的素质要求（如灵活、温顺、易掌控、掌握必要的技能）。如果这些条件无法得到满足，那么资本的持续积累就会面临严重的障碍。

大量人口被解放出来，使得大量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马克思对“原始积累”过程的描述或许过于戏剧化，过于简单化，但是其表达的本质思想的正确性是不容否认的。总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大量人口变成了依赖为资本进行劳作来维持生计的工人。劳动力的原始积累过程并没有因为18世纪晚期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结束。

在过去的30年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中东欧原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大约有20亿新增工人加入到了全球劳动力大军中。另外，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原本一直处于自力更生状态的农民也开始加入到产业工人的队伍中来。最戏剧化的莫过于女性工人的出现，她们现在是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不折不扣的“半边天”。

综上所述，资本家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充足的可供利用的劳动力这一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了。

然而，劳动力市场在地域上还是分割开来的。每天上下班时间用掉4小时是工人会考虑接受一份工作的最大极限。当然了，4小时的时间内你



可以走出多远的距离，取决于你采用的交通工具，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性确实意味着，劳动力供给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系列体现着区域或国家战略的局部性问题，资本和劳动力的迁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一旦谈及移民政策和劳动法（最低工资、工作时限及对用工条件的限制等）、资本家会影响劳动力供给质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险等），以及保证必要数量的产业后备军的政策措施时，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被牵扯了进来。

资本家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解决或回避劳动力供给的有限性这一难题，甚至在局部范围内他们也能做到这一点。人口增长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制定的鼓励生育政策，如法国政府对人口较多的家庭提供补贴，对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事实上，人口的复合增长率与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会引致局部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充分就业。劳动力的稀缺意味着工资的上涨，结果就是，要么工资以不影响资本积累扩张（因为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供利用）的方式增长，要么资本积累的速度变慢，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进而导致工资开始下降。在某些情况下，资本家也会“罢工”，拒绝进行再投资，以抗议工资的上涨使他们的获利减少。他们希望通过此举抬高失业率，从而迫使工人接受一个更低的工资水平。

虽然历史上不乏“资方罢工”的事例，比如，发生在1980—1982年的“里根大衰退”就可以划归到这一类，当时的失业率达到了两位数。但是还有很多对资方来说更有利的方法也可以解决劳动力的稀缺问题，比如，劳动节约型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创新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相对壮大了产业后备军的队伍，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支四处游移的庞大的失业大军，而他们的存在对工资水平形成了向下的压力。换句话说，资本同时操纵着

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应。

劳动者深知资方的这种强势地位，于是他们通常会反对新技术的采用，如19世纪早期爆发的反对新科技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1945年起，劳动者接受新技术以换取不会失去工作的承诺的“生产率协定”在劳资谈判中越来越常见。另一个可供资本家选择的战略是挖掘那些尚未成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群体可能就是农民和农村人口了，正如中国最近这些年发生的那样。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样的潜在对象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于是资本家将目光转向了女性劳动者的身上，与此类似的还有对那些一直努力维持不让自己成为依靠工资过活的群体的财产的剥夺。具体到美国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家庭农场主及小店主一直都是资产阶级实施无产化战略的主要对象。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些做法都比通过解雇工人和技术革新来提高失业率更可取，因为后者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或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对失业问题负有责任的话就更是如此。

由于劳动力紧缺总是局部性的问题，因此资本或者劳动力（或者二者一起）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对提升局部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即便只是短距离的迁移（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有很多企业从工会组织比较完备的核心城市搬到有大量潜在的没有工会保护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乡村地区），也会使社会各阶层在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力量对比发生显著转变。而远距离的迁移，比如，企业从高度工业化、工会力量强大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向南部、西部地区迁移，或者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部地区富余的劳动力向北部城市转移，同样也会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产生影响。最近，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越来越常见。



20 世纪 70 年代，在美国以外国家出生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过 5% 左右，但是到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 12.5%，这一切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美国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移民浪潮，劳动阶层内的种族主义行为和种族歧视现象不断涌现。

总而言之，资本家试图通过劳动者之间对工作岗位的竞争来达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他们还常常根据性别、种族、语言、政治、宗教信仰等对潜在劳动者进行分类，以至于劳动者在这些方面的差别似乎成为劳动力市场维持运转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它们不仅沦为了资方控制劳动力供给的工具，而且成为劳方中的特权部门的棋子，后者往往利用种族及性别等要求来减少竞争。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一直伴随着各种宣扬自己具有“天然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的声音，这种优越性合法地赋予了一些人等级特权，甚至统治权力，全然不顾国家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资本家阶层并不愿意利用或鼓励通过这些差异对工人进行分类，反倒是工人阶级自己一直试图以种族、宗教、性别等为准绳来界定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事实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劳工组织往往通过施加种族或性别方面的限制性条件来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激烈程度。

试图维持这种差异的力量的强度可以通过下面的事例得到证明，那就是即便人们为争取同工同酬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即便是在美国，这个对于平等的诉求很强烈的国家，男性和女性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东亚，性别歧视问题也依然存在，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新兴无产阶级主要由女性劳动者构成。在美国，黑人和白人、西班牙和葡萄牙裔与亚裔工人之间的工资也一直存在差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在印度等地，社会等级的差异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上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虽然那里的法律倡导对

不同阶层要同等对待。因为所有的劳动力市场都是区域性的，对资本家来说是这样，对工人来说，尤为如此，所以社会或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如果说它们还有那么一点意义的话，首先也是建立在特定地理区域的基础上，之后才逐渐发展成全国或世界性的运动。尽管资本家也常常依据种族或其他标准而被划归到不同的类别（当然，和工人阶级比起来，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共性），工人们发现他们很难利用资本家之间的差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针对华尔街上的金融大腕们的“反犹太运动”的结果也往往令人感到扼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创新大大降低了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劳工组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难度。在过去10年，正如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的，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的方式相比，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在劳动力供给机制内部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些矛盾尤其产生于阶级组织和阶级政治所带来的推动力，就像工人们以单个人或集体形式在各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实践的那样。实际的工资水平由在既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上，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决定。所谓既定的、可接受的水平，是阶级斗争、惯常标准及社会契约（它们通常并不是隐晦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非常明确的，如享受一定的医疗保险和教育的权利）的综合产物。因此，国家作为为社会生活制定粗略准则的一个关键的制度性框架，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区域性的，因此，即便是在较近的距离内，生活成本和生活标准等也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显然，纽约的生活成本不同于水牛城，当然也不同于孟买那样的城市。所以，进行工资协商的制度框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有时基于国家范围，有时则基于地区范围，如美国各州。后一种情况会引致所谓的“生存线运动”，每个地区对生存线都有自己的定义，而且往



往一个比一个高，就像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反对提高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时发生的那样。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工人运动的力度、组织程度和诉求各不相同，所以对资本持续积累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也很可能在某个地区不断增强，但是在另一地区却在不断减弱直至消失不见。劳工组织确实拥有一项终极权利——组织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并不是对称性的，因为那些拥有货币储备的人（通常来说，也就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工会相比总是略占上风，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大范围的劳工骚乱这一长期威胁仍然是一股重要的后备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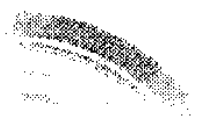
在劳资斗争的一片汪洋之中，还是会有很多风平浪静的“孤岛”，在那里，因为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满足需求，资本可以相对轻松地发展壮大。在我看来，下面的说法不失公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同政治派别的互相融合（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技术的革新、资本流动性的提高，以及在先前的外围国家或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原始积累浪潮及来自那里的移民有效地为资本解决了劳动力供给问题。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区域性限制因素，世界范围内有大量可供利用的劳动力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们扩大了阶级斗争的规模，冲击着资本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极力反对单个资本家奉行的“哪怕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的个人主义哲学，正是由于此，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才得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对廉价商品的生产进行补贴，从而将劳动力价值维持在较低水平，比如，19 世纪中期，英国的利益集团不断降低小麦的进口关税，从而降低面包的价格；美国在 2010 年以来出现的沃尔玛现象，连锁超市从外国进口了大量廉价商品。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可能还会支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投资，例如，改善他们的医疗、教育、住房条件，就像亨利·福特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倡 8 小时工作制、日薪 5 美元一样，所有这些举措最

终都将提升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保证消费品市场上存在足够强劲有效的需求。

在劳资双方的斗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确切地说，当某一地区的工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完备、力量比较强大时，资本家阶级就会想方设法掌控政府机关，以保证自身利益，就像我们前面曾提到的在皮诺切特、里根、撒切尔夫人等执政时发生的那样。而通过政治上的左派组织起来的工会则可能会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像在很多地区在某些时期发生的那样，如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解除强有力的劳工组织所构成的威胁，对资方来说逐渐成为一张有利的王牌。资产阶级的另一张王牌则是为资本的流动提供便利或给予补贴，使其流向对资本最为有利的地区，包括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及劳工组织力量较弱的地区。在此，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国家之间为吸引更多投资而展开的竞争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区域性和国家级政府，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承诺，保证提供充足数量、具备一定素质（具有某种技能、曾接受培训、性格温顺等）的劳动力供企业使用。无疑，这样一来，政府机构将追随企业而不是劳动者的脚步，但是它们仍然会对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如大学或社区学院等）予以关注，因为这样做有利于高科技企业进入本地区，从而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妨碍充足劳动力供给形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具一格的危机成因理论。所谓的“利润压榨”危机理论正是建立在劳工关系和阶级斗争这个永久性难题之上的，包括在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永久性难题。当劳动者内部、劳资之间的关系对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构成威胁时，危机就会爆发，除非资本可以找到某种方法克服或者避开这一威胁，或者，更可能的情形是，我们前面



提到的各个方法的综合。一些分析人士喜欢把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经历）解释为利润压榨情形的一个范例，如安德鲁·格莱恩，他在与别人合著的《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压榨》（*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一书中的评论令人过目难忘。毫无疑问，对劳动力资源的管理、劳工组织的运转方式及劳动力的供给是当时主要的政治议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是美国，工人组织的力量相对比较强大，各个政府机构对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或者充满恐惧，或者是在政治上的左派力量的努力下，所制定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向劳动者的利益进行了倾斜。毋庸置疑，这一情形对资本的持续积累来说，构成了严重的障碍。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早期，新兴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帮助资本成功地避开了这个障碍，而这一过程也在方方面面界定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本质。

资本主义要想存活并发展下去，就须要不断超越或避开种种障碍，持续进行积累。正如我在 2009 年年末写到的，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并没有收到太多有关利润压榨的信号。劳动力大军几乎无处不在，在这方面，资本也没有碰到实质性障碍。全球范围内对工人运动的政治攻击，使得工人人们的反抗从激烈变得温和。因此，2008—2009 年的这场危机并不能简单地用利润压榨来予以解释。因劳动力供给数量过大而导致的工资水平下降，以及进一步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反而要严重得多。

但是，有必要提醒各位的是，劳动力的问题永远不会一劳永逸地彻底得到解决。劳工骚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展到令人头痛的境地。地区性劳资纠纷的发展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一直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甚至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屡屡爆发的危机的根源。不过，事实表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本力量过于强大而劳方力量过于弱小，而不是相反。

■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素：生产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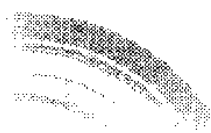
当资本家进行再投资时，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额外的可供利用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所需的投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掉的中间产品，如生产外套所需的能源及布料；另一类则是机器、固定设备（如厂房）及包括交通运输系统、管道和港口等支持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显然，按照这一定义，生产资料的涵盖面极广，类别很复杂，而且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生产资料的供应出现断流，都会威胁到资本的持续积累。

如果没有充足的钢材、塑料和电子元件及橡胶轮胎可供利用，汽车产业就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同样，如果没有高速公路供汽车在其上行驶的话，汽车产业的产能扩张也会显得毫无道理可言。

我们现在常说的和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供给链”环节的技术革新必然会引起其他环节的创新，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19世纪随着电动织布机的普及，棉纺织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从而对棉花生产（轧棉机）、交通运输、化学及工业印染技术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将过去赚得的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新增资本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可供利用，二是有数量不断增加的可以满足新增工人需要的工资商品。主要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将原材料组织起来，维持资本的持续流动。换句话说，资本自身必须在生产扩张之前，为自己的持续扩张创造条件。它怎样才能平稳顺畅地做到这一点呢？

马克思曾经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浪漫而优雅的答案，那就是“真爱之路永远不会是平坦的”。这里出现短缺，同时那里



出现过剩是社会的常态，有时候这种短缺还会成为生产进一步扩张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影响到资本流动的连续性。令人庆幸的是，各种有效运行的市场通过反映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可灵活变动的价格信号，成为调剂余缺的一种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些市场的作用下，劳动力被分成了若干个工种，生产过程也越来越显得迂回曲折，其表现就是，在产品最终被生产出来之前，要经过很多独立的生产步骤。最终产品中所蕴涵的要素的数量不断增加，如在汽车中安装复杂的电子设备（如 GPS 等），这使得供给流越来越纷繁复杂。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诚实可靠”的市场结构，使它发出恰当的价格信号，来保证资本循环的持续性。资本以复合增长率持续扩张和通过价格信号调节市场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要求政府对垄断、囤积居奇、操控市场等行为进行管制，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减少商品流动过程中的一切社会壁垒，如关税、配额及不必要的延迟等。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各国边境取消了对运货卡车的检查，这一举措对保证和很多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原材料供应的平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相反，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出现紧张局面，势必会干扰重要投入要素的流动，进而危及资本的持续积累。2008 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俄罗斯切断了对乌克兰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这甚至给远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生产商和消费者造成了严重困扰。

但是，市场并不是进行调节的唯一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商逐渐开始直接和供应商发生联系，通过对供应模式及流程进行优化，原料采购订单直接被送达到供应链的底端，供应商按照准时制原则（Just In Time Principle）进行发货，从而使得无谓投资的成本最小化。在很多产业，如汽车、电子元件等，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这种直接联系甚至开始取代公开市场。生产商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释放出关于他们需要多少原材料的信号，

供应商则根据这些信号制定生产决策。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介入，通过自身的投入-产出模式对经济整体、私人组织不力的供应链的某个环节，如电力和水资源供应，或者是和生产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等，进行调控。尽管人们（美国人尤其如此）普遍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效率损失，但是日本和新加坡在工业化过程中却提供了很多例证，表明政府为资本流动制定计划并择机进行协调、干预和组织，和仅仅通过公开市场进行配置相比，要高效得多。如果企业自身都可以通过优化流程避免自由市场出现混乱，那么凭什么认为政府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呢？

抛开政府和市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二者其实都意味着在一个劳动力所属社会分支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合理的制度安排，为资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流动提供便利。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资本流动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尽管在法律缺失、腐败及产权不清晰等条件下，资本仍然可以想方设法完成循环和周转，但是通常这对资本的繁荣来说，绝不是什么有利条件。因此，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以及保证形成一个“良好的商业气候”（包括对抗腐败和法律不完善），成为等待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完成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当代美国和欧洲各国在世界很多地区施行帝国主义行径的主要目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要求成员国政府就一系列“良好表现”签署承诺书，很多政府除了签字之外别无选择，如果它们还想继续和美国、欧洲进行贸易往来的话，从而使得企业可以在不必接受太多政府管制和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开展商业活动。

遗憾的是，很多这类行为通常来说会对价值的生成形式展开攻击，而且一旦成功（通常来说是不成功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内涵及社会团结的表现形式就会被瓦解。简言之，非市场化的或非资本



主义的生活、生产模式被视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因此必须予以废弃，从而为构建了资本主义强大战车的 3% 的复合增长率让路。自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将资本积累的绝对障碍逐渐分解成一系列小的壁垒——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逐渐被转化或超越，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和政治传奇。

但是，事实证明，在供应链内部，还是存在一定张力和潜在矛盾的，并且可能导致所谓的“失衡危机”。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结尾，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公式”来分析经济中两大部类之间的动态关系，即消费资料（即生产、维持以及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产品，后来扩大到包括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的奢侈品）的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品）的生产部门。接下来，马克思问到，既然资本家有通过竞争在不同部门之间实现利润均等化的趋势，那么资本为什么还会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个部类呢？马克思阐述了一些很容易发生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下，再投资过程中资本的流动导致两大部类之间出现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出现失衡是因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单个资本家有可能导致资本在两大部类之间出现系统性错配。后人利用极为复杂的数学方法在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马克思整体的推理过程是正确无误的。例如，20 世纪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道雄认为，根据两大部类中技术变迁的力度和资本集约度的不同，经济将围绕平衡增长路径或者进行“爆炸性震荡”，或者呈现“单调变化”。这一观点强化了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结论，哈罗德-多马模型间接建立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这一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总是处在平衡增长的“刀锋”上，一不小心就会从那条窄窄的路径上跌落下来，一头栽进危机的泥潭。

哈罗德和多马还证明了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它既是经济增长重新回复均衡的唯一途径，也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至少暂时得以解决的唯一途径。危机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合理的合理因素。在危机过程中，正如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牢记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经常自问：正在被合理化的是什么？合理化正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因为这些不仅会界定我们摆脱危机的方式，而且决定着资本主义未来的特征。在危机期间，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最终的决定主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人们对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的预测。罗斯福新政和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时期政策的反转比较起来，并不是更加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可能出现的结果也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分析人士有义务搞清楚什么是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把这些可能性和世界范围内阶级关系既定现状的条件下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密切联系起来。

自然资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

在把生产资料送达资本家手中这个长长的供应链的底端，潜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潜在的自然条件的制约。资本主义和所有其他生产模式类似，都仰仗大自然的恩赐。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和退化与劳动者集体组织被分解一样，毫无道理可言，因为它们都处在一切财富生产过程的底层。而只考虑自身的短期利益、处在鼓励自由竞争的法律的制约之下的单个资本家，对于劳动者阶层及土地的态度，永远都是“哪怕世界一片火海，主要我自己好就足够了”。即便资本家转变了态度，资本持续积累的过程也将给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各种废弃物的数量也将不可

避免地逐渐增加，从而对生态系统在不产生有毒物质的前提下吸收它们的能力形成挑战。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很有可能面临越来越难以逾越的制约和障碍。

纵观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史，对资本的稀缺性从来不曾像对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那么刻意强调。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农业部门利润的逐渐递减最终将导致利润率降低为零，进而导致我们常常听到的资本主义被终结这个结局，因为所有的利润都将被用于支付土地租金及自然资源的供给。当然了，马尔萨斯还进一步做出了阐释，在他的人口理论的最初稿中提出，人口无限增长和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足以引发饥饿、贫困、瘟疫及战争，而不论政府实施何种政策，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开始。

尽管马克思也一直在思考资本主义最终将走向哪里，但是他和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差异。针对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反驳说，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新的肥沃的土地不断被开发（尤其是在美洲），这些事实拆穿了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已被马克思所认可）及危机的爆发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关这个谎言。马克思不无讽刺地说，面对危机时，李嘉图“在有机化学中寻找庇护”。而对于马尔萨斯，马克思最核心的反驳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贫困的原因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家对维持和生产足够的劳动力以供未来使用的迫切需要。但是，把工人较低的生活水平归因于自然资源的稀缺（而不是资本的剥削）的观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死灰复燃一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那场危机期间，从环境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大有人在。丹尼拉·麦多斯所著的影响力极大的《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一书就出版于 1972 年，而“地球

日”则是在1970年确立的。所以，关于自2006年以来经济时不时地出现波动，直至演变到我们今天面临的这种困难局面，人们很多地用资源或环境问题（从石油价格飙升到商品价格上涨，再到气候变暖）来予以解释，或者至少把它们视为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证明，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受到自然的制约，有时候我们可以实现突破，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制约是无法逾越的。困难之处在于“自然”的涵盖面太广了，内涵也太复杂了，甚至这个词可以囊括世界上所有的有形之物，当然也包括人类活动创造出的“第二自然”，我们稍后会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说明。因此，我们很难对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在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做出综合评价。比如，自然资源的概念往往是从技术、社会或文化的角度进行评定的，因此，任何显著的自然稀缺性从理论上来说都可以通过技术、社会或文化的变迁来得到缓解，即便是无法彻底解决的话。但是，在现实中，文化形式往往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僵化、问题重重。

海洋中的鲨鱼已经因被过度捕杀而面临灭绝的地步，仅仅因为一些国家的人民喜欢吃鱼翅，与此类似的还有非洲象，不同的是它们被猎杀的理由是象牙被磨成粉末之后，据说可以提升人的性欲。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更偏重肉食，这对能量消耗和气候变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牲畜会排放出大量的沼气，另一方面喂养牲畜所投入的能量远远超过人类食用它们的肉类所摄取的能量。英国人对在一片土地上建造“属于自己的住房”的偏爱则是导致人们到郊区去居住和生活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更浪费能源，而且占用了大量的土地。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这些违背生态规律的文化形成和延续归咎于资本主义，恐怕都是不恰当的，尽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就是

在略显乖张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确实更适合做出或者鼓励做出这样的文化选择，如资本主义支持郊区化发展，提倡人们以肉食为主，只要是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

另外，“自然”这个词太简单了，不足以囊括生命形态地理分布的多样性和相互交织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某个地方的湿地、某个地区性物种、某种特定生物的栖息地消失不见了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即便和必要的人口增长比起来是微不足道和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和资本以复合增长率持续增长的重要性相比了。但正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加在一起，才引致了各种各样的宏观生态问题，如全球范围内森林面积锐减、生物栖息地和物种多样性的减少、沙漠化及海洋污染等。

认为人和自然之间是内在辩证关系的，这既意味着人类行为可能会发生一系列转变，也意味着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包括人类对自然本身产生的影响，这些都使得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开放式的。尽管这样来定义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否定了不折不扣的、漫长的更不用说是“最后”的环境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定义也暗含着可能会出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我们不想看到的恶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恶果是什么了）这方面的内容。冷藏技术通过延长食物的保质期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使得大规模城市化成为可能，但是之前有谁能够想到，制冷过程中使用的氟利昂会导致臭氧层空洞呢？又有谁能想到 DDT 会通过食物链的传递引发生活在南极地区的企鹅的死亡呢？或者，在第一次使用石棉和铅涂料的时候，有谁能想到它们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这么大的威胁呢？很长时间以来，至少是从古希腊时期起，人们就明白人类行为给环境带来的恶果是多种多样的，古代人类利用火及毫无节制的放牧行为已经足以使得环境变迁达到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无处不在的地步，更不用说现代各种化学制剂给生态系统造成的大范围危害了。

不过，资本积累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地做出更深层次的、更大范围的转变。

18世纪80年代前后，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厂的烟囱开始吞云吐雾，在那之后不久，英国本宁山区附近的泥煤矿就因为酸性过度沉积而坍塌了。但是，和美国俄亥俄州山谷里的发电站给新英格兰地区的森林、湖泊等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或者是和英国的发电厂在20世纪50年代给斯堪的纳维亚造成的危害比起来，这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嘴里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接受者，相反，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描述的，它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永远追求革新的系统”。地球内部的结构性运动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灾难性事件，而大气和海洋循环系统的不稳定性则造成了飓风、龙卷风、暴风雪、干旱及热浪，这一切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波及面不管从地理范围看还是从社会范围看都并不完全相同。此外，利用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大发横财，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无法让人淡然处之的特征。

尽管人类已经成功地攻克了淋巴腺鼠疫、天花等疑难杂症，我们现在仍然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病菌和疾病的威胁，如艾滋病、SARS、西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及禽流感等，至于类似于1918年的大流感那样夺走了数以万计人生命的新流行性疾病的爆发，更是不容忽视的隐形炸弹。长期以来，气候一直被认为是一系列人为和非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清楚，虽然我们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试图把人类行为对全球范围内自然气候变迁的影响弄明白。虽说人类对大自然会产生影响是毫无疑问和争议的话题，但是具体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则几乎完全无法预料。过去，即人类对地球表面产

生影响之前的气候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快速的，至少以地质时间（数百年）来衡量是这样，而且往往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影响面也非常广泛（比如一股一股的物种灭绝浪潮）。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人为因素带来的效应依然符合复合增长率规则，对此，我们有必要给予密切关注，至少要进行细致的调研并采取谨慎的国际监管措施。例如，1989年签订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禁止应用氟利昂，诸如此类的行为。但即便如此，任何认为自己可以对气候特征做出些许确定性预测的人，都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然而，综观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在和大自然的关系方面，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同时伴随着一系列大范围的不可预知的结果，从对人类的影响角度衡量，这些结果好坏不一。因此，那些认为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存在绝对障碍，因而从理论上来说不可超越或回避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总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无须经受某种意义上的环境危机就可以成功征服它们。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危机与鲨鱼数量的急剧减少不同，考虑到后者给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大范围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对此说声“非常遗憾”。

资产阶级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一些政策，都希望可以实现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可以轻松地为人类所用，以发展经济，并保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这类问题，秉持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会非常尖锐。

例如，一方面，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来说，保证有大量廉价的石油资源供应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方面，这主要是因为1945年以来通过郊区化来吸收过剩资本的运动是建立在廉价石油供给的基础上。因此，为了保证世界范围内的石油资源开采对美国敞开大门，美国被

卷入到中东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冲突之中。能源政治，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一个例子，不管是在某个国家机器内部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另一方面，廉价石油供应导致过度开采、气候变暖及其他一系列空气质量问题（臭氧层空洞、烟雾、大气颗粒物等），并且这些因素日渐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大规模的城市扩张运动不仅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使得所开发利用的土地质量等级不断下降，更容易遭遇洪涝灾害，另外还使得河道淤积，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热岛”。（“热岛”是指城市中心区气温偏高的地区。——译者注）这些环境效应进一步加速了汽车产业发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汽车产业在吸收过剩资本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损耗。

以《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杂志的创办人吉姆·奥康纳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然界存在的这些难题或者说障碍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第一大矛盾毫无疑问是劳资关系）。就当前情况来说，毋庸置疑，这个“第二大矛盾”与劳动力供应问题比起来，引起了人们至少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政治关注。谈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表示出了关心、焦虑或狂热，从原材料的可持续供应到可供城市和农业资本家利用的土地数量有限，再到越来越多的有害废弃物的处理，不一而足。不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环境在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将关注点放在这一原动力，以及驱使这种原动力朝着某些情况下于环境不利的方向发展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身上，并因此而过度强调假想中的“纯粹的”自然限制的做法，也是极端危险的。当然，不用说，资产阶级至少总是乐于听到有人从环境本身出发进行辩解，令他们免除“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这个恶名。比如，2008年夏天当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创下新高时，大力宣扬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助于减少贪婪的石油公司和投机分子所面

临的指责。

奥康纳的研究认为，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偃旗息鼓，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逐渐跃升为首要矛盾。在他看来，环保运动成为了（或者说应该成为）反资本主义浪潮的前沿，而且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环保运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仅存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至于环保运动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展开，我在此不想给出结论，我想留给各位自己去思考。但是我们确信无疑的一点是，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矛盾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这个矛盾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和压力与很多其他问题一样，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演化为一场紧迫的危机，这要求我们从各个方面（文化、社会、技术）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而顺利攻克这一难关，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资本持续积累的框架内是这样的。诚然，资本主义在过去成功地跨越了大自然制造的各种障碍，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还实现了经济收益，因为环保技术一直都是一笔“大买卖”，将来无疑会变得更大，但是这些辉煌过去并不意味着大自然不会成为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以我们目前面临的这场始自 2006 年的中度危机来看，自然条件的制约至少从表面来看还不会成为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当然了，所谓的石油生产的“石油峰值”及其对能源价格的影响要另当别论。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石油问题进行简单回顾与评述。

作为背景资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 18 世纪的英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构成潜在重大威胁的所有自然条件方面的限制，随着化石燃料的利用及蒸汽机的发明，都被成功突破了。在此之前，土地肩负为人类提供食物和能源的双重重担，由于当时交通运输能力的限制，看起来，土地日渐无法继续以复合增长率来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1780 年前后，人类开始从地下寻找能源（主要是形成于石炭纪时期的煤矿），土地只须承担食物供

给的责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人类又发现了大量形成于白垩纪时期的能源储备，也就是石油和天然气。我之所以要交待这些，是想告诉各位，通过提炼乙醇来应对当前的石油危机的做法是多么荒唐可笑，因为这不过是把能源供应的重担重新交还给土地，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这样做所生产出的能源数量低于消耗的能源量，而这肯定会立竿见影地拉升粮食的价格。那些试图把我们带回到18世纪英国所面临的在食物和能源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的政策，其用心之险恶令人震惊。那么这些政策是怎么来的呢？

石油生产的“石油峰值”之说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在壳牌石油公司任职的地质学家哈伯特根据石油新探明储备量的增长率和开采率之间的一个公式，预测说美国的石油生产量将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大值，然后就会开始逐渐萎缩。后来哈伯特离开了壳牌石油公司，但是他的预言却实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石油产量的日益减少，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一天胜过一天。现在美国每年大约要进口价值3000亿美元的石油，这几乎占到了其不断上涨的贸易赤字的1/3，为了弥补这些赤字，美国人每天须要向其他国家的人民举债20多亿美元。最近刮起的这股乙醇提炼风正是希望通过向强势的农业利益集团提供可观的补贴，来降低美国对他国的这种依赖的政治和经济脆弱性，这些利益集团是并不民主的美国议会的真正掌控者（来自偏远的小州的议员持有议会60%的选票），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华盛顿最强有力的游说势力（美国高额的农业补贴是和其他国家进行WTO谈判时，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因此而造成的几乎可以预见的食物价格的上涨对农业利益集团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尽管纽约市民会突然发现面包圈的价格上涨了50%。全球大饥荒也不仅仅是玩笑。正如一篇评论所指出的：“为了给一辆SUV的油箱加满25加仑乙醇，大约需要450磅玉米，这足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按照当前的（2008年）趋势发展下去，到2025年，出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总数将翻一番，达到12亿人。”

这些被越来越多的（而且很多是相当雄辩的）事实，即哈伯特用来预测美国石油生产峰值的公式可以用来预测全球石油供应，所佐证。根据相关数据，鉴于全球范围内的石油储备探明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可以预期，石油生产量的顶峰最迟在 2010 年前后也将达到巅峰。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石油生产国，包括科威特、委内瑞拉、英国、挪威和墨西哥，基本上都符合哈伯特预测的路径。而其他地区，如沙特阿拉伯（据说那里的石油生产量已经达到极限水平）、中东地区、俄罗斯（该国总统普京曾宣称早已实现最大石油生产量，不过这很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事实），及非洲的情况很难监控，但是石油价格从 2002 年的每桶 20 美元一路飙升至 2008 年夏天的每桶 150 美元（同期美国消费者用于汽油的支出翻了一番），已经足以证明石油生产的巅峰时期已经到来了。幸运还是不幸，这取决于你的立场和观点，接下来石油价格突然一路掉头向下，到 2008 年年底跌到了每桶不足 50 美元，这使人们对哈伯特理论适用性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而美联储则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必再担心油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而这也是美国在 2008 年年底将利率逐渐降低到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每桶 50 美元是一个临界点，油价高于这一水平时，乙醇生产将可以实现赢利，自 2006 年以来对乙醇生产的投资大规模扩张，美国乙醇提炼工厂的数目几乎翻了一倍，但是现在它们的命运看起来岌岌可危。

由自然条件决定的、通过哈伯特公式反映出来的资源的稀缺性体现在现实市场上，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烈的波动性？这需要我们做出解释。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另外一个分配形式——马克思也将这个形式“留待稍后”进行探讨，那就是土地和自然资源获得的地租。有两类地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对马克思所说的第三类地租即“绝对地租”不予考虑，因为我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

第一类很重要的地租叫做“级差地租”，最初这一名词指的是因为土地

和矿山的肥沃度或矿藏储备量不同而导致的地租差异，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些生产率很低的土地、煤矿和油井也不得不投入生产活动中。级差地租通常还蕴涵着地理位置的差异因素，靠近市中心的土地通常比偏远地区的土地更有价值，位于平原地区的油井通常来说也比深海或北极附近的油井更易于开采。以石油为例，为了弥补开采生产率最低、地理位置最差的油井的成本，须要在资本家愿意从事石油开采的平均利润率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标准利润率，而平均利润率最终决定着石油的基准价格。所有其他石油生产商都可以赚取一个超额利润，因为和在边远地区生产相比，他们的成本更低，产量却更高。这个超额利润归谁所有呢？因为资源附着在整片土地或整个油井上，所以资源所有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国家）可以收取一个特许权费，将土地或其他资源出租给他人使用。特许权费可以采取直接的货币支付（租金）以获得资源使用权的形式；也可能是企业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所赚取的利润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拥有资源所有权的实体（如国有石油公司）自行开采之后，在国际市场上直接出售原油所赚取的超额收益。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资源所有者在将资源租给他人进行开发利用之前，都会向对方提出一个底价。如果他们足够精明的话，他们可以索取全部或绝大部分级差地租，却不会影响到生产活动的展开。

第二类叫做“垄断地租”。资源所有者要求的底价证明了垄断地租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安排之下，垄断地租几乎和所有形式的财产权都存在关联。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人都可以收回财产的使用权，并且在底价谈妥之前拒绝将其租赁给他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底价通常来说相当低，因为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利用，生产商有很多选择，即便在某个还算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你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他们使用，总会有其他人愿意这样做。在某些情况下，底价甚至可能会接近于零，尽管这时看起来所有者没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的土地出租出去。

不过，在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土地的肥沃度和生产率并不完全是由自然条件先天决定的，对生产技术的投资和改善有助于将土地的生产率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土壤的肥沃程度来说，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一样重要。土地的所有者总是希望承租人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 19 世纪的英国“高级农业”（“高级农业”是指广施化肥的耕作方法，——译者注）大发展时期，始自 1873 年的漫长的农业大萧条之前，土地所有者更青睐于长期租赁，因为这样一来承租人就会采取一些有助于提升土地肥沃水平而不是使土地质量下降的长远举措，如灌溉设施、作物轮种技术等。这时，级差地租作为对长远改进措施的资本投资的回报，在租赁期内归土地使用者所有。但是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16 世纪人类围海造田得到的那些格外肥沃的土地呢？尽管级差地租只是一个单一的分配形式，但是它却妥善地解决了很难区分哪些应该归于自然的恩赐、哪些应该归于人类的主观努力的问题，虽说它提出了每个资源所有者都面临的一个战略选择：是不顾后果的对现有资源（不管其是自然的赏赐还是人类后天积累的）进行开采利用，直到它们被全部耗尽，还是对这些资源进行维护和改进，以期未来长期可持续利用。

但是说到石油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其底价取决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于是，油田的级差地租（不管是来自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是来自优越的自然条件，如较大的储备量）逐渐演变为垄断地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它对产油国的石油产量进行管控进而限制世界市场的供给量，从而将油价维持或稳定在预先设定的水平上。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个企业联合组织，所以 OPEC 的能力范围非常有限。但是，尽管往往会遭到抗拒和不满，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来说都可以从 OPEC 维持市场价格稳定的行动中获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石油价格会出现波动呢？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石油市场不仅受所谓的自然稀缺性驱动，而且会受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影响。石油期货很容易成为投机活动的攻击目标，任何认为石油供应将出现短缺（不管是因为政治不稳定，还是因为战争或石油生产能力达到极限）的信念都会导致油价大幅上扬，在需求出现高峰，而供给哪怕是暂时性短缺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等国家因为经济飞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量剧增而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石油期货以虚拟资本的形式被资本化了，几乎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对其进行投注，他们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接下来则是希望通过操纵市场来赢得赌注。毫无意外，随着油价的高升，不管条件多么恶劣的边缘地区都被开发利用起来，某些情况下是二次进行开发，毕竟对“边缘”的定义是不断变化的。比如，对加拿大阿萨斯卡地区的焦油砂进行开采的成本非常高昂，但是当石油价格超过每桶150美元时，这样做就是有利可图的了。问题是，在这些边缘地区进行生产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对需求做出反应的时间相应也就比较长，除非有现成的可供利用的生产能力，比如，由OPEC控制的生产能力，如果OPEC能放松管制，这些生产能力很快就能发挥作用。但是同样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提炼过程在内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且该过程对资本市场、利润水平及石油期货市场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其中石油期货市场是进行风险对冲和对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市场，可供利用的剩余资本的数量对其影响极为显著。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的过剩的流动性，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在石油期货市场上赌一把呢？尤其是在有人对你说“石油峰值”近在眼前的情况下。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双向行驶的车道，自然发生的演化变迁过程中的异常现象与偶然事件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它们不仅界定了自然的含义，而且界定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引致的异常现象与偶然事件交织在一起。围绕着自然稀缺性而产生的资本积累的障碍不断得以解决，同时又不断有新的障碍形成，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这些障碍完全有可能演变为绝对的矛盾，甚至危机。

■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界的形态。环境一词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排水之后的沼泽和湿地，经过重新修整的河流及疏浚的河道，已被砍伐并重新种植的森林，已经修建完成的道路、运河、灌溉设施、铁路、港口、航线及航站，已有的大坝、发电站及电网系统，水源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电报和通信网络，繁华的都市，广袤的乡村，工厂，学校，居民区，医院，购物中心及旅游胜地，这一切都是环境的构成要素。此外，处于这些环境中的是一些全新的物种，如猫、狗、牛羊及鸡鸭鹅等家禽，它们或者通过特定的饲养方式进化而来，更有甚者，现在有的则是借助了可使玉米和西红柿等性能发生转变的基因工程，或者因为基因突变或根据环境变迁衍生出了新的种群，回想一些新的病毒，如禽流感的发源地就是新近出现的大规模家禽养殖场。目前，地球上完全没有随人类行为做出适应性调整的纯粹的、原始的“自然”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殆尽了。另外，各个物种，包括人类自身，按照有利于其自身繁衍的方式改造周边的环境，也并不是什么怪异的事情。蚂蚁会这样做，蜜蜂会这样做，而海狸这样做的投机性则最强。既然蚂蚁群居在同一个蚁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像纽约这样的都市的形成也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但是，构建这一切无不耗费了人类大量的精力和才华。既有的环境囊括了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它的形成和存续过程中，耗费了巨

额的资本。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是，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包括城市化在内的前述种种工程都是无法启动的。而投入到这类工程中的资金，从长远来说都希望能够获得一定的回报。这就意味着要求有政府机构参与，或者有一个足够强劲的金融体系，以既定的长远目标为导向，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并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继而耐心地等待投资回报。通常来说，这意味着国家-金融节内部将发生一场剧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抵押债务的证券化、通过创建衍生品交易市场分散投资风险等在内的金融创新活动，它们无不心照不宣地（现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导致大量的过剩流动性进入了城市化过程及世界各地环境改造进程的各个领域。

每一次，国家-金融节内部的创新都毫无例外地充当着过剩资本参与城市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大坝和高速公路）的必要条件。但是在过去30年中，对这些工程的过度投资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和导火索。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自1970年以来，很多次金融危机都是因资产市场的过度扩张而起。

如果先期不具备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核心的特征的复合增长率，将没有办法实现。一些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繁荣，这要求具备便利的交通与港口条件，这就好像，如果没有充足的（有时是大量的）水和能源投入，如果没有保证生产不受供给（包括劳动力）和营销活动制约，能正常进行下去的交通、通信设施，任何工厂都不可能正常运营下去。另外，除了从事生产之外，工人们同样还存在生活、购物、让子女接受教育，以及放松休闲的需求。

作为既有环境的构成要素，上述范围广博的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循环和积累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必要物质基础。此外，为了使这一基础性结构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还须要不断对其进行充分维护。因此，经



济产出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被投入到保证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充足供应中。维护工作一旦失利，比如，电网中断、水资源供给不足或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瘫痪等，即便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过去几年间，美国经历了类似于桥梁坍塌、电网无法正常工作等基础设施方面的灾难），后果也不仅仅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那么简单。除此之外，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同样也要仰仗新的基础设施的建造。简言之，资本主义能否存续取决于能否按照与一定的经济复合增长率相称的速度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并为其融资。资本须要在某一个时点创建一个足以满足其自身要求的世界——第二个自然，然后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为了满足自身进一步积累的要求，对这个世界进行改造。

但是，资本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动机是什么呢？最直接的答案显然是高额的投资回报率，而且这意味着为了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所付出的成本实际上由这些设施的受益人承担了。关于这一点，对可以出租或出售给使用者的房屋、商店、厂房等来说，很好理解，我们也可以想象将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如高速公路、学校、大学、医院等）建立在收费服务的基础上。但是，仍然有很多类型的基础设施是归大众所有的，很难直接要求使用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再次扮演重要的提供者的角色。为此，政府要征收税赋。由法国第二帝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提出，后经凯恩斯一般化的国家有效财政支出理论认为，随着私人资本不断对新基础设施带来的机会做出积极响应，计税基数也应该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导致了“国家-资本”循环的出现，其中政府投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它们还希望可以获得额外的赢利以进行新的基础设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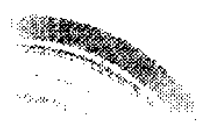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须要把生产者这一概念从惯常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提到生产，人们头脑中浮现的画面通常是工人在工厂里，如生产汽车的生产线，辛苦劳作的场景。但是，那些修建和维护高速公路

的工人、在水资源供应部门工作的工人、制衣工人、家政人员、环卫工人和装修工人的工作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各行各业的工厂主和工人都积极地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中来，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新的空间、领地及环境的开拓和建设。这一进程中爆发的各种领域的政治斗争通常来说也展现出强烈的独特性，比如，建筑工人虽然确实会因为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安全保障条件等与资方发生激烈的冲突，但他们却因为一味地支持私人开发的、政府开发的项目，而不管项目是什么类型而饱受指责。根据这些项目在环境、政治、社会等层面引发的反对呼声的大小，根据这些项目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对弱势群体土地所有权的强占程度的强弱，工人阶级的各个分支可能四分五裂，同时也可能结成反对资本家阶级的统一阵线。

新的空间和场所的发掘吸收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与此相伴随，新的环境也被构建起来，在这里，矛盾依然存在，资本循环仍然会因危机而中断。如果将附着在土地上的大量固定资产（下次乘坐飞机时，你只须要低头看看，就可以对资产范围之广博有所领悟）释放出来，那么当时当下的资本家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利用并支付一定的费用。遗弃这些资产，就像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浪潮下很多老工业城市所做的那样，显然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主要是社会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届时，受害的将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债权人，整个经济都会受到波及。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自身内部（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是在其创造的空间、场所、环境内部）瓶颈的论断变得清晰可见。

技术和组织形式不断创新

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技



术及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在我看来，马克思对人们做出不同选择的动机、资本家为何会对技术（尤其是机器设备）及新的组织形式如此迷恋做出了完美的理论阐释。遇到麻烦了？不要着急，一定可以通过技术或组织形式的变迁得到解决。

机器自身并不能创造利润。但是，那些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或企业组织形式的资本家往往可以获得比其竞争对手更高的利润率，并且最终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工人消费的产品价格通常来说都是不断下降的。因此，在无须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成本就相应地下降了，进而给资本家带来更高的利润。如果生产力水平提高得足够多，在工资下降的条件下，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都有可能得到提高。20世纪90年代，随着沃尔玛等零售商以低廉的成本从外国大量进口产品，美国确实曾出现过这样的状况。要注意的是，相对而言，沃尔玛更应该归到组织形式而不是技术这一类别。

结果就是资本家对组织形式和技术变迁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写道：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堪称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

这也是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内部本身就蕴涵了变革的种子？又是为什么

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的生产模式都完全不同？人类对创新的永恒的、狂热的追求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这种狂热才能发展成为人类演化的核心驱动力。绝大部分既有的社会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保守的，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压制人们对变革和新理念的渴望。

从17世纪早期天主教会伽利略的质询和审判，到18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由于各种原因，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并且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出确定的答案，在这期间，欧洲特别是英国涌动着一种思潮，人们试图重新判定究竟是哪些社会、政治、文化及法律方面的因素，使得变革和创新成为了创造财富和权力的种子。统治阶层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却不一定是通过某一个人或此人的后代。

新兴社会形态的根基是私人财产权、个体主义、某种形式的自由市场及自由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现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对经济进行管理，从而实现财富和权力的扩张。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看来，这一过程进展得并不顺利，我们只须要读一下狄更斯的著名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看看主人公在英国大法官法庭上漫长的法律诉讼，就不难发现，英国社会的主旋律不过是新旧两种社会秩序之间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不过，在英国及其昔日的殖民地美国，新的制度安排带来的鼓励竞争的法律制度可以在不考虑管制对象所属阶级及社会地位的条件下，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因此，将革新从旧制度的压制和管控下解放出来的核心机制，是自由竞争。通常来讲，竞争促使人们对技术及组织方式不断进行创新，因为那些生产过程更有效率、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资本家往往能比竞争对手获得更高的利润。对更高利润的渴求贯穿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获取（也包括从下游供应商到现代化工厂的零库存供应链结构），到

高效低成本的营销战略（沃尔玛模式）的制定。资本主义企业，不管是小型私企还是行业巨头，都不得不密切关注技术和组织方式，并不断追求能给他们带来哪怕是一时的超额利润的创新。问题是，这种超额利润通常都是暂时性的，因为竞争对手很快就会追赶上来，甚至后来居上。

激烈的，在资本家们看来有时候甚至是毁灭性的竞相实现跳跃式创新的压力，在很多情况下使得资本家狂热地迷恋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变革，认为这样做可以带来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及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培训。这种痴迷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创新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发展为一种生存技能，通过使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相信如果我们没能掌握最新的机器设备或技术，我们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创新不断地开疆扩土，扩大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影响的恐惧，导致一些人试图控制，或更进一步试图压制可能给他们带来威胁的创新活动。最近几年，利用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垄断、买断专利或有意识地破坏特定的创新路径（如电动汽车）的行为时有耳闻，但是正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所证明的，从长期来看，前述种种行为根本达不到所希望达成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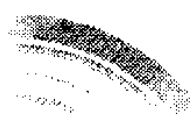
不过，发挥重要作用的还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其他一些决策机构在创新的孵化过程中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政府机构。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象征着欧洲大陆正式建立起一个政府间机制，和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且规定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有权动用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领土权。自此之后，很多国家纷纷卷入到对先进的军事技术、组织方式、交通与通信设施的追逐之中。

各种由政府资助的，尽管名义上是自发设立的“学会”，如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开始倡导首创精神，包括鼓励人们研制航海用的天文钟，从而为海上航行提供便利，但是，当时掌权的贵族阶级拒绝承认一个普通的民间工匠约翰·哈里森的贡献，事实上，哈里森1772年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紧接着，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谓的“军事-产业综合体”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形式出现了，1747年创办于巴黎的“桥梁与公路学院”凭借在基础设施和军备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成为法国的一个传奇。很快，这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成为社会的主流，其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期间各国军备竞赛、太空竞赛等活动的风起云涌，政府和各行各业（从核能的利用，到卫星的研制，再到医疗保健行业）的企业一起，开始直接参与到研发活动中来。换句话说，战争或者是紧张的政治形势（如“冷战”，以及最近所谓的“反恐战争”）在引导创新路径的选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国家-金融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样，围绕着经济中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部门的研发活动，产生了“国家-企业”节。监查也成为一项关键的活动。

由于研发水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基础地位，政府机构的很多部门，涉及医疗、食品、农业、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各个领域，以及相对更传统的军队和监查部门，在准公共科研院所的支持下，对资本主义重要产业的技术及组织方式的创新，发挥了相当强的影响力。以日本为例，将原本毫不相干的企业活动以某个组织或技术研发项目为核心联结起来的，正是其政府机构，并且日本凭借这样的方式，通过产业化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后来，这一模式逐渐为韩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家所采纳。）

以上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技术和组织形式变迁的速度大大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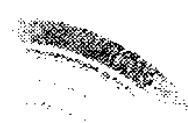
新产品不断被研制出来，新的生产方式相继涌现。但是，考虑到旧有的技术及组织方式尚未完全折旧就要被抛弃，以及生产过程不断重组对其连续性及其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损害，这样的创新浪潮即便是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或者是毁灭性的。举例来说，先前所进行的投资（机器、厂房、设备、配套设施、通信网络等）的成本尚未完全收回的时候就已经贬值，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与此类似，对劳动者所须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不断变换，比如，突然要求工人具备某些新技能，如计算机技术，甚至超出了劳动力大军的能力范围，同样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社会和教育机构通常会发现它们的调整速度不够快，而工人在职业生涯期间可能需要几次再培训，这不仅给公共资源的供给带来挑战，也给劳动者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问题，是劳动者不断放弃原有技能学习新技能的原因，这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职业不安全感。美国近年来的失业人口中，60%可以归因于新技术的采用，而只有30%是由于工作岗位向海外，如墨西哥、中国等地，转移引起的。

各部门技术发展水平不一致也可能导致比例失调的螺旋式危机，进而引发工资商品（即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产出水平失衡。交通和通信手段的进步引起的时空关系的急剧转变则会引起生产和消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并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演化为“转移危机”（即投资活动从一个热门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突然大规模转移）。资本周转的突然加快或整体速度水平的提高（例如，因为最近的金融危机而饱受诟病的计算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的运用），对于那些建立了大量运转良好的理论模型的人来说，既可能意味着获得了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利润，也可能意味着一颗“定时炸弹”。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过程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但是显然，这种变迁是一把创造与毁灭并存的双刃剑。马克

思认为自己已经对利润率的下降做出了合理的解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也秉持同样的假设。在马克思看来，最好的解释就是劳动节约型创新对利润率产生了影响，将劳动力这种一切财富的缔造者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从长期来看势必对利润率产生反作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规律是李嘉图最先发现的）及其不可避免地将引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根本无法利用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来进行解释。但是，由于创新不仅带来了劳动力的节约，还带来了资本及生产资料的节约（例如，通过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所以很难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应用于实际经济运行当中。马克思罗列了一些可以阻止利润率进一步下降的途径，例如，提高劳动力的参与程度，通过资本节约型创新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通过对外贸易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大幅度提高作为产业后备军的劳动力的数量，从而弱化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的动力；除此之外，还包括令资本不断贬值、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收过剩资本，以及垄断经营、引入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等等。可供选择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关于利润率下降是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的自然反应这一铁的“定律”的系统论述，而不再仅仅停留在讨论的层面。

有必要对马克思列出的“清单”上的最后一项进一步做出说明，因为如果没有引入新的生产线的话，过剩资本的吸收问题早已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新生产线及新产品成为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与此同时，它们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影响面甚至包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回忆一下，晶体管收音机和手机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不过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欧洲和北美诸国外，现在还包括很多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高等收入阶层掌握的家用先进技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本身就成为一件重要事项，它不仅包括对现有产品的改进，



如汽车，还涉及一些全新的产业部门，如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及它们在政府、制药、医疗、企业管理、娱乐、日用品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毋庸置疑，这一切都依赖于消费者的偏好及他们的有效需求水平，稍后我们会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但是，人们对引入全新生产线的偏爱、自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以来新产品研发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已经以一种马克思等人都会认为难以察觉的方式，将消费和有效需求的扩大提升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地位。

此外，上述现象背后的潜在含义是，一旦强制竞争的法律出现弱化，如专利法、垄断手段等，那么资本的进一步集中，以及具有很强官僚色彩的政府干预，将会影响到技术革命的步调和形式。在美国，尽管科研院所逐渐开始产业化经营，并且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和企业提供的资助，但是仍然很难对它们进行统一管理，它们对保证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科研院所松散的组织形式有效避免了在政府和企业有交叉的领域出现僵化。有意思的是，虽然居于落后的位置，欧洲、日本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政府—大学形式的研发活动对其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性，并且试图通过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资助研发等途径，迎头赶上。

阶级斗争是另一个值得加以探讨的因素。广泛的抵抗运动，如马克思讨论的 19 世纪早期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包括车间工人故意破坏新机器和新组织形式的运动，具有一个相当悠久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在阶级斗争时期，资本家通常会将新技术作为武器，而工人们自然会奋起反抗。毕竟，工人们越是成为他们所操控的机器的附庸，他们的选择面就越窄，他们所拥有的技能的重要性就会越低，他们也就越容易成为技术进步引发的失业的牺牲品。因此，工人们通常会强烈反对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工会组织和资本家阶层达成协议，共同分享生产率提高所带来

的收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协定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常普遍，并且成为在生产率较高部门任职的工人阶层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以来，却越来越难以施行。自那时起，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好处为资本家阶层所获取，相对来说工人的收入水平则处于停滞状态。

除此之外，要想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的演进路径，技术和组织方式变迁的另外两层含义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它们都属于长期因素，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是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第一层含义是创新浪潮的周期性。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即“康狄夫长波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它以一系列技术创新为基础，在特定时间、地点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并向外围地区扩散，直到新一轮的创新替代上一轮创新，每一轮持续时间大约为50年。

回顾历史，不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时代”：和铁路、轮船、煤和钢铁产业、电报的出现相关的时代；和汽车、石油、橡胶和塑料产业及收音机相关的时代；以喷气式飞机、电冰箱、空调、轻金属（铝）产业及电视机为代表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芯片、新电子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划分没有考虑资本动态变化所引发的革命性，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社会后果，以及与资本的这种变化相关的组织形式的变迁，比如，从家庭工厂到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再到水平一体化的生产与分销网络。

在我看来，所谓技术和组织形式领域每隔一段时间定期地就会发生一次短暂的（当然，通常是在不同地域）创新浪潮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但



是，认为技术和组织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会逐渐范式化，就像事实上发生的那样，直到各种可能性都充分展现，并且被其他模式所取代，这样的观点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资本吸收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如果不是用于创新活动的话，数量越来越大的过剩资本又该去哪里寻找可以获利的投资机会呢？经济中的过剩资本数量越多，它们就越有可能在投机大潮中疯狂地涌进新技术领域。此时，国家-金融节就和“国家-企业”节交织在一起了，因为如果前期没有风险资本的巨大投入，很多创新很可能就逐渐消散了而不是迅速地凸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安排及政府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找到吸收过剩资本的新的途径，创新活动很可能会速度越来越快，环节越来越简化，投机性也会越来越强。那么，下一次创新活动引致的投机泡沫将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个人的观点是生物医学和基因工程领域，这也是像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富豪资助的慈善机构逐渐取代国家对研发活动进行支持的领域，还包括所谓的绿色科技，我认为这一领域比通常所想的要狭窄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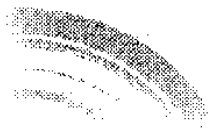
第二层含义是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对社会的整体意义。对通过新产品和新的组织形式来创造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渴求使得统治阶级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不是通过某一个人或他的后代，这一点长期以来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想一下，“美国内战”结束后涌现的包括安德鲁·卡内基、杰伊·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家族、安德鲁·梅隆在内的“强盗式资本家”，他们白手起家仅仅依靠铁路积累起巨额财富；还有像亨利·福特、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办人约翰·洛克菲勒这样凭借汽车而上位的人；后来则是比尔·盖茨、保罗·阿兰、杰克·韦尔奇、迈克尔·布鲁姆伯格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凭借新一代电子及通信技术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人物，以及乔治·索罗斯、森迪·威尔、罗伯特·鲁宾、布鲁斯·瓦

塞斯滕、查尔斯·森福德这样的华尔街金融大鳄们。

显然，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动”及“永无休止的不确定性和骚动”两点对资产阶级的构成来说同样适用。资产阶级经受着一轮又一轮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并不总是平和的。当无法挽救自己的颓势时，占据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总是试图利用排挤手段和固有文化来压制“后来者”和“新贵们”，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后来者”皮埃尔兄弟及其1868年在巴黎创办的新型信贷机构所做的那样。目前，通过金融化来实现阶级关系的彻底重构的进程仍在进行之中。

另外，因为技术和组织形式变迁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转变也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马克思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的本质，正是这些技术使得长期以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业化进程变得透明、容易理解。有关巴氏灭菌、钢铁冶炼、蒸汽动力、工业材料与研制的科学技术开始对每一个人开放，而不再是某些人才掌握和应用的东西。但是，看上去我们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循环。当代很多的技术（从核能到材料科学，再到电子学，等等）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遵循“专家法则”。

我们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拍摄X光片，等待着或好或坏的诊断结果；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自己对检查结果做出解释。与此类似，判断电脑系统出了什么故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黑客或病毒等交锋就更困难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通过一个用户友好型界面完成各种各样的操作，但是一旦这个界面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向专家求救，即便是和那些看起来有一定知识而称不上专家的人说话，这些人也会拿腔拿调的。于是我们对专家的水平信任就很重要了。那些掌握特定知识的人也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垄断权力，而且这一权力也很容易被滥用，我曾听过有人称这种状况为“技术主义”。



任何对专家丧失信心的行为都可能演化为一场灾难，金融领域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最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尔街对电脑的应用还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交易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透明，受到的监管也比较严格。交易员凭借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直觉做出决策。20年后，一个全新的场外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往往是不受管制的，通常也是不公开的），即期权和衍生品交易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2008年这一市场的总价值为600万亿美元，相比之下，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值大约只有55万亿美元）。这股创新浪潮的原动力之一是规避监管，为过剩资本不受限制地在“自由”市场上赚取利润开拓新的疆土。创新活动也大多比较私人化，更接近于杂活修理匠，而不是系统规划师的工作。这也是躲避监管者，“解放”市场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交易员通常接受过很多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教育，很多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们从对金融市场建模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他们往往是依据费雪·布莱克、梅隆·斯科尔斯、罗伯特·莫顿1972年提出的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期权定价公式的思路来进行建模的（不过，后来这3人因为所管理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而名声大损，并于1998年被保释），这些交易捕捉并利用市场的无效率之处，分散了风险，但是考虑到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易模式，它可能会导致很难监管甚至根本无法识别的市场操纵行为，它们大多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场外交易活动的数学“黑箱”之中。

遗憾的是，事态并没有朝着马克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即技术与组织方式的变迁使得事情更简单、透明。很多交易员所赚取的利润激增，他们获得的奖金也一路飙升。但是一旦遭受损失，也会相当惨重。到2002年的时候，这一切都显而易见。

新加坡一位名叫尼古拉斯·里森的年轻交易员搞垮了声誉卓著的巴林银行，安然、世界通信公司、环球电讯及阿德菲亚传播公司等公司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类似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政府机构，这无不是在新生的不受管制的市场，即期权和衍生品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活动，并通过各种隐蔽的会计手段和复杂的数学定价方程隐藏这些交易活动的后果。

前述种种技术和金融创新使得我们暴露于“专家法则”的风险之中，这一法则完全不考虑如何保证普通公众的利益，而是处心积虑地利用专家手中的垄断权力，为雄心勃勃的交易者赢得巨额红利——这些交易者梦想着在10年之内成为亿万富翁，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层中的一员。

对于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创新，更多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把双刃剑。在为过剩资本的吸收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它也毁掉了一些途径。因而，创新浪潮和“创造性毁灭”的危机必然交织在一起，当前占据主导的方式未来一定会被其他方式所取代。马克思关于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论断，看上去也许非常简单，但是他也提出这种变迁在摧毁既有的一切，进而引发这样那样的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真知灼见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 多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

劳动力对原材料（可能是纯天然的，也可能是已蕴涵着某些人类劳动的）进行加工以制成新的商品是劳动过程的核心，即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



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同时新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被创造出来。同时，这也是利润的生产过程。劳动对一切人类活动来说是最基础性的，毕竟自然中的一切元素都要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才有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形式，那就是劳动力、技术及组织形式等要素结合在一起，在资本家的监督之下，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内以赢利为目的进行产品的生产。

不管监管机制僵化与否，不管技术的自动化水平有多高，也不管劳动条件看起来有多么恶劣，劳动过程中涉及的人类关系一直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马克思最卓越的贡献之一就是认识到，劳动者（真正从事劳动的人）是劳动过程中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人，尽管看上去资产阶级拥有所有法定的权力，而且在政治和制度方面占据着优势，特别是他们是国家的管理者。然而，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却依附于劳动者。工人们以商品的形式创造资本，从而创造了资本家。如果工人们拒绝工作，扔下机器不管，为争取社会地位而斗争，或者破坏机器设备，资本家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资本家或许是劳动过程的组织者，但是工人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正如秉持“自治论”理念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奥·特隆蒂所强调的，拒绝合作是工人阶级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方式。

一提到阶级斗争，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劳方奋起反抗资方。但是在劳动过程中，斗争的方向其实和我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事实上，当工人占据上风的时候，资本家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工人服从自己的管治。他们或者直接通过在工厂、车间、办公室等实行特定的社会组织策略来做到这一点，或者是借助交通和通信网络来达到目的。要想让生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就必须建立一种协同合作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某些时候或许是通过暴力、高压统治、法律手段等建立起来的，但是更多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形式建立在信赖、忠诚和微妙的依赖关系之上，所谓的依赖

关系是指承认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但是按照资本家的意愿对其进行改造。正是因为资本家通常会向工人运动让渡一定的权力,更不要说物质利益了,才保证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持续性。

毫无疑问,关于工人在残暴的工头的监督之下工作,动不动就要被辱骂,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的报道可谓屡见不鲜。此外,技术创新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尽可能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让机器或者至少是端坐在监控室里的“上层”拥有更多的决策权。但是,劳动过程一直以来都类似一个永不会平息的战场,不仅对生产车间来说是这样,紧闭的大门背后的世界也是如此,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门上刻着资本家的信条:“除了商业,一切免谈。”在那扇门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尽管我们在“门”内辛苦劳作着,充分了解并且亲身参与到了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中,而且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允诺——这对集中各种力量保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事实上,是如果资本主义想存活下去并且继续创造利润)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资产阶级法制在市场事务中或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却一直苦于无法把触角伸向生产过程。庆幸的是,由于劳动者自身在近些年的积极努力,劳资双方在就业条件、工作环境、社会关系治理(反性骚扰、与争取平等待遇相关的立法)、技能认定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依法成立的劳工组织可以授权公司主管(在英国是工人代表),除了直接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事务进行干预,对各种人际关系进行调节和处理外,他们还要注意广义上的阶级运动的动向,如国内贸易联盟或左翼势力的活动。但是,企业内的组织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即便真的做到了,其对生产过程的制约给资本家带来的利益也和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相差无几。正如近年来美国不断爆出的未登记劳动力就业丑闻,讽刺的是,这些丑闻是在反移民浪潮的驱动下才被暴露出来的,这些丑闻表明,违反劳动法的现象有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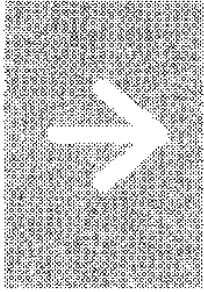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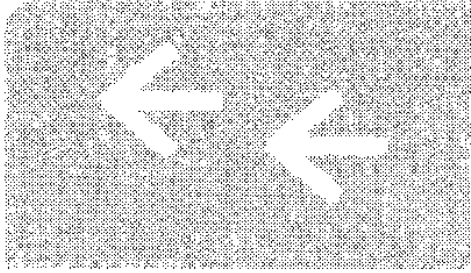
的趋势，而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利益在美国社会逐渐占据上风，政府的执法能力正在减弱。诚然，不同地区之间有关劳动立法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各地程度不一的工会运动及对生产过程中方方面面的监督，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普遍特征。

我们应正确看待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可以采取的策略。特别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充分利用了人与人在各方面的差异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性别歧视在企业通常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人们在种族、宗教、民族等方面的不同也同样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糖企业中，广大妇女承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在一种类似于家族管制的条件下，她们的天资和能力都被充分发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为了对劳动过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并维持这种控制，资本家要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关系的点点滴滴的区别、各个劳动群体之间的不同及人们在文化选择和习惯方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日益融入社会一体化运动的企业出现不可避免的趋同趋势，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所有劳动力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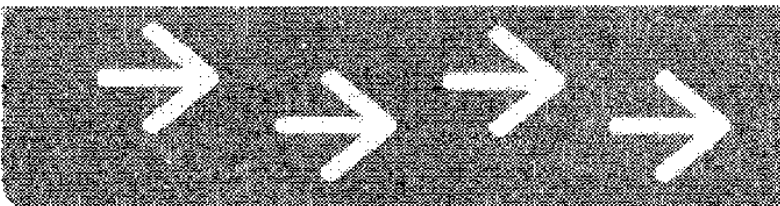
简言之，独特的文化开始成为企业的一个关键特征，同时，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如家长制、对权力的崇拜、人与人之间管制与服从的关系等，也逐渐被引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随便去一个企业转转，医院也好，餐馆也好，看看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在性别、种族、民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就不难发现集体劳动过程中的权力是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配的。这类社会关系一般很难做出调整，这既和资方采取的策略有关，也和社会关系先天具有保守的性质，且总是希望能够维护少部分人的特权有关。

感谢关注生产过程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努力，我们有大量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是在各不相同的条件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抛开研究人员在阐述企业文化的差别与特性时所秉持的立场不论，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虽然处在大致同一个约束框架之下，但是社会关系和文化等方面依然表现出无限的多样性。



第 4 章 资本进入市场

资本持续积累的最后一个潜在障碍出现在新生产出的产品以商品、服务之类的身份进入市场并出售，以收回原始成本并赚取一定利润之时。具有不同特性的商品要转化为具有共同特性的货币，这一过程远比从货币（即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转化为商品要复杂得多。要想顺利实现销售，一定要有人需要或者希望得到这一商品。如果没有人需要它，那么商品就是无用的，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不过，那些对商品有需要的人，必须要有钱才能购买商品，如果没有足够的钱，他们依然无法买到想要的商品。如果对某一商品，没有需求，或者没有人能够买得起，那么销售过程就无法完成，也就无法实现利润，前期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就损失殆尽了。



吃不下的大蛋糕：有效需求不足

商人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影响甚至引导人们的需求、欲望，以充分挖掘潜在的市场，形成了庞大的广告产业。不过，这一切远不是做广告这么简单。我们还要了解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信息，它们对保证一定数量商品的销售以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是极为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兴起的郊区化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需求的转变。人们不仅需要或渴望拥有汽车、汽油、高速公路、别墅与购物中心，而且需要包括锄草机、冰箱、空调、家具、室内娱乐设备（如电视）等在内的诸多支持设施，从而保证他们的生活可以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前述种种都是在郊区居住和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郊区的发展扩大把人们对这些商品从想要得到或渴望拥有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需求。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是永无休止的扩大的资本积累过程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与激发新需求有关的技术和理念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实现资本可持续积累的关键力量。如今，人们已经充分领悟到，在一个丰裕的社会，“消费者情绪”和“消费者信心”不仅对资本积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日渐成为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支点。具体来说，美国经济总量的70%是由消费创造的。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对产品的购买力源自何处呢？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在某个地方，一定有某个人手中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否则，就会出现有效需求，即有一定支付能力作为支撑的需要不

足的问题。当有效需求不足以吸收、消化生产出的产品时，就会引发所谓的“消费不足危机”。

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是有效需求的来源之一。但是工资总额通常总是少于处于周转过程中的资本总额（否则将无法带来利润），因此，只购买维持日常生活（即便是比较奢侈的郊区化的生活方式）的工资产品根本不足以支撑社会的总产出实现可获利销售。而工资抑制政策更是加剧了消费不足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很多经济学家都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划归为消费不足危机。因此，他们支持工人组建工会，以及其他可以提高工人阶级有效需求水平的政策，如社会保险等。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2008 年，美国联邦政府对低于某一收入水平的群体实施了每人 600 美元的减税计划。不过，如果转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实行的工资抑制政策，转而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效果或许要好得多，因为这一举措将永久性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增强他们的信心。但是，资产阶级及右翼力量通常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否决了针对底特律的汽车公司的原始救助计划，就是因为这些公司没有将无工会组织的工人工资及其他福利降低到位于美国南部的日本及德国汽车公司的无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水平。换句话说，他们将经济危机看做压低工人工资的一次良机，而事实上，正是这一错误决策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蔓延。

工人阶级的需求尽管很重要，但是仅凭这一点，显然永远无法解决利润实现难题。罗莎·卢森堡，著名左派活动家和理论家，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表示了极大关注。最初，她考虑了通过增加黄金的供给（如今则是简单地通过让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纸币），来提升额外需求的可能性。显然，在短期，这一举措是有效的，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增强流动性对维持资本周转与积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样做很可能会引发另外一种危机，即通货膨胀危机。后来，罗莎转而假设在资本

主义体系之外，存在某种潜在的、可流动的额外需求。这意味着通过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延续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被统治地的人口作为消费者而非求职者进行迁移。19世纪，英国曾利用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为本国产品开拓市场（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破坏了当地的生产方式）。中国这一市场在19世纪时也曾经被迫向资本主义国家敞开大门。

在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封建秩序下积累起了一定财富的工场主及利用商业资本从非资本主义世界抢掠的巨额财富的人们可以扮演罗莎所期望的角色。但是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黄金储备”（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描述）随时间推移会不断削减，相应地，由农民支撑的（收取货币地租的）地主阶级和（征收税赋的）政府机构的消费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殆尽。

随着欧洲和北美产业资本的联合，它们对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财富掠夺也变得越来越突出，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如此。这是财富从东亚、南亚，甚至某种程度上从南美和非洲向欧洲和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家手中转移的过程。但是最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及在地域上的扩张，通过这种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稳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

自1950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借助各种各样的殖民活动充当社会稳定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随着资本主义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以及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更不用说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长足发展，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也被构建在了一个全新的基础上。例如，支撑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有效需求目前主要来自美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弥补美国的赤字是一件很紧迫的任务，因为美国消费能力的降低将会给（并且正在给）中国企业的就业和失业率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对中国而言，应对之策显然应该是积极发展国内市场，但是这要求

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同时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将被削弱。此外，发展国内市场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将其剩余资本更多地用于国内发展，从而可以借给美国的资金势必会减少。显然，这将进一步降低美国人对中国产品的有效需求。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知道的，这预示着对持续了 150 年左右的财富从东亚、南亚向欧美转移这一进程的历史性逆转，也必定会使美国自 1945 年以来获得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严重动摇。

对有效需求谜题，解决之道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一点，罗莎没有注意到，但是由马克思的分析可自然而然得出。这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利润被消费掉了，例如，购买日常用品及奢侈品和服务；其余部分或者以更多即将进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的工资商品的形式，或者以新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用于再投资。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程度不一的工资抑制趋势，资本家整体来说拥有的利润流不断扩大，对奢侈品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随便去佛罗里达或地中海沿岸的海滩看看那里停靠着的豪华邮轮，将之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景观对照，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不过，由于消费习惯的问题，富有的人们能够购买的游艇、豪宅、名牌皮鞋的数量依然是有限的。因而，资本家的消费对提升有效需求来说，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通过资本集中过程，越是把财富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通过富人的消费来扩大需求的效果就越不明显。例如，1996 年联合国发展报告称，300 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世界财富总量的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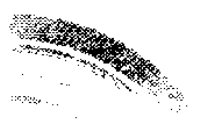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答案只能从资本家的再投资活动中去寻找。假设资本家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扩大再生产。今天生产扩张带来的额外需求吸收了昨天生产出来的过剩的生产资料和工资产品。也就是说，过剩生产将其自身不断增加的货币需求内部化了！用一种更正式的表述则是对昨天的过剩产品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工人的消费、资本家个人的消费，以及因明天的生产扩张而衍生出的新的需求。就这样，消费不足问题转化成了为昨天生产的

部分剩余寻找再投资机会的问题。

为了顺利开展再投资活动，必须具备3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必须马上将他们昨天赚取的金钱投入流通过程，用做新增资本。但是，并没有强制性规定要求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后会马上由货币转化为商品，资本家可能会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进行再投资，经济周期的存在使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这也是马克思、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危机的理论的共通之处。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持有一般形式的财富即货币要比购买商品合理得多，除非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那样的话，囤积一罐罐的金枪鱼、一桶桶的食用油要好于持有货币。另外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对经济失去信心导致人们把大量的货币储存起来，不敢花销。当投资活动的获利前景不明时，通常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这反过来引出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问题，即个人或机构（包括银行和企业）储藏的货币越多，有效需求就越可能下降，生产中可获利的再投资活动就越少，最终结果就是经济进入下滑通道，正如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及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样，并且很难再次恢复活力。凯恩斯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诉诸于国家主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赤字财政（例如，2008年秋季末美国、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所实行的政策）被视为一剂疗效显著的万能药。

第二个条件是昨天的过剩产出与今天的再投资之间存在的时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合。这要求我们将货币作为一种会计手段来使用，而这意味着在资本周转过程中存在一个信用体系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没有其他选择时，比如，继承先前社会的黄金储备，或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劫掠，信用成为了唯一能提升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因此，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解决方案在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中被内在化了。不过，此时价格体现为运营信用机构的银行家和金融界人士及将自己的钱存入信用机构的储户



们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从未来的剩余价值中应分得的部分。

第三个条件是吸收的信用货币必须用于购买已被生产出来的额外的工资产品及生产资料。那些支持财富向上层社会集中的政客们通常给出的理由就是，富人们可以而且他们确实将手中的资金用于了再投资活动，从而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制造出新的产品，以及最终可以通过向下传导效应惠及每一个人的新的财富，进而催生新的需求，但是这一观点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到的，资本家有权利选择再投资的领域：他们可以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进行其他的资产投资活动，如买入股票、股权、房地产、艺术品或一些投机公司（私募、对冲基金，或其他可以带来经济利润的金融工具）的股份等。在后一种情况下，富人们的再投资活动对促进有效需求提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是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对过去的过剩产品的需求，并且信用对弥合时滞的重要桥梁作用，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信用驱动的以复合增长率扩大的资本积累同样是资本主义得以存活下去的一个条件。只有这样，今天的扩张才可以消化、吸收昨天的过剩产品。从而为什么 3% 的经济增长要求再投资活动增加 3% 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在不存在外部需求的可能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并且内化自己的有效需求，其丧钟才不会敲响。如果没能做到这一点，就像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状况，生产的扩张就会遇到阻碍，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一个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如果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保持生产的永久性扩张，那么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保持资本主义处于竞争状态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而言也是很必要的。因为任何原因都很有可能使资本家的再生产遭遇危机，如过度垄断而引起的竞争程度的下降。毫无疑问，这也是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奇在写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中的主要观点。而且正如斯威奇和巴兰二人所

预言的，正式不断强化的垄断趋势及资本的集中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在 20 世纪 70 年代饱受滞涨危机（即高失业率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的困扰。随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不仅要瓦解各种工人运动，而且要采取各种手段执行强制竞争法则，以实现资本永无休止的持续积累。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一个前提条件是跨越了所有其他障碍，如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且存在生产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这意味着帝国主义的主要任务将不再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掠夺财富和资产，而是转变为将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生产新形式的资本家的场所。资本的输出而不是货物出口开始占据首要地位。在这方面，19 世纪的印度与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前者的殖民统治而大肆掠夺财富，后者则通过消化、吸收原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地区生产的过剩产品，比如，19 世纪英国曾向美国大量出口资本和机器设备，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创造新的财富。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并因此而催生了对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巨大有效需求。作为庞大的生产投资中心，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市场。

即便如此，通过再投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难题依然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源于资本积累是一项双重投机活动这个简单的事实：它依赖于明天的扩张不会碰到任何障碍，故而今天的剩余产品可以有效被吸收，这一信念。这意味着，正如凯恩斯深知的，人们的预期和期望是决定资本能否持续周转的基础。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技术处理和对预期和期望等心理因素的处理比起来，篇幅要小得多。对经济的信心和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反之，对经济失去信心，就像 2008 年那样，很可能是致命的。

第二个问题出现在货币和信用体系内部。小规模金融和货币危机随时随地都有爆发的可能，其根源就在于货币自身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矛盾，

这一点在金本位制度下非常容易理解。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代表了一切社会劳动的价值，即用一种特殊（具体而有形）的价值代表着一般（抽象）价值，而私人可以掌控无限的社会权力。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因为它是社会权力的象征。但是人们手中持有的金钱越多，给资本的持续周转造成的威胁也就越大。把钱重新投入周转过程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力，既要求人们对经济有充足的信心，又要求有安全可靠的机构可以用来暂时存放个人的资金，然后伺机寻找可以获利的机会。通常来说，银行扮演着这类机构的角色。所以，对货币体系充满信心是非常关键的。类似于庞氏骗局之类的事件则会严重摧毁人们的信心。

对货币的象征意义（即国家维持货币体系稳定的能力）或币值的稳定（即出现通货膨胀）失去信心，很可能会引发类似于 2008 年秋天出现的资金紧张、支付手段被冻结之类的危机。在信用体系中，除了主观预期和期望之外，还有很多技术和法律方面的因素。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不断开疆扩土，信用体系作为指挥和控制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这一动态过程的中枢神经系统，地位也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对信用工具的控制对资本主义的运转变得很关键，把信用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视为他们的一个核心诉求，当然了，前提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认了这一关系结构。这一点再加上国家在维持铸币价值稳定，以及更重要的，维持符号化的货币的价值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使得国家-金融节中国家权力和金融权力的融合看上去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资本可以同时控制劳动的需求和供给（通过技术引致的失业），那么它自然也就可以通过信贷体系同时影响生产和销售。不断增加对未来收入比较可观的家庭的贷款，再加上同样的对比较贫穷的家庭的贷款，将极大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及城市的发展。可以想象，这样一来，生产的持续性和剩余产品的消化吸收问题自然而然也

就解决了。毫无疑问，这也使得信用体系内汇集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权力，但是，为了这一状态，同样也需要信用体系以复合增长率扩张，正如过去20年间切实发生的那样。当信用泡沫破裂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整个经济将跌入类似于始自2007年的这场危机这样的下行通道，资本主义将不得不求助于外部力量，把自己从内部矛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为此，它必须重建一个类似于外部封建机制或拥有大量非资本主义黄金储备（历史上，资本主义借此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市场。通过将货币的发行权分配给类似于美联储这样的新封建机构，资本主义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人类从来不曾真正摆脱商品的销售问题，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的威胁。但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不断下降的利润水平，以及资产贬值却可以通过在信用体系中玩一些小把戏，而暂时得到解决。在短期，通过借贷活动可以消除很多小麻烦，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过使得各种矛盾和压力不断积累起来。信用体系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聚风险。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在于对于过去生产中积累下来的剩余资本，缺少可获利的再投资机会。从资本周转是事关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重要条件中能推断出的唯一结论是：每时每刻都必须保证资本周转的连续性。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随着世界经济的总产出达到了惊人的550万亿美元，并且人类希望在未来30年使这一数字翻一番，已经越来越难以做到。

2008年经济危机的多种成因

人们在构建理论解释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一直都试图找到一种主导性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容易爆发危机的原因。因此而形成三大思想阵营，

包括利润挤压理论（由于实际工资上升导致利润水平下降）、利润率下降理论（劳动节约型技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毁灭性竞争使得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以及传统上的消费不足理论（缺乏有效需求，因为过度垄断而导致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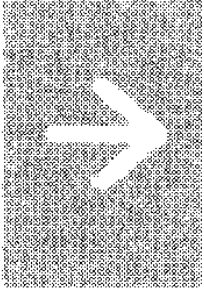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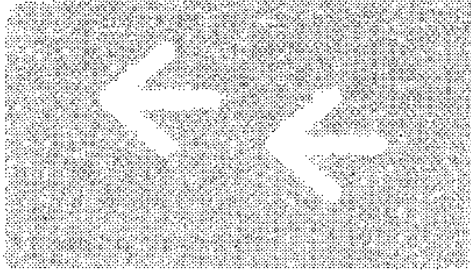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这些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论变得格外激烈。“消费不足主义者”这一术语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意味着秉持这一观点的人只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罗莎·卢森堡的追随者则因为那些将利润率下降视做其理论内核的经济学家卑劣地摒弃了罗莎的观点而强烈不满。直到最近几年，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配套环境和金融方面的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影响。

在我看来，有一种好得多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探究经济危机的成因。对资本周转过程的分析，给出了几个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潜在的限制性因素和障碍。其中，货币资本稀缺、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同部门之间比例失调、自然因素的制约、非均衡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包括竞争和垄断之间的较量）、劳动过程中无纪律及有效需求不足首当其冲。以上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减缓资本周转的速度，甚至使资本周转过程发生中断，进而引发可招致资产贬值或资本损失的经济危机。即便克服了其中的某一个障碍，资本积累过程中还可能会碰到其他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期间，人们采取了很多举措来消除劳动供给不足的负面影响，并想方设法削弱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权力，这些做法严重打击了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甚至给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剩余产品的吸收带来了困难。针对后一问题做出的在工人阶级中扩张信贷供应量的努力，则使得工人们负债累累，不堪重负，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对信贷工具可靠性的信任危机，就像2006年起

发生的那样。事实上，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并没有被切断，而只是转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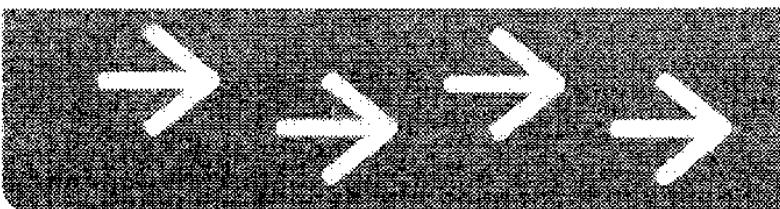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通常表现出的那种机动、灵活的特征，我认为，我们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思路来看待以创造新的障碍为代价超越现有障碍的做法，找出经济危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是如何发生的。还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危机作为一个内在矛盾体的“非理性的理性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布局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简言之，就像货币、劳动力、资本一样，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演化和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须要密切跟踪、仔细分析危机在何时何地发生。

对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场危机，一个粗略性的观点是：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出在信贷体系和国家-金融节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但实际根源却在于与劳方相比资方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并凭借这些权力压低工人工资，进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及另一地区新生产能力的扩张所掩盖了。但是要想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复杂的演化发展过程，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在探究危机的成因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管是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是不同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主题。



第 5 章 资本的演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遵循怎样的规律？通过对社会发展中七大活动领域及其相互影响进行深刻剖析，我们可以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中穿插的动荡，变革。



跌跌撞撞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自18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屡屡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如果在19世纪20年代乘飞机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上空飞行，你将看到零零星星的几个工业化城镇，小工厂的烟囱里喷发出有毒气体，它们被大片大片的农业区分隔开来，这些农业区的一些散落的村庄或农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尽管当时的一些大庄园主已经开始享受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升（进而更高的货币地租）的收益。像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工业中心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和主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如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以及资本充足的大都市（如伦敦）之间的距离也不远，一些尘土飞扬的收费公路及窄窄的运河在它们中间穿行而过。运河沿岸随处可见疲惫的马驹，或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饥饿的妇女们艰辛地拖着装满煤或其他原材料的驳船。速度极为缓慢。

20世纪80年代，如果从珠江三角洲上空飞过，你将看到很多像深圳、东莞这样的小乡镇，那里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依靠种植水稻、蔬菜，或者饲养牲畜、养殖水产等为生，接受当地政府铁拳政策的管制，这些政府官员手捧“铁饭碗”，永远不用担心自己会因为失业而忍饥挨饿。

2008年，如果重返英国中部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你将发现城市化已经使得它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和交通方式、社会关系、技术水平、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也同样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就像马克思曾断



言的，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认识并且改造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确实向我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在诸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剧变发生之前，很少有人愿意思考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事情的发展屡屡超出人们的预期，在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力和体力产业大军，尝试去解决那些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麻烦。

尽管人类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思考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确实充满各种矛盾。从消极的方面看，我们不仅面临周期性的，通常来说也是区域性的阻碍了资本主义前进步伐的经济危机，还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消失、不断增加的贫困人口、新殖民主义、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人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各种社会排斥、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等形形色色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中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交通和通信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物质障碍（但不是社会障碍）大大降低，医学以及生物学方面的进步使大多数人的寿命得以延长，大型繁华都市不断涌现，人类掌握的知识激增，希望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从克隆技术到在太空遨游）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矛盾的世界，并且它正在以不可预知的，似乎也是不可控的方式飞速发展，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对于支撑这个世界不断发展的原理，我们了解的还并不是非常透彻，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更多地把人类的发展和某些或者某个人的奇思妙想联系起来，而不是像达尔文研究大自然的演化那样，把人类的进步归于一些主导性的演化规律的作用。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把世界改造得更理性、更人性化，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更深刻地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都做了什么，又带来了怎样的结果。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的历史图景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资本积累问题。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资本积累及人口的增长，是18世纪中期以来，人类演化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它们的作用机理对于我们解开资本这一谜题，也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真的存在能带给我们启迪的演化规律呢？

影响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七大活动领域

撇开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变迁、地域上的扩张、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和环境对它的制约不谈，首先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假想一下资本在一系列千差万别但又互相关联的“活动领域”不断演变以追逐利润的情形。其中，至关重要的“活动领域”之一就是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发明。毫无疑问，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会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不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还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迁，都不完全是由技术和组织形式决定的。此外，劳动力供给不足或自然资源短缺同样也会催生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出现。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媒体就对借助新技术将美国人从对石油进口的高度依赖中解放出来、对抗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话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奥巴马政府也承诺将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举措，并且已经着手推动汽车制造商研制电动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

日常生活通过消费而不断继续，这一方式很可能对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不管是生产系统还是劳动过程的形成都离不开占主



导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适宜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作用。不过，虽然我们所说的“自然”显而易见会受到资本积累的影响，包括物种消失、气候变暖、新型化工产品带来的污染与破坏，复杂的管理技术带来的森林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资本积累却不是其唯一的决定要素。地球的演变过程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例如，新病原体（如艾滋病毒）的出现对资本主义来说意义深刻，要求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从技术到人文关怀等方面都对此做出反应。它们对日常生活的持续、人们之间的性关系及人口的繁衍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制度的调整、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对这种影响起到了缓和的作用。

所有“活动领域”都内嵌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私人财产权和市场合约）及治理结构（国家、地区和区域性安排）之中。这些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也会按照自己的步调不断演进，尽管当发生经济危机或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时，它们也不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此外，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预期、信条及对世界的理解各行其是。社会体系的存续却取决于人们对专家的信任，取决于决策层是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和信息，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合理的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体制安排，同时也取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建设，例如，我们如何对待动物，我们对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这个世界及不同于人类的其他物种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等。目前，文化准则和信仰体系（即宗教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它尚未摆脱社会关系、生产和消费活动及占主导的技术水平的制约，尚不能独立存在。对资本积累的不断演变的技术和社会方面的要求，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及文化准则和信仰体系，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争论在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便于论述，我把前述所有这些因素都化归到“对世界的精神感知”这个类别里。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不难得出与资本主义的演化息息相关的 7 种独特

的“活动领域”，即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生产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以及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这七大领域虽然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却也没有哪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同样，也没有哪一个领域是由其他6个领域独立决定的。每个领域都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演化，但同时又与其他领域保持着动态联系。引起技术和组织形式发生革新的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候革新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偶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而且这种关系的变化只有一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对世界的感知通常来说也是随着新的科学发现、人们一时的兴致、社会潮流及文化和宗教信仰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的，而且往往充满争论。而对世界的感知的变化有意无意地也会给可为人们所接受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制度安排带来冲击，使其相应发生转变。主要由日常生活和人口繁衍的特点决定的人口统计学动态特征同样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但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影响。

七大“活动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断对它们自身进行着重塑。此外，这些关系彼此之间不一定是和谐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领域之间的紧张甚至敌对关系来重新定义危机这一概念，比如，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与重建新的社会关系的愿望相背离，而且会打断劳动过程现有的组织流程。但是，与前面分析资本积累和周转过程时顺次探讨这些活动领域不同，在这里，我们假定它们在资本主义漫长的历史中是共生或者共同演化的。

给定处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个社会，比如，1850年的英国，或者说现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通过考察七大“活动领域”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社会的大致特征。甚至，如果知道这七大活动领域之间存在哪些矛盾和紧张关系，我们就可



以预言这一地区未来的社会秩序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尽管我们认为社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而不是某些条件可以决定的。

■ 七大活动领域相互作用、共同演化

资本只有进入这七大活动领域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才可能完成周转和积累过程。如果资本在某一领域内部或者在两个领域的流动中间遇到瓶颈或障碍，必须想方设法逾越它们。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了。因此，关于七大领域共同演化过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使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演变历史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危机做出思考。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这个抽象的分析框架用于研究现实问题呢？

我下面要讲的这段经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2005年秋天，我有幸担任一个评审团的主席，为韩国计划建造的一座新城选择设计方案。起初，这个城市被定位为“多功能行政中心”（即现在的世宗），按照计划它将成为韩国的新首都，但是宪法的限制使其最终只能定位为卫星城，从地理位置上说，它到首尔和釜山的距离差不多，但是更多地是扮演韩国行政首都的角色。评审团的任务是对所有的设计方案做出评判，但没有权利决定选择哪一个方案，那些专门负责这一项目的人员才是最后的决定者。评审团成员中大约一半是韩国人，另一半则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工程师、城市规划师，或者相当杰出的建筑师。很显然，韩国政府对在韩国和亚洲大部分国家占据主流的城市规划模式感到厌烦，他们渴望新意，

希望可以成为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中世界各国的一个新楷模。

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提交上来的方案这一问题。最初，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圆形设计和方形设计哪一个能更好地实现各种不同的发展战略，无论是从象征意义还是从实际应用角度。当设计图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差别。后来，我向各位评审人员提议，应该扩大讨论范围，考虑其他一些标准，比如，设计方案是否考虑了预计要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该城市将采用的各种技术，是否考虑了生产及其带来的就业形式问题，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城市将由科技、建筑领域的精英主导这一问题，是否考虑了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是否考虑了居住在这样一座新兴城市，人们的世界观会怎样变化这一问题（人们是会变得更加独立、自我，还是彼此之间联系更紧密），等等。我总结说，我知道如果认为仅仅依靠硬件设计就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综合各种标准来打造这座全新的城市。

评审人员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我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一番争论，直到一位建筑师明显厌倦了这种讨论，他站出来打断了我们，并认为在所有要实现的目标中，有一个格外突出，那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过是象征意义的问题。简言之，我们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城市设计从象征意义、理念和实际角度出发，应该采用圆形还是方形的问题！

也许听上去有一点乌托邦的味道，但是如果我有机会负责整个城市的建造规划工作，我一定会把它构想成开放性的、在未来可随意调整变化的，而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式的结构。另外，按照我的设想，不同活动领域



之间不仅会交互作用，而且人类会有意识地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力，充分挖掘各种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构想，城市建设从最开始就必须和主流的社会关系、就业结构及可供利用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相适应。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城市看做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的试验田，这些技术和组织形式应该与更平等的社会关系（比如，男女更加平等），以及和单纯追求资本以 3% 的复合增长率不断积累时相比更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相吻合。

不过，我不是这一构想的首倡者。事实上，它出自《资本论》第 1 卷第 15 章对一个脚注的详细说明，其中，马克思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简要进行了阐释之后，评论说：

技术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前面我所定义的七大领域中的 5 个，如果“直接的生活过程”既指代商品的生产又指代商品的消费的话，就是六大领域。马克思唯一一个没有提到的领域是制度安排。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时期主流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之前，首先提到了这个注释，显然有深刻含义。马克思不仅希望搞清楚工厂的起源，而且希望了解作为新技术的催化剂，机器大工业（即用机器生产机器）是如何实现的。《共产党宣言》中把“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看做资本主义一直以来而且必将继续保持下去的一个关键特征，而机器大工业无疑是支撑这一特征的核心产业。

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活动领域以一种和资本主义特有的变革精神相包容并使后者不断得到巩固强化的方式共同演化。在此之前，

人们认为生产是一种艺术，但是现在，生产是科学和新技术的有意识的应用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阶级、性别及家庭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因为工人们逐渐退居为机器的附庸，而不再作为独立的、掌握了特殊技能的手工艺者而存在。与此同时，资本家则开始把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当做在阶级斗争中对付工人的一种武器，直至最终发展为人受制于机器。而大量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中，就像我们现在通常会看到的那样，更是派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随着要求劳动者可以承担各种不同的工作、可以在不同职业和岗位之间转换逐渐成为常态，公共教育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这一切都必然催生出其他的制度性变革，最显著的就是1848年在资本家和农场主的主导下通过的“工厂法”中的教育条款的变化。按照当时的规定被任命的工厂管理者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支持他的论点。新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企业）则倡导在新的制度框架下采用新的技术，而这必将对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看上去都没有哪一个领域凌驾于其他几个领域之上。

不过，七大活动领域之间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因而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张力。在一些关键转折点，正是这种张力使得演化朝着某个而不是其他的方向前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发展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活动领域的组合呢？培养出有文化、头脑灵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的公共教育会不会带来大众的觉醒从而使得工人阶级掌握主动权呢？技术的突飞猛进会不会把劳动者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将他们钉死在追求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这个十字架上呢？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尽管最后的结果通常是资本主义朝着更加残酷的一面发展。19世纪时英国人并不是一定要追求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但是一旦他们这样做，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就不可避免的随之发生了转变。

到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做个小结吧。



七大活动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以独特的方式共同演化。没有哪一个领域可以绝对占优于其他领域，尽管每一个领域都有自主发展的可能（大自然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演化的，人对世界的感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制度安排、技术等同样如此）。通过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自身内在的动态系统，每一个领域都永远处在更新与转变之中。而这七大活动领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资本的积累和周转，辩证地、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来，整个结构就类似于一个社会生态结构。我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结构，其中局部严格服从整体。它更像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同物种和不同类型的活动组成的生态系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亨利·勒斐福尔称之为“系综”，而他的同胞、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则称其为诸多动态联系在一起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组合装置”。在这样一个生态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开放式的，尽管它们永远也无法摆脱对彼此的影响。

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均衡不仅会带来一些偶然状况，而且会使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出现矛盾，这有点类似于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到的，毫无征兆的突变会带来偶然状况。此外，某一个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因为其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扮演先驱者的角色是完全有可能的。突然出现的新病毒，如艾滋病、禽流感或 SARS，针对劳动者权利、民权或妇女地位而展开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突然涌现出来的技术创新，正如最近几年电子技术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发展，都曾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七大活动领域共同演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从而给其他领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后者要么迎头赶上，要么奋起反击。随着技术凭借自身的实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这一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趋势，为了

充分利用某项新技术，我们不得不创造出一些新的社会需要，例如，为了和新研制出来的药品相匹配，我们不难看到医学工作者发明了很多关于人们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新名词，“百忧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个问题都应该通过技术性方案来解决，每一种痛苦都应该有相应的药物来缓解，这是资本家及社会大众普遍持有的一个信条，殊不知这个信条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后果。毋庸置疑，“拜技术教”对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既有令人咋舌的光辉业绩，也不乏招致灾难的例子。比如，正是在这样的信条的指引下，人们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要想实现和谐共处，只能依靠新的技术，而不能靠社会再生产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矛盾看上去相当严重。以美国为例，那里的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推崇备至，但是看起来颇为奇怪的是，美国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相信进化论。虽然科学家针对气候变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很多美国人却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玩笑。当占据主流的宗教和政治信条不相信科学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很好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呢？类似的情况通常来说要么导致发展的停滞，要么会导致激烈的观念重构。而经济危机往往就在这些时刻爆发。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彻底消除，只不过是不断向后推延。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底线的。不管有什么创新或转变，资本主义长期来说要想生存下去，其唯一条件就是资本按照3%的复合增长率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历史上不乏技术失败的例子，也有很多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构想最后被证明不过是南柯一梦，如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色列集体庄园、现在的“绿色公社”，在资本主义主流信条下，它们只能是要么被收编，要么被抛弃。但不管发生什么状况，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资本必须把这七大活动领域组织起来，贯彻“3%法则”。



II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穿插的运动和变革

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的演化方式有点类似于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在间断平衡理论中提出的大自然的演化方式：各个领域相对缓慢但比较和谐的共同演化阶段往往穿插着一些激烈的变革和扰动。或许，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扰动阶段。不过，也有清晰的证据表明，整个系统会竭力恢复原有的秩序，继续演化过程，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1973—1982年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最近的一次重要重建阶段，当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时，就不难理解间断平衡理论的含义了。2005年我曾出版了一本名为《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对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那次危机期间的重构做一个阐述。当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当时当之无愧的强者），资本家的力量相对于工人阶级或其他社会力量来说正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迟缓。于是，大公司的老板们、媒体巨头及大富豪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资本家的后代，如洛克菲勒兄弟，决定发起反击。他们对国家-金融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对金融业务放松监管、实行债务融资自由化、鼓励国际竞争、由社会提供原本由国家承担的一些职责和服务。通过创造失业、去工业化、吸引更多外来移民、将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的革新，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势力确实得到了强化。至于后来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期间对工人组织的政治攻击，也不过是希望通过工资抑制政策及减少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来解决利润率下降、财富萎缩这一危机。通过宣扬新自由主义原则是内生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一个必然要素，达

到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的目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逐渐从公共服务领域撤出，逐步放松，直至瓦解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形成的管制氛围，如减少环境保护要求。新的消费观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似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后现代风格的城市化成为一种趋势（市中心迪士尼化，把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成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另外，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性取向等主题，也爆发了很多社会运动。

资本本身并不会催生这些运动，但是它确实找到了利用和操纵这些运动的方法，那就是或者通过打破阶级团结，或者对和这些运动相关的切实有效需求进行修正调整，然后引入市场。新兴电子技术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广泛应用不仅影响了劳动过程，而且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笔记本电脑、手机、iPod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认为新兴电子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问题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流行起来。这一切无不预示着人类对世界的感知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变得更加强调个人主义，同时赚钱、负债、投机、国有资产私有化、对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的普遍认可也开始成为各个阶层共同的一种文化准则。例如，针对这次次贷危机中不幸惨遭损失的人们的一项初步研究显示，他们并没有怪罪于整个体系存在的问题，反而是为自己没有能力承担起为家人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这一个人职责而感到羞愧。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大肆蔓延期间，关于国家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家权力究竟体现在哪里的看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只是到了最近，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国家被迫向濒临倒塌的银行系统提供了巨额金融救助之后，才有人开始质疑这种转变是否正确。

当然了，实际情况肯定比我这里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发展是不争的事



实，区别只是这股思潮所遭遇的抵制程度。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唯一观点就是，1980—2010年，在所有七大活动领域方面，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每一个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来说，各个活动领域之间的这场共同演化运动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理论界和普通大众来说，很危险的一种看法是这七大活动领域中的某一个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在前面提到的韩国新城打造计划案例中，曾有一个评审员认为，人对世界的感知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无疑这是在将问题简单化这一思维的驱动下得出的结论。这种思维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这种简化既没有任何根据，又很容易造成可怕的误导。事实上，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危险的、对问题过于简化的解释。在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他就表达了对技术决定论的支持和拥护，他错误地认为这一观点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贾尔德·戴蒙得在出版于1997年的《枪支、微生物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则提出，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他也因此把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变成了一个和环境决定论有关的故事。戴蒙得认为，南非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种族歧视或自奴隶贸易以来的殖民侵略，尽管他在书中没有直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阶级斗争决定论的支持者。一些人把男女平等、种族主义等视为社会演化的动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个人主义和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贪婪造成的。唯心主义，即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社会变迁的根源的观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黑格尔的理论中体现最为明显）。除此之外，也有人把一些强势的创新者或企业家、宗教领导人、空想政治思想家等的思想和洞见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当然，认为信念和价值观的变化是最重要的，认为只要改变了描述方式世界就会改变的也大有人在。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工人阶级往往认为劳动过程才是革命性

巨变的根源，因为劳动者改变世界的真正力量无疑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得出2002年约翰·哈勒维提出的“无须掌权即可改变世界”的结论（这也是哈勒维著作的名字）。在另一本出版于2007年的相当流行的著作《被祝福的动荡》（*Blessed Unrest*）中，保罗·霍肯似乎想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变迁只能是起源于并且正起源于普通大众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抛弃那些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政治观点或对世界乌托邦式的看法（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目前，另外一些秉持类似观点的人则认为，在某个特定地区的日常政治既是政治运动，也是社会急剧变化最基本的温床，在他们看来，组建区域性的“联合经济体”是最佳的选择。不过，自称为“制度学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则认为，对于社会变迁来说，制度和行政安排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掌握并粉碎国家政权是秉持这一观点的富有革命精神的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另一个比较激进的观点源于迈克尔·佛科特对“治理”这一问题的关注，很有意思的是，他分析了两大活动领域——制度和行政系统、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上提到的所有观点虽然体现的都是线性思维方式，但是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勃勃生机，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它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如果把其中的某一个观点视为绝对正确，把某一种力量视为社会变迁的唯一动力从而是主要的政治受力点，就有问题了。历史上不乏某种社会理论因为偏爱某一个活动领域而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例子。有些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某个领域，如阶级斗争或技术革新，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突出，成为了领头羊，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个特定的时点，不承认在社会生态学变迁中充当先锋队角色的力量的作用就显得太固执了。因此，我的观点是，并不是总要赋予这七大活动



领域同样的权重，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它们的不均衡发展会造成错综复杂的张力。

在某个时代或地区微不足道的因素可能在其他时间、地点变得至关重要。目前，工人运动的作用就不像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早期那么重要。现在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人们对日常生活越来越关心仅仅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它关注得不够。至于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我们无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把它放在优先考量的位置上。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如何战胜封建主义的整个论述可以重新组织编排，将其描述为我所定义的七大领域共同演化的过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并不是依靠哪一种单一的力量、通过迅速的革命性转折就实现的。它从旧的社会秩序当中萌芽，并一点一点吞噬对方，有时候是通过武装力量、暴力运动、掠夺和占有对方的资产，但也有些情况下凭借的是小计谋和诡计。另外，虽然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过程却很曲折、反复，常常也会输给对手。当它终于积聚起一定的力量，新兴资产阶级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尝试新的社会秩序时，他们面临的却是在旧的封建秩序上建立起来的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和行政框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生产与劳动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打下自己特有的技术基础，树立起自己的信念和认知体系，建立虽不稳定但是明显呈现出阶级分化特征的社会关系，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生产过程、制度和行政框架之前，在可以称其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之前，七大活动领域之间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同演化和不均衡的发展过程。

即便如此，资本主义还是会因为在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而被刻上不同的烙印。关于新教、天主教等不同传统塑造了资本主义在世

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转方式的差异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认为这些差异带来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显然是很愚蠢的。此外，一旦资本主义站稳了脚跟，它就被卷入到七大活动领域永无止境的演化过程中了，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承担资本以3%的复合增长率不断积累这一重任。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对世界的认知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先辈们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演化过程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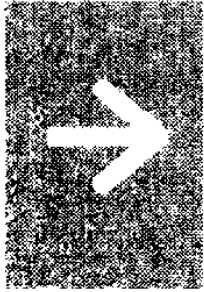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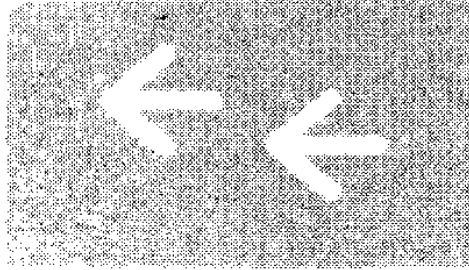
那么，社会变迁的共同演化理论又是如何解释革命性战略的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对思考从宏伟的革命战略到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重新设计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与此同时，它也释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永远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矛盾、不可控因素，以及很多我们不一定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拿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来说，有很多机会发起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但是，那些用意良好的社会运动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剑走偏锋。与此相反，一些看起来比较负面的事件最后却很可能带给人们惊喜。我们能因此而踌躇不前吗？既然整个大自然特别是人类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化过程永远不可能停止，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而只能是在这出大戏中继续扮演我们应承担的角色。我们唯一能选择的的就是弄清楚我们的介入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当条件都具备时或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越来越明了时，我们是否准备好了做出改变。在这方面，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很值得学习。

既然如此，哪里才是我们发起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突破口呢？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日常生活及人口的繁衍？是社会关系？是技术和组织形式？还是劳动过程？或者制度的建立及其革命性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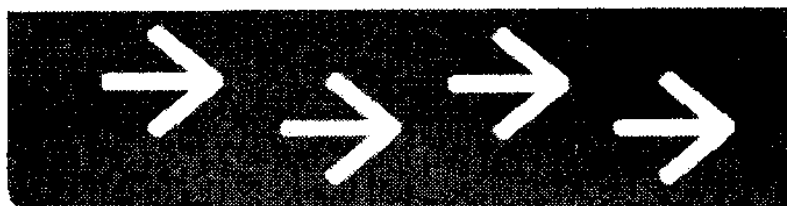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上面提出的共同演化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着手，只要不是在原地停留不动。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量，革命都必须是一场“运动”。如果不能在各个领域内部、各个领域之间自由活动，革命最后将一事无成。认识到这一点，将不同领域的推崇者、信奉者联结在一起就是势在必行的了。深知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重要性的人、了解制度和行政框架的作用的人、知道如何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的人、清楚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对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重组、知道如何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的人、懂得应该如何配置生产和劳动过程的人，应该把这些社会力量团结起来！

但是，革命运动究竟会出现在哪里？它又是怎样不断为自己拓展生存空间的呢？这个地理学问题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将要讨论的。



第 6 章 资本演化的地域分布

源自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因此，了解资本主义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分析经济发展的地理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

2007年，发源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通过各国之间密切相关的金融和贸易体系迅速传播开，而该体系原本是用来分散风险的，没想到现在却助长了混乱的蔓延。虽然次贷危机波及面越来越广，但是它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别。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当地银行及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其他金融机构从美国购买了多少不良资产；取决于其他国家的银行效仿美国同行的做法，进行了多少高风险投资；取决于当地企业和政府机构有多少无担保债务；取决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消费需求的急剧减少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取决于对原材料（特别是石油）忽高忽低的需求及相应的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取决于某一地区占据主导的就业结构。那么，危机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因什么原因袭击某个国家或地区呢？为什么整个欧盟的失业率会在荷兰的2%到西班牙的17.5%之间波动呢（2009年4月的平均水平是8.9%）？为什么说美国人近年来的储蓄率接近于零，英国人大约为两个百分点，而德国人则把他们收入的11%存储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呢？为什么黎巴嫩近年来虽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是截止到2009年夏天，它却免于危机的影响呢？这部分是因为自2006年以色列对其进行狂轰滥炸之后，为了完成重建，该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经济刺激政策。

在中国及大部分亚洲国家，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出口市场的近乎崩溃。而在冰岛，危机的爆发则几乎完全是因为银行持有大量的劣质资产。加拿大对银行业的监管比较严格，所以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那些和美国存在大量贸易往来的行业却遭受了巨大的冲击。英国惨遭

重挫，因为它长期以来在各个方面都唯“美”是瞻；德国人则主要应对其大幅萎缩的出口，尽管市场上充斥着关于德国银行系统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谣言。中国因为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因而有能力应付任何困难，冰岛则不然。

因为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所面临的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问题成因的判断、制度安排（例如，与福利制度吝啬到家的美国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更安定）、居民生活习惯（如个人储蓄习惯）、可用来消除本地区所遭受的影响的本土资源（特别是预算盈余的多少）等方面存在差异，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面对危机的态度都存在很大差别。关于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上台的惨痛记忆，使得德国人担忧过度发行债务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因而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美国人则对“财政赤字不足为虑”这种里根式信条推崇备至（这令回归财政紧缩主张的共和党相当尴尬）。如果危机的影响和人们的反应千差万别，那么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复苏或朝着新政体的创造性转变什么时候才会到来？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结果我们都已经了解：在负债的驱动下繁荣起来的美国消费市场帮助东南亚经济体通过出口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上。那么，这一次谁才是我们的救世主呢？会是经济仍在保持增长的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和中国吗？现在我们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东亚是复苏的中心。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是所谓经济复苏的“萌芽”将沿着哪些区域扩散，几乎都不可能预测出来。

为了说明金融风险是如何蔓延的，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一样，20世纪90年代柏林的公共交通系统也面临资金紧张的难题。越来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中央政府不愿意为公共交通提供资金，一些金融专家想出了一个相当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



将交通设备长期租借给美国的投资者，然后再转租回来。美国投资者会因为做出的境外投资贬值而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他们和柏林的交通运输部门共同分享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收益，20世纪90年代晚期，柏林政府大约得到了9000万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不过是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补贴德国地方政府，他们和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达成了类似于交通部门的协议，从水资源供给、污水处理系统到会议中心，不一而足。自2004年起，美国的税务部门揭发了这种欺诈行为，并决定努力消除法律上的漏洞。但是，此前签订的合约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它们依然是有效力的。合约规定，用于租赁的资产必须由评级比较高的机构承保。最后，柏林选择了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银行作为承保人，后者以包括雷曼兄弟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冰岛银行等在内的诸多评级很高的金融机构支持的债权抵押证券（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 CDO）来为柏林承保。2008年9月，当雷曼兄弟公司等纷纷破产之后，这些债权抵押证券成为了不良资产，柏林只能要么找到其他评级较高的承保人（这在当时基本是不可能的），要么用自有资金作为抵押。这笔抵押金至少需要2亿美元。除了柏林之外，德国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发现自己也面临类似的处境。莱比锡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因为它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租借出去了。但是，正如德国一个地方官员所指出的，在20世纪90年代，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为自己幸运地找到了一条“捷径”而沾沾自喜，其他地方政府很难抵御这种诱惑。

德国跨境租赁尝试的失败为德国和法国政府首脑秉持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是典型的英美模式的产物，并不能代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败。因此，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涌现出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一些国家，则表现为相当危险的右翼势力的崛起。在2009年6月的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赢得了相当多的选票。不过，那种认为德国的外贸产业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实现繁荣，与大西洋彼岸负债

累累的消费者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歪曲了日渐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一个例子。

一个地区差异极大的世界

那么，是什么决定危机将向哪些地区蔓延呢？区域性影响、区域性反应和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简言之，有没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积累过程错综复杂的地理布局，从而清楚地表述出危机是如何发展的？

很显然，资本积累过程离不开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而这些环境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过，资本家也在改造环境方面扮演着积极、突出的角色。

人们不断发现新的空间，形成新的空间关系；打造全新的交通运输系统；城市也在不断扩张；农业用地的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不停地向地球索取资源，生存环境和空气状况不管是个别地区还是从全球范围看都在不断恶化。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永不满足地一次次在大海中撒网；各种各样的废弃物随着海水的流动而扩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有些甚至会危及一些物种的生存。

回顾历史，人类的所作所为给大自然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影响更是难以估量。人类主动创造的东西早已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切。资本主义的布局正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它自己。

然而，资本家并不是唯一参与到自身发展中的要素。

很有意思的是，大约自 1700 年前后以来，世界人口总数以和资本积累的复合增长率相差无几的速度增长。1810 年前后，世界人口总规模达到了 10 亿人。到 1900 年世界总人口增长到了 16 亿人，到 1950 年则达到了 20 亿人，到 2000 年已经超过 60 亿人。据估计，目前世界人口总数大约为 68 亿人。预计到 2050 年将会增长到 90 亿人左右。

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人口的持续扩张所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资本主义很可能无法生存下来，并实现繁荣。当人们没有按照资本家之间的社会关系、技术、生产方式、制度框架组织联系在一起时，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奴隶、黄金、从土著居民那里掠夺而来的原材料、非资本主义市场对剩余资本的生产和吸收，这一切对几个世纪以来维持资本家的增长来说都是非常基本的要素。1860 年曼彻斯特棉纺织工业的繁荣是建立在美国大平原的农场主利用非洲农奴生产了大量棉花的基础上的，而产成品则被销往英国的殖民地、非资本主义国家印度，那里有庞大的并且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诚然，世界范围内人口的增长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反过来依然成立：如果没有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发展，人们很可能就要忍饥挨饿，除非找到其他可以提供食物的方法。

到了更近一些的时候，中国农村地区新兴的很多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们为资本家的迅速成长打下了基础，这帮助日渐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尽管那些无法和中国的低工资产业相竞争的地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又比如，人口向郊区的大规模迁移给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然也带来了土地价值的飙升及地租的上涨，而这些地租由拥有土地的资本家和房地产开发商获得。

地球上的人口日益膨胀也导致了地理方面的变化。移民浪潮及探

险活动发掘了那些人口稀少的大陆（如18世纪的北美），并把它们转化成人口中心，继而是资本积聚的中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殖民者和探险家的活动为资本家的发展壮大开拓了新的疆土。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小农场主、手工业者、车间工人、修理匠、渴望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者，他们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很松散，甚至是毫无关系。他们或者通过和市场发生联系，或者通过为数不多的商品交换活动，参与到资本积累活动中。不过，税收制度提供了一种长期的方式，将这些人卷入了资本积累的常规轨道中来，因为他们只有进行必要的售卖活动才能有钱交税。

庞大的人口既充当着劳动力大军的角色，又是潜在的消费者。例如，最近几年，在国际机构的官方用语中一度出现的“非正规部门”（因此不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现在已经被“小企业”这个词语所代替，这就意味着这些小企业通过提供给它们的小额贷款、小额融资的扩张而和资本的命运联系起来。一些组织以极高的利率向小团体提供小额贷款，有些甚至只有寥寥几个妇女组成，她们是20亿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的群体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帮助她们摆脱贫困，参与到资本积累活动中来。有些人确实借此机会走向了成功，其余的则沦落为偿债机器。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打造自己所在的地域，但是他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人口总数一直在飙升，尽管自17世纪以来通过殖民活动和帝国主义行为，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那里掠夺了巨额的财富。而那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西欧大部分国家和日本，则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局面，故而导致了对老龄人口的照顾问题，这同样会给资本的持续积累造成麻烦。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及非洲国家的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希望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来控制其已

经超过 12 亿人的规模，美国则通过一种更开放但现在逐渐受到挑战的移民政策来维持人口的增长。作为补充，非法移民满足了美国农业、建筑业、特别是国内业务部门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人们都须要在某个地方有一个落脚之处。尽管在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繁衍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人们创建了自己的容身之所，从茅草屋、乡村小屋、贫民窟、市区公寓、郊区小院到长岛价值数百万的豪宅，从中国的四合院到圣保罗或墨西哥市高高突起的阁楼。开拓空间，建造一个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住所——家，给土地带来的影响不亚于资本积累，房地产开发也已经成为过剩资本生产和吸收的一个重要渠道。目前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城市”里，而打造“城市”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和资本积累过程密切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离开来。即便是自己建造的简陋棚屋，其所用的钢材、水泥、油毡最初也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

过剩人口也不再固定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到处流动，寻找开拓机会或者仅仅是找一份工作，虽然很多国家都有针对移民的壁垒。由服务业的合同工、主要是移民的建筑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组成的劳动力大军和寻找合适机会的当地人形成了竞争。

伦敦西斯罗机场附近的酒店基本上是波兰妇女在打扫，拉脱维亚人在爱尔兰酒吧打工，来自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工人或者在纽约从事建筑工作，或者在加利福尼亚农场采摘草莓，巴勒斯坦人、印度人和苏丹人则在海湾国家找一份工作，如此等等。从海湾国家流向印度、东南亚甚至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汇款和从美国寄往墨西哥、海地、菲律宾、厄瓜多尔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款并行不悖。

散居的人们组建了各种形式的网络，这些网络和资本积累过程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是通过这些网络，金融危机被散播到了包括偏远的非洲和农业大国印度在内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丧失了从美国人那里赚钱的机会之后，海地人就开始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威胁。

因此，人们为自己选择了不同的地理位置，在那里，七大活动共同作用，创造了质量显著不同的空间。这些空间反过来又要受到各自的政治哲学、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建议你不妨思考一下，在你所生活的地区，所有这些要素是以怎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

要素的联结方式不同导致各个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极为不均衡的态势，地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去工业化；逐渐走向衰败的东德城市；蓬勃发展的珠江三角洲工业中心；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IT产业聚集区；在亚马孙流域和新几内亚民族运动的激励下，印度特别经济区被剥夺了所有财产的农民奋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地区随处可见的豪宅（至少直到最近一段时间，那里都是对冲基金的大本营）；尼日利亚因为油田而斗争不断；巴西、巴拉圭、阿根廷因为大面积的大豆产区而闻名；通过类似于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运动的方式争取而来的自治区；达尔富尔和刚果地区战争频繁；伦敦、洛杉矶、慕尼黑郊区典型的中产社会；南非贫瘠的城镇；海湾国家新近涌现的巨型城市，那里的建筑全部由世界知名设计师打造。当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集中考虑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个因为人类行为而导致地区差异极大的世界。

乍看上去，世界各地的差异是如此巨大，甚至不能用常规思维来理解，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妥善管理了。它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交织，这是显而易见的。

非洲大陆的民主战争对欧洲各国的殖民统治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战争反映了长期以来由其他国家的企业或国家主导，试图控制非洲宝贵资源的意图。中国东北或美国俄亥俄州企业的关停并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举起。巴黎人穿的衬衫和裙子贴有斯里兰卡或班加罗尔的商标，正如一度在意大利生产的皮鞋现在转到了越南一样。海湾国家之所以有足够的实力建造豪宅，得益于石油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巨额财富，而石油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比较铺张浪费的郊区生活方式。

不过，地区差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些看上去巨大且超出人们控制力的多样性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呢？

资本运动的卫星云图

我们前面提到的七大活动领域的共同演化过程是在哪里进行的呢？考虑美国一个主要大都市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在 2005 年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情况，当地居民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生活在那里的主要是白人，但也零星居住着一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国人，或者同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近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人们也比较富裕。那里的房子整齐有序，只需要短短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学校、超市、购物中心（里面包括了各种娱乐设施）、医院、银行、加油站、洗车厂、体育馆等。当地居民主要从事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房地产、软件开发与医疗护理等行业，并且他们所在的行业生产的产品或

提供的服务，要么是为了满足中产阶层郊区生活方式的需要（汽车修理、园艺、陶器制作、木匠、医疗等），要么是为了改造或进一步完善居住环境（和建筑业相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包括管道、楼板在内的辅料供应和修路等服务）。当地的税收来源稳定且充足，当地政府除了会偏袒建筑商和开发商之外，这在美国是很常见的现象，还算比较有效率。人们往返于家和办公室之间的通勤时间有点长但还算可以忍受，特别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汽车上有了各种娱乐设备，使得人们乘车时不至于太无聊、难熬。日常生活有条不紊，当然偶尔也会有离婚或其他犯罪事件发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又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如教会、学校及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等，形成了松散的联系。每个家庭都购置了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当然了，手机和 iPod 几乎是人手一个，这是生活中很常用的东西。

在这里，分属七大领域的活动以一种能带给人们安全感的方式，和谐地发展着。矛盾和冲突不足为虑（很多时候是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准则），甚至民主党、共和党这两大竞争对手也只能是走中间路线。流入、流出这里的资金很稳定，而七大领域之间的和谐关系则成功地为这些资金的持续赢利提供了便利。

把这个城市和相距不太远的另外一个城市宾夕法尼亚相比较，后者此前曾经是一个钢铁工业重镇，但是最近却经历了去工业化和企业倒闭浪潮。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关系也很融洽，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加入工会组织的从事蓝领工作的男人，偶尔女人也会做一些兼职工作来养家，但是这样的工作往往报酬很低。遗憾的是，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很多男人都失业在家或依靠领取救济金生活，工人阶层的住房条件不断恶化，一些房子被闲置或年久失修，当地商店纷纷关门停业，税收来源不够稳定，学校和其他服务部门的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人们享受的福利、救济金、医疗保险服务等也不够完善。曾经是社交活动中心的工会大楼现在或者被



废弃不用，或者基本上空无一人，教堂成为人们唯一的社交场所，在那里人们互相慰藉。犯罪活动极为猖獗，酗酒和吸毒的人越来越多。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女人逐渐成为养家糊口的主力，离婚率激增，原本是家庭支柱的男人们则发现他们自己沦落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举措试图复苏当地的经济，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效果。一些掌握了基本的电脑技能的女性建立了一个互助组织（现在人们所说的“合作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的一个企业家试图说服当地企业举办一场艺术活动，这有可能会吸引一些参观者；当地较低的房屋价格则对生活成本过高的邻近大都市如纽约的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这些人大多是移民、同性恋者和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他们的价值观和先前生活在这里的白种工人有着天壤之别。种族矛盾及性取向问题日渐突出。一些流动人口住进了闲置的房子中，却发现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反移民运动此起彼伏。简言之，生产活动的崩溃在其他领域引发了连锁反应，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人口繁衍、技术水平，甚至社会治理体系都必须相应发生转变，做出适应性调整。七大活动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而易见，而怎样才能使它们重新回到平衡的轨道上则是尚不可知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印度“贫民窟”的情况。数千人挤在某个地方，那里没有正式的街道名和门牌号。对当地的治理则主要通过非正式的权力机构，它们或者依靠通过合法或非合法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者依靠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备受尊敬的宗教或政治人物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很少有机会直接行使正式的国家权力，而一旦行使，则要么是通过比较暴力的警察、军队、司法介入等手段，要么就是以保护的名义从事腐败的勾当。在那里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活动——由橡胶轮胎制作出的凉鞋在路边销售，混杂在密集、嘈杂的环境中为曼哈顿的商店提供皮革制品或手工艺品

的分包商，等等。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备通常来说都是稀缺品，整个居住区都散发着恶臭，电力供应则更是偶尔为之。人们的寿命都比较短，婴儿死亡率则高得惊人。

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掠夺与互助并存，暴力事件则往往被视做获得社会权力的一种手段，有时候暴力本身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从乡村新迁移到这里的人被看为社会最底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结构非常不稳定。一些非政府组织尝试改善这里的状况，而试图为这里引入小额贷款项目的一些努力也在很艰难的继续着。

一些项目是由希望提升这里的物质条件的规划办公室提出的，但是当地人却认为这不过是把他们从具有极高潜在价值的土地上驱赶出去的一场阴谋。那里几乎没有医疗服务（除了当地的一些偏方和咒语外），教育设施要么根本没有，要么极其随意。个别劳动力会去城市的其他地区寻找工作，男人去建筑行业或工地工作，女人则几乎是免费为中产家庭打扫卫生，只为了得到这些富裕的人们吃剩下的残羹冷炙。调频收音机在那里很常见，因为没有固定电话，通常是偷来的手机反而无处不在。事实上，那里主要的市场活动要么是交易偷来的赃物，要么是交易最便宜的产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七大领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共同存在。尽管这里和美国的郊区存在着天壤之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整个空间内描述其内部关系，考察通常来说紧张、矛盾的七大领域共同演化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促成了贫民窟这个动态生态空间的形成。

在前面提到的3个城市，七大领域的共同演化路径似乎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第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无不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第二个城市，发展则处于停滞状态；而第三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则和第一个完全相反。但是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市，我们都可以看出人们生活得如何，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如何变化的。



事实上，详细描述不同地区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各地变迁过程的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或人口学著作数不胜数，这些著作往往也会涉及七大活动领域之间的关系。另外，关于“美国近郊社区”、哈萨克斯坦、埃及的开罗、印度的青奈、德国的乌帕塔尔、肯尼亚的蒙巴萨、中国广东、美国俄亥俄州等地的最新动向，媒体也时刻都在关注着并及时予以报道。但是当我们试图把散布在地球不同角落的所有这些地区以一种既考虑到了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又考虑到它们各自毋庸置疑的特殊性的方式集中在一起研究时，就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资本在世界各地的运动过程用图形描述出来，那么它看上去将类似于气象系统从太空中拍摄的一张卫星云图，围绕着海洋、山川和大量平原而蜿蜒盘旋。我们将会看到某个地区一切都顺风顺水，另一个地区则可能因为天气状况无法起航，这里处在反气旋涡中，其他地区则出现了程度和范围不同的气旋。龙卷风常常会偷袭这里或那里，偶尔台风或飓风裹挟着海浪而来，危及那些在回家路上的人的生命。一场及时雨会使得万物重新恢复生机，而干旱则会使得某个地区寸草不生。

乍一看，似乎某种气象状况的发生是很偶然的，是不可预料的。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我们还是能够对它们的特点和规律略知一二。另外，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也是可以预测的。气候学家和气象专家虽然只是借助混沌理论，通过对细节的研究来提炼出他们的观点，但是对于导致天气和气候发生变化的流动动力学原理、热平衡等问题，他们的理解已经很透彻了。他们甚至可以对近期的天气状况做出预测，尽管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他们还可以对气候的长期变化趋势，如全球变暖等，做出预言和判断。至于他们对过去发生的气候现象的解释，则已经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经济地理学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就是通过对看上去非常混乱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观察，找出社会变迁的特有模式及长期趋向。例

如，如果对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状况做一个回顾，不难发现亮点主要出现在环太平洋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美国西海岸及从巴伐利亚到托斯卡纳的整个地带。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则处于停滞状态，很容易爆发政治、经济骚动；而俄亥俄河谷、宾夕法尼亚、英国工业腹地及德国鲁尔河谷地区则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中。但是，对天气和气候的研究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的一个最大区别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流体动力学法则一直适用，而资本积累规律却会随着人类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

可悲的是，和对世界天气和气候问题的研究投入的精力比起来，有关经济的地理学分析和预测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此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通常集体选择对经济地理问题视而不见。总体来说，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存在例外，人类学家以整个人类社会过于复杂因而是不可驾驭的为由，把研究的焦点放在局部某个民族身上；社会学家则主要关注社区，直到不久以前才扩大到国家的范围；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活动是唯一重要的。而错综复杂的地理学问题，从区域性的到全球性的，则或者被漠视，或者被简单地看做戴蒙得在《枪支、微生物和钢铁》或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奇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中宣扬的陈旧的自然地理决定论，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有触发国家之间地缘政治斗争的危险。

其结果就是给我们的知识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双重空白。一方面，我们不甚了解世界各地正发生着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影响到另一个地区，以及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方式产生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评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看上去毫无章法和规律的世界不均衡发展。进而，当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时，我们完全无计可施，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使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朝着较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地理学方面的准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看上去混乱不堪的世界，理解它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粗略地给出一些答案。

■ 地理学准则一：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

地理学准则一就是资本积累的所有地域限制都必须被打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资本必须努力打破阻碍其流通，即交换的每一个障碍，并且征服整个世界。资本还必须竭尽全力利用时间来占领空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

并不是很久之前，基于城市发展起来的商人和贸易者认识到，要想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或皇家社会中存活下来，他们必须具备利用空间的超强能力。商人和贸易资本及新生的银行资本能够生存并最终打败封建制度，很大程度上凭借了空间战略，尽管他们不过是把一些地区——早期的贸易中心保护起来，作为在一个充满封建约束的世界中捆绑在一起的几个自由的“孤岛”而存在。到了今天，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依然通过对空间的绝对掌控，以及在一定空间内的流动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每个人所知道的，这种掌控力对维持军事领先地位也是很重要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的所谓“太空竞赛”或许是对当代这一无处不在的企图的最戏剧化的展现。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企业中，就秘而不宣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准则，即积极为有助于维护国家和资本对空间的统治权，及其在不同空间之间的运动的技术和组织形式提供资金。这也是英国皇家社会在18世纪努力地想要研制出可以在公海准确定位的精密仪器的原因。在早年间，地图一度被视为国家机密，被谨慎地锁在柜

子里。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求助于卫星、GPS、谷歌地图等，但这些都还没有办法阻止美国为了保护其军事利益而买下整个阿富汗的卫星地图。在阿富汗上空飞行的无人驾驶飞机根据来自科罗拉多的指令投射导弹；在美国的华尔街通过电脑下达的交易指令在伦敦市场执行，而其效果则会马上在新加坡和苏黎世市场上得到反映。

对不断扩大领土范围的渴望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此前关于人类可以摆脱将我们束缚在地球上的各种枷锁的信条，已经被证明不过是中产阶级乌托邦式的痴心妄想之一。“啊，万能的神！你掌管一切，除了时空，以及让相爱的人幸福”，这是18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普的名句；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儿则大力宣扬人类可以成为大自然的统治者和主人的观点；歌德笔下的人物浮士德为了成为世界的主宰，和魔鬼签订契约；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他的作品往往以揭露人们对上层社会生活的渴望为主题，他想象自己“在地球上肆意地驰骋，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对地球进行改造，“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有了这个世界，而它则毫无还手之力……我现在在这里，而且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时间、空间、距离，这些都不足为惧。世界不过是我的奴仆。”

征服时空、掌控世界（这既包括我们的“地球母亲”，也包括整个世界市场），这是经常浮现在很多资本家脑海中的一种幻想，他们把它看做崇高的男子汉气概和男性魅力的展现。是这一信条驱使资本家展露出“动物精神”（即本能冲动）吗？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大资本家和对冲基金巨鳄都是男性吗？这是金融巨头们大手笔将整个新西兰的全部货币作为赌注时的感受么？掌控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真的需要极强的勇气。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在过去40年间经历了去工业化的每一个工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述了资本家对征服世界的渴望所带来的世俗结果：

所有旧式的民族产业不是已经被摧毁，就是正在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产业，对处在文明时代的任何民族来说，是否引进这些新型产业俨然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以前仅本国产品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现在，新的需求使我们必须进口来自遥远国度的东西。以前各个地区或国家都是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但现在，来自不同大州、世界各地的国家互相依存。

我们现在所为之努力奋斗的“全球化”其实一直都是资本家梦寐以求的目标。

征服世界和大自然的渴望终究是人类长期以来的共同梦想，还是只是资本家的宏伟心愿，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征服时空、主宰大自然长期以来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共同的精神所在。尽管面临人们的各种质疑、反抗、斗争，甚至政治运动，尽管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期望看到的结果，但坚信征服时空和大自然（甚至包括人造自然）在人类的能力所及之内的观念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结果就是逐渐形成一个我称其为“时空紧缩”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人或物之间的联系，即距离越来越近。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平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激烈的竞争迫使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希望凭借对时空的掌控及领先的技术来获得优势，而不管通过哪一种途径获得发展的优先权，都会给这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收益。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或时空的扩展来得到解决信念就开始普遍流行起来。过剩资本的吸收出现问题？那么就发明一种新的技术或新的生产线。或者，扩大地域范围，在另外一个地方寻找新的市场，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通过殖民或新殖民统治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19世纪中期前后，英国资本家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可供利用的外部市场，应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向海外输出资本，开创新的生产中心，在那里，不断扩大的生产（如当代中国），而不是“个人消费”（如负债累累的美国人）将创造新的需求来吸收过剩的资本。

当技术性解决方案和时空解决方案发生冲突时，就以用帮助扫除资本周转的所有时空障碍的技术创新来作为折中。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有多少技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缩短资本周转的空间距离或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数不胜数。如果没有铁路、轮船、汽车、高速公路、飞机、电报、收音机、电话、电子通信设备，等等，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每毫秒，全世界范围内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额大约为 600 万亿美元，各个金融中心之间的信息传递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甚至连每年猪的数量和以前相比都增加了一倍，这也就无怪乎猪也会得流感了。

■ 地理学准则二：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地理学准则二源于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资本周转过程并不是在万分险峻的条件下完成的，生产意味着货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常来自某个区域性市场）在某地的集中，所有这些要素汇集到某个特定的地点，在那里新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接下来，产品再被运送到位于另外一个地点的市场上，在那里进行出售并供消费者进行消费。临近生产资料（包括自然资源在内）、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地点有助于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利润。

但是，资本周转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呢？答案是，当货币所有者希望雇用工人利用手里的货币来赚取更多的金钱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个人才可以开始赚钱，或者更重要的，才能持续

不断地赚取利润呢？显然，必须要有一个货币化的经济，及交易市场，并且货币已经成为社会权力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还必须有依靠工资过活的工人；或者至少可以通过把人们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或通过其他某种途径把人们吸引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为生产提供可供利用的劳动力。要想具备这些条件，首先就要克服单个资本积累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障碍。

先有资本积累的事实，然后才有资本积累的法则，而不是相反。这是很重要的。一度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马克思认为每件事都是先从经济角度出发进行权衡的，从经济角度来分析是理性的。据说马克思曾说过，个人意志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事实永远不容抹杀，很显然，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魅力就在于它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经营的企业家的本能、进取心，甚至他们的一些疯狂的想法，即马克思和凯恩斯提到的“动物精神”。只有在适度包容、尊重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投机资本主义才能萌芽并不断发展进步。不管是从资本主义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是从其必需的具体实践来衡量，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个人有参与投机性赚钱活动的自由和机会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深知这一点，并对此表示欣赏和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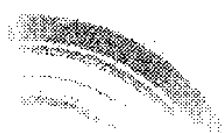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地看上去毫无章法的发展差异是资本积累过程开始的必要条件。毕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社会与政治管制都比较宽松的小村庄或乡镇，而不是像诺里奇、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团体政治和工会组织大肆盛行的中心城市。同样，在美国是在芝加哥这样的小型贸易城镇，工业革命的浪潮得以继续。

所谓的资本积累规律是在了解资本积累的事实之后总结出的，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之下，威廉·莫里斯才决定在英格兰的东牛津生产汽车，而不是修理自行车。在底特律的亨利·福特也是一样。但是，不管是对莫里斯来说，还是对福特来说，初始条件——有可供利用的原材料、工人及消费市场已经具备，足以保证他们获得成功。一个好的开

始给当地带来更多支持性基础设施（既有硬件也有软件）的建设，后者反过来又使得当地更适合生产汽车。成功的企业通常会大力发展自己周边的基础设施（也不可避免地会给其他企业提供便利），这使得它们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但是，最近，在汽车产业诞生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看到竞争和危机把这些一直以来都颇为成功的汽车制造中心逼向了消亡或进行革命性重构的边缘。

正是通过竞争及经济危机，资本积累“事后”的合理化和地理重组过程才得以开始。这也是为什么竞争和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的演化历程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也解释了在硬件设施、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都相差甚远的世界各国中，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得以繁荣。正是因为我们事先永远都不知道一个追求利润的冒险行动究竟会在哪里取得成功，探查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并找到需要的条件，这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而且，失败的例子远远多于成功的例子。有谁能想到在印度的班加罗尔，IT产业会如此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特试图在亚马孙河流域建设一家新的橡胶生产基地，为什么会惨遭失败？不同地域之间的多样性对资本的再生产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种障碍。如果这种地域多样性不存在，还必须首先把它创造出来。

货币、商品及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持续流动要求把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富有效率的交通和通信系统联结在一起，由此引发的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布与跨越空间障碍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及能源价格的下降，这种时间和金钱成本也在不断缩减。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言，距离所起到的阻碍作用正变得越来越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域差异已不重要，恰恰相反：高度流动的资本对不同地区之间哪怕是最微小的成本差异都不放过，因为这会为他们带来更高的利润。



■ 地理学准则三：经济活动集中在某地区

地理学准则三是，资本家总是会蜂拥到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这一事实通常会导致很多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个特定地区。棉纺织工厂会因为临近机器设备制造商、化学染料生产商、制衣商而从中受益。“外部经济”（一个资本家从临近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经济收益）引发了资本家的活动在地域上的集中。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把大量企业的聚集区成为“工业生产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特点。可以利用的共同的法律、金融、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服务，以及共同的劳动力大军和支持性行政工作，这一切也都会大大降低处于特定地区的资本家的成本，直到拥堵造成的成本超过聚集带来的收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工业城市的兴起是经济活动在某个地区聚集的缩影。到了近代，这种聚集更多地体现为像硅谷这样的“马歇尔式”工业生产区，或者像博洛尼亚周边的“第三意大利”——很多小企业聚集到那里，希望获得生产和营销的经济性。在当今这样一个金融高度繁荣的世界，以金融部门为核心为其提供法律、会计、税收、信息、媒体等方面的服务，是像伦敦或纽约的华尔街这样的大型金融中心的典型格局。

很早以前，资本主义企业就在不同地域的市场之间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像羊毛、棉花、染料、木材和皮革等原材料往往是从很远的地方运送过来的，另外，虽然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部分产品的产地都不太远，食盐、辣椒、糖、茶、咖啡、可可豆、酒、松香、干鱼、小麦及大米等却是随商人们的贸易活动远道而来的。在一些情况下，商品交易网非常正规，

早期的汉萨同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自13世纪起，来自众多城市的商行和商人们就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交易网，其覆盖面从波罗的海一直延续到伊比利亚半岛。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贷款公司应运而生，在16世纪德国的奥斯伯格和纽伦堡诞生了第一批银行家，而在19世纪，则诞生了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大型贷款公司，它们的业务拓展到了维也纳、巴黎、伦敦、马德里等地。现在，高盛和汇丰（汇丰志在成为“世界的本土银行”）也在全球各地拥有分公司。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如在中国古代，交易活动是在一个定期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的，有专门的征税者或其他权力机构对这个市场进行密切的监督。进行交易的商品千里迢迢而来，如沿着从中国一直向西延伸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丝绸之路”。即便是到了现在，民族特色产品的贸易依然采用了这种形式。随便去哪个城市的中国城走上一圈，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各地的商品贸易网互相交织，不断向各个方向扩张，希望可以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

西藏偏远地区出产的羊毛成功打入了印度市场，而产自蒙古和中国西部地区的中草药和肉类产品在进入东南亚国家进行销售之前，会先在中国香港进行包装处理。北非或印度卡拉拉邦街边的货币交易所帮助来自海湾国家的汇款到达指定人手中。

建立商品交易网、增加人们与贸易有关的地理知识、弄清楚什么样的商品是可以进行交易的，这是商人和商业资本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也是商人们所为之努力的，当然，问题的复杂性已经大大增强了。他们不断探寻、发现新的原本隐蔽起来的市场，从而吸收社会中的过剩资本。

竞争促使单个资本家和企业不断寻找更适合的生产地点，就像竞争迫使他们不断追求领先技术一样。一旦发现了新的成本更低的生产地，如果可以的话，迫于竞争压力，资本家一定会把生产活动迁移到那里。大批工厂从美国的俄亥俄州迁向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迁向墨西哥的提华纳，或者从英国的兰开夏郡向土耳其转移，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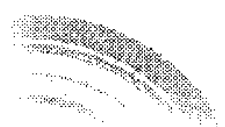
寻找最适合的生产地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竞争。不同企业或许可以采用完全相同的生产技术，但是它们的生产所在地却绝对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亚当·斯密很早之前就已经指出的那样，企业之间对空间的竞争，是一种垄断形式的竞争。如果在伦敦和格拉斯哥之间修建 12 条铁路，无疑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在同一条街上开 12 家超市显然也是不符合经济逻辑的。正确的做法是，从伦敦到格拉斯哥只有一条铁路线，而超市散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但是另一方面，把所有珠宝商或古董商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条街上，就像纽约那样），却是合理的，因为这种集中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性：如果有人想找一块古董金表，毫无疑问他更适合去汇集了很多商店的地方。

空间竞争中蕴涵的垄断因子对于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来说意义深远。

在交通运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很多本地生产商就会免于外部竞争的压力。事实上，他们变成了当地市场的垄断者。而当交通运输成本降低时，生产者在区域市场上获得的垄断能力就会被削弱。啤酒以前只在和酿造地临近的市场上销售，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啤酒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重要产品。更有甚者，产自法国埃维昂的瓶装水现在都可以运往纽约出售，退回到 50 年前，这会是一个十分荒唐可笑的想法。即便是现在，从很多角度看这样做也很可笑，纽约的自来水并不比这些舶来品差。

不过，通过宣称没有其他地方像某地一样适合生产某种特定的产品，生产商可以维持自己通过空间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产自某个地区，甚至只有产自某片土地（法国人称为“原产地”）的葡萄酒的口感格外独特，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更适合种植葡萄。维埃昂的矿泉水也已经成为一种品牌，虽然对它们进行的化学成分检验或口感测试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特殊的地理条件所带来的垄断力量和其他要素带来的垄断力量不相上下，生产商也总是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希望保护自己获得的垄断地位。试试看，如果你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生产法国洛克福奶酪，结果会怎样；除了法国某个特定地区生产的葡萄酒之外，欧盟不允许其他人生产的葡萄酒使用香槟这个说法。啤酒可以运往世界各地销售，但是几乎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啤酒酿造厂。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赋予的垄断优势的追逐过去一直是，将来也将继续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方面，经济活动向某一个地点集中确实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从分散化生产经营中获得更高利润的可能，这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很可能会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金融公司可能把总部设在华尔街，其所需的支持性工作则在新泽西或康涅狄格完成，同时它还在班加罗尔开设一些常规业务代理处。随着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以前是最优选择的地方现在可能丧失了优势。一度风光无限获利颇丰的工厂、钢铁厂、面包房、酿酒厂现在纷纷倒闭，它们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出现贬值，区域性经济危机毁掉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时间倒转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大约 4 年的时间里，谢菲尔德的钢铁厂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了 6 万个左右。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大型钢铁厂现在空空如也，安静地矗立在它诞生的小镇上，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被改造成成了一个喧闹的赌场。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又在不断建造新的钢铁厂、面包房、酿酒厂，等等。生产、就业、消费的地域分布模式总是处在永恒的



变化之中。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出现地方性的经济危机是家常便饭。挖空矿产，关闭矿井，剩下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废墟。当地的工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倒闭，几乎每个人都失业了。这些区域性危机会不会不断蔓延，直至演化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呢？绝对有这种可能。事实上，2006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初也只是发生在某些地区，主要是佛罗里达州及美国西南部，但是2007—2009年，危机转化成了全球性的。对于那些仍旧生活在价值不断降低的地区的人们来说，其承受的社会损失通常难以估量，其生活极其艰难。

■ 资本地域分布的特殊例子：城市化建设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个地域性在资本主义运行中起作用的扩展的例子。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的创建，特别是城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也是吸收过剩资本的一种重要途径。全球劳动力大军中，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从事的是和城市建设与维护相关的工作。大笔大笔的资金，通常是以长期贷款的形式，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投入到城市的发展建设中。这些债务驱动的投资活动往往会转变为危机的导火索。城市化、资本积累及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度思考。

城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存续就依赖于有剩余的物资和劳动力供其利用。这些物资或劳动力是从其他地方、其他人（通常是被雇用的农民、奴隶）那里转移到城市中来的。而且决定应该如何使用和分配这些剩余的权力一般来说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比如，某位宗教领袖、备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化和阶级的形成总是相伴相随的。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常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值得关

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永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为目标的阶级形态，这意味着它一直在为城市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当剩余资本的吸收、不断增加的人口成为让人头疼的问题时，城市化无疑是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好办法。这样一来，剩余的生产、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回忆一下 1852—1870 年，巴黎在第二帝国时期出现的状况。1848 年的欧洲经济危机是闲置的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导致爆发的冲突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根本没有办法把它们重新组织在一起。巴黎受到的冲击格外强烈，失业工人和中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者发起了革命，他们把社会共和看做解决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异常突出的资本家贪得无厌、阶级关系极不平等问题的良药，革命以失败告终。持共和观点的中产阶级发起了暴力革命，但是却没有走出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最后的结果是拿破仑·波拿马执掌法国，他在 1851 年发动政变，并于 1852 年自封为拿破仑三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波拿马对各种政治抵抗运动采取了大规模镇压的态度，但是他深知，他必须找到办法帮助吸收那些过剩资本并获取利润。他宣布，在国内、国外展开一揽子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国外项目主要是指修建从欧洲通往亚洲的铁路，以及支持类似开凿苏伊士运河这样的工作。在国内则包括进一步完善铁路网、修建港口和机场、建设灌溉设施，等等。但是首要的一点则是重新改造巴黎市区的基础设施。为此，1853 年，拿破仑邀请巴龙·欧斯曼来到巴黎，专门负责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

欧斯曼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通过城市化解决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的吸收问题。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巴黎的重建不仅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和

财力，而且成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工具。欧斯曼基本上遵从了傅立叶和圣西门重塑巴黎的设想，这一思路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论，但他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欧斯曼放大了城市化进程的波及面，他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城市的建设，把郊区也纳入了进来，重新设计整个社区，左拉在发表于 1873 年的小说《巴黎之腹》（*The Belly of Paris*）中就对巴黎中央商场的产品市场做了精彩的描述。欧斯曼对巴黎进行了一场整体改造，而不是对其局部进行修整或做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部分得益于新的建筑工艺（钢铁和玻璃、汽灯照明等开始应用于建筑），部分则得益于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综合性企业和百货公司）。除此之外，他还需要新的金融机构及贷款手段（动产银行和不动产银行）的支持。事实上，正是借助于凯恩斯式的通过债务融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方法，欧斯曼很好地解决了过剩资本的利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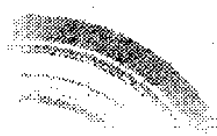
在欧斯曼对巴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的同时，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新的城市风貌也逐渐开始形成。巴黎成了“不眠之城”，是购物的天堂，是旅游胜地，是欢乐的圣殿。咖啡厅、购物商场、时装、展览、歌剧及对公众开放的宫廷生活，所有这一切都通过拉动人们的消费带来了新的获利机会，关于购物商场，左拉在另一部小说《妇女乐园》（*The Ladies' Paradise*）中有精彩的描写。遗憾的是，这一切赖以生存的金融系统和信贷机构因为过度扩张、投机性越来越强而在 1868 年的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欧斯曼被迫离职，绝望的拿破仑三世转而对俾斯麦领导的德国发起战争但损失惨重，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真空期后，巴黎公社成立了，资本主义城市建设史上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也自此开始了。

我们再来快速回顾一下 1942 年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庞大的战备需要，20 世纪 30 年代让人头疼的过剩资本吸收问题及与此相伴的失业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相当危

险的政治问题。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在执掌着一个国有经济，并且他们做得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入侵。此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社会运动，左派力量也投入到了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曾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公众关于企业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及是否有效率的质疑甚嚣尘上。统治阶层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于无奈，只能对左派采取政治制压措施。麦卡锡主义者，主张对共产主义革命分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个观点在1942年美国国会举行的成立非美国行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征兆，他们在1950年之后采用各种途径打击任何形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但是，过剩资本吸收问题又该怎么处理呢？

在罗伯特·摩西看来，答案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把欧斯曼对巴黎的改造计划完全照搬到了大都市纽约的重造中。摩西摒弃了对城市化规模的一般看法，不是仅从都市本身，而是从整个大都市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过程。通过借贷方式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基础设施，通过郊区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的新建筑技术重建整个大都市区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城市，摩西找到了利用过剩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向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扩张，这股郊区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美国各地，这不仅对战后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非常有利，而且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试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如果没有像纽约都市区、芝加哥、洛杉矶及其他类似城市的拔地而起，大量的过剩资本该是何等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啊。

不过，以这种方式解决过剩资本的问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对金融体系和行政框架进行调整，转向负债融资，这要求劳动阶层有



能力为城市化生活方式埋单做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劳资双方签订的合约，相当大比例的劳动者有机会分享到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这无疑为经济创造了大量有效需求。金融机构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发生的变革，特别是为住房抵押贷款提供便利的一些金融产品的出现，再加上政府为家庭提供的税收减免，以及慷慨地鼓励退伍老兵购买住房和接受高等教育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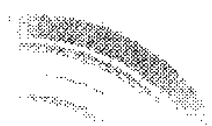
美国的城市化发展绝不仅仅是兴建新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正如在巴黎第二帝国所发生的那样，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相应做出剧烈变革，变得更依赖高速公路和汽车。这种发展还依赖于不断生产出新类型的产品并将它们推向市场，从人们居住的房屋，到购物中心，再到生活中使用的冰箱、空调、电视和电话，等等。这种发展还意味着每个家庭的车库里都至少有两辆汽车，以及橡胶、石油、钢铁产业的繁荣。甚至，人们对割草机的需求都大幅上升。毕竟，位于郊区的这些大草坪还是要修建得整整齐齐。总而言之，城市郊区化对于帮助吸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消费偏好及生产技术的外溢，特别是私家汽车成为一种消费文化之后，市郊化发展趋势扩散到了全球范围内。

遗憾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发展方式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对能源造成了极大浪费。它还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在美国，它导致了对外国石油资源的高度依赖，迫使美国人参与到对中东石油的争夺中，永无宁日。过快地向市郊发展还致使市中心的力量被削弱了，打破了市中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以美国为例，为摆脱“大萧条”而采取的城市郊区化发展策略诱发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所谓的“城市危机”——生活在市中心的少数群体（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因为没有享受到郊区发展带来的收益而发起反抗。

另外，这种发展方式带给郊区的也不全是正面的东西。新的生活方式引发了各种社会和政治后果。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人们想方设法捍卫房价，日常生活平淡无趣，甚至浑浑噩噩，这些都是新生活饱受诟病之处。传统主义者逐渐和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站在了同一个阵营，因为他对充实的城市日常生活应该包括哪些要素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开始反对向郊区扩张，反对摩西式的通过大规模项目来实现现代化的粗暴方式，相反，他们推崇强调当地社区的发展、文化传承，以及将破败的老社区改造成舒适的中产阶级居住区的城市发展理念。女权主义者更是把郊区和郊区生活方式视做她们所有不满的发源地。和欧斯曼后来的经历差不多，随着问题的显现，摩西式城市化（及摩西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逐渐退下神坛。就像巴黎的欧斯曼化导致了后来巴黎公社的建立一样，浑浑噩噩的郊区化生活方式也对美国1968年爆发的激烈抗议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来自郊区的白人中产家庭的学生们由于不满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他们把一辆雪佛兰轿车埋进了沙子堆，并且烧毁了美国银行的一座楼来表达对这一切的反感。他们和其他同样被边缘化的群体结成联盟，抗议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对越南的战争），以及给环境带来极大破坏的郊区化消费方式（第一个地球日就诞生于1970年）。他们发起了一场虽然不成熟但是却轰轰烈烈的运动，希望可以把世界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人们可以在城市过上和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将发生转变。

更重要的是，一场发端于美国，随后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逐渐在国家-金融节中显露出来，正是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向郊区的扩张及这种趋势在全球的蔓延提供了动力。这次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已经处在酝酿之中。曾经的解决方案现在反过来成为了问题。1944年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濒临瓦解。因为过度借贷，美元承受的国际



压力越来越大。紧接着，随着全球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衰退之中。我们前面曾提到的所有恶果在黯淡低迷的 20 世纪 70 年代都毕露无疑，无处遁形。

不无巧合，1975 年纽约市财政危机是这场风暴的中心。纽约市当时的公共预算额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或城市中都是最高的，其郊区很富足，但在那一年纽约市政府破产了。最后，由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合作实施的对策是，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寻求帮助并贯彻其政策主张，后来为了维持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其他国家也纷纷效尤。具体的做法非常简单：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压低工人工资，让市场自由运转，与此同时，明确国家权力是为资本特别是金融活动服务的。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俨然是 2008—2009 年这场危机的根源。

■ 城市化成为全球性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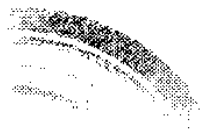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城市化经历了另一意义上的规模转变，它演变成一种全球性行为。中国在过去 20 年间的城市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略有放缓，但是很快就恢复了，自 2000 年起，中国消耗了世界水泥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在过去的 20 年里，100 多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 100 万人，一些曾经的小乡村，如深圳，发展成为人口总数达到 600 万~1 000 万人的巨型都市。工业化浪潮最初只集中在经济特区，但是很快就扩散到任何愿意利用国外的剩余资本的地区，因此，赚取的利润反过来又投入新一轮的生产扩张。大型基建项目，如大坝和高速公路等，同巴黎、纽约一样，也全部是贷款修建的，这使得中国各地面目一新。同时，大型购物中心、科技馆、机场、集装箱港、各种娱

乐场所、新建的各种文化展览场馆、高尔夫球场，等等，和从贫困的偏远地区来城市求职的劳动力大军拥挤不堪的房屋一起，共同点缀着中国的各个城市。

城市化进程给全球经济及过剩资本的吸收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对铜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智利的繁荣；澳大利亚的崛起，甚至巴西、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总额增加了10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稳定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阶级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它使一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积累起巨额个人财富。

碧桂园是一家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在珠江三角洲从事住宅开发的企业，在摩根大通银行的帮助下，它于2007年在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市场净值高达270亿美元。公司创办人的女儿持有该公司60%的股份，总价值160亿美元，这使她和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一起成为世界富豪排行榜上的一员。

不过，中国不过是处在全球各地都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的中心，这一进程得到了日渐一体化的世界金融市场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借贷完成的城市化工程项目到处都有，从迪拜到圣保罗，从孟买和马德里到伦敦，随处可见。中国的央行在美国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上极为活跃，它大手笔投资于房利美、房地美，这也解释了当美国政府决定对“两房”实施国有化战略时，为什么会为债券持有人提供保护。高盛集团被深深卷入了孟买一路飙升的房地产市场，而对巴尔的摩的投资很多则来自香港。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幅景观：一栋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拔地而起，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贫困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贫民窟或城中村。



很多城市都曾见证过房地产业的繁荣，墨西哥城、智利的圣地亚哥、孟买、约翰内斯堡、首尔、台北、莫斯科、欧洲地区的一些城市（特别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如伦敦、洛杉矶、圣迭戈和纽约等。纽约市在其有着亿万身价的市长迈克尔·布鲁姆伯格的治理下，纽约又有一批前所未有的大型城市建设项目已经成形。中东一些国家，如迪拜和阿布扎比，通过一些宏大、令人叹为观止，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有点荒唐的城市建设工程，来吸收石油资源带给他们的巨额过剩资本，例如，在炎热的沙漠当中修建一座室内滑雪场。遗憾的是，很多一度繁荣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现在都陷入大麻烦中。迪拜世界集团是一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企业，它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大肆借贷，但是 2009 年年底，迪拜世界集团突然宣布可能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恐慌和各种各样的担忧。

城市化进程在全球大范围推进很容易让人迷惑，从而忽视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这场全球性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和欧斯曼在巴黎第二帝国时期推行的主张别无二致。和以前的城市化进程一样，这股新的城市化浪潮同样也依赖于金融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筹集到维持这一进程所需要的贷款。将抵押贷款证券化并打包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设立新的金融机构以发展二级抵押贷款市场，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金融创新的回报也相当可观：一方面分散了风险，另一方面则把过剩储蓄转化为了过剩的住房需求。利率水平大幅下降，但是那些创造出这些衍生产品的金融中介却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但是，分散风险并不等同于消除风险。另外，风险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分散这个事实助长了个别人或个别地区更冒险的行为，因为风险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1867—1868 年皮埃尔兄弟在巴黎的遭遇、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纽约市所经受的考验，更不要说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案例，现在都再次重演，只不过这一次首当其冲的是住房次级抵

押贷款。

和以前各个时期一样，城市占地面积的扩大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是为了缓解20世纪60年代郊区人民的不满。当城市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生活主要体现为消费、旅游、购买奢侈品、发展文化和知识产业、永无止境地追求场面经济的世界中时，生活质量只能是有钱人才有权利追求的东西。对于一个越来越依赖消费和将消费者的喜好作为发展动力的经济体来说（消费对当代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占到了70%，与此相比，19世纪这一比例只有20%），通过城市化刺激消费对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来说，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后现代风格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消费习惯、文化传统等影响着细分市场的风向，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为名，弥漫在当代城市，当然前提条件是你有足够的钱可以支配。购物商场、大型电影院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每一个都是大工程），快餐店、工艺品店、精品店、咖啡厅等也不例外。另外，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圣保罗、孟买，以及你能够想到的任何一个亚洲城市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向郊区扩张的过程原本是时断时续、平淡无奇，没有什么亮点可言的，但是现在连它们也通过“新城市主义”运动找到了突破口，其主旨是宣扬可以实现人们的城市梦的社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关系密切融合，很安全）和“可持续”的精致生活方式。

政治主体性也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强调占有性个人主义和金融投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道德观，已给成为人性社会化的模板。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推崇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正逐渐成为它最大的特征。它打破了小家庭是资本主义坚固的社会基础这一神话，慢慢地、一点点地开始接受多元文化，承认妇女的权利和男女平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城市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的同时，人们作为个体却感觉到越来越孤立、焦虑、短视，甚至神经衰弱。

但是，通过城市化来吸收过剩资本也有其不好的一面，那就是通过“创造性毁灭”重复宣扬城市重建，此时，危机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因为危机的爆发往往预示着城市再次开始重建，而那些贫穷的、处在社会底层的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最为痛苦。

要想在旧城市的“遗址”上建立新城，有的时候要依靠暴力。欧斯曼以为民服务、环境保护、城市改造等名义，利用原本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征地权，迅速拆除了巴黎的贫民窟。他有目的地把工人阶级和其他不易控制的群体随着有碍健康的产业一起，从巴黎市中心迁移了出去，如果任由他们留在原地，对公共秩序、公共健康，当然还有统治者的政治权力都是一种威胁。欧斯曼打造的城市使得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监视和军事控制，从而可以通过军事力量轻而易举地将反动力量镇压下去，但是正如 1871 年巴黎公社的成立所证明的，这不过是统治者一相情愿的是痴心妄想。

实际上，正如恩格斯在写于 1872 年的小册子《论住宅问题》(*Housing Question*)中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即每解决一次就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次，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我这里说的“欧斯曼”，不但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种特殊的波拿马主义办法，即穿过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马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是指把工人街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街区切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铺设铁路、

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又在别处出现，并且往往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每夜用来禁锢我们的工人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最可耻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

恩格斯描述的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史上不断重复。罗伯特·摩西“对布朗克斯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套用摩西自己的话），代价是给极富价值的城市结构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破坏，而当地居民则失去了整个社区和他们长久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在1968年的政治骚动（源于巴黎，但是紧接着从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再到曼谷的很多地区都爆发了暴力冲突）成功阻止和克制了国家粗暴征用土地、为了修建高速公路而拆毁老社区、盲目城市改造等行径之后，另一场更隐秘、危害更大的转型进程开始了，这一次主要表现为约束民主政府的财政支出、放松对土地市场的控制、在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以及把土地交由那些能创造最大回报的人使用。

恩格斯非常清楚这个过程的本质：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土地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

想想恩格斯在 1872 年就写下了这些话，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沮丧的事情。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形不仅可以直接应用于亚洲大多数城市在当代的发展进程，如德里、首尔、孟买等，而且与纽约的哈莱姆区、布鲁克林区的“乡绅化”非常吻合，即把破败的市区改造为舒适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城市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替代和摒弃一些东西。这是通过城市化来解决资本吸收难题丑陋的一面。

以孟买为例，那里有 600 万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大部分街道没有正式的名称，甚至在孟买市的地图上那里是一片空白。因为当地政府希望把孟买打造一个可以和上海媲美的全球金融中心，那里的房地产业迅速繁荣起来，贫民窟里的居民们占用的土地的价值自然也与日俱增。达拉维是孟买最著名的一个贫民窟，其土地价值现在已经达到 20 亿美元，清除这个贫民窟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而这种呼声通常是以环境或社会原因为由的。资方因为有政府的支持，往往对贫民窟采取强制性拆除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强行占用穷人已经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的土地。在那里，通过房地产开发，一些人很快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因为他们使用的土地几乎是无偿取得的。那些被强行从自己的家里搬出去的人们可曾得到了任何补偿？幸运者或许会得到一些。尽管印度的宪法规定，国家有义务保障所有国民的生活和福利，不分等级和种族。保护他们的住房权利，后来印度最高法院对这一内容进行了修改。那些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居住在当前居住的这块土地上的住户，没有权利要求补偿。最高法院宣称，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补偿，无异于奖励小偷的盗窃行为。这样一来，那些住在贫民窟的人要么奋起反抗，要么卷起行李在高速公路边上的空地或能够找到的其他地方露宿。

类似的剥夺他人土地的例子在美国也可以找到，尽管不像印度这么粗暴、这么无视法律的存在，比如滥用手中的权利，让那些房屋状况本来还

不错的长期居民同意把土地用于建造更高级的房屋，如私人公寓、商店等。当有人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时，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法官延续了以往反对保守主义的传统，认为地方法院的判决是完全符合宪法的，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加房地产业的税基。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20世纪90年代的首尔，那里的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雇用了许多像摔跤选手一样勇猛的打手，他们冲到人们的家里，用锤子砸毁房子及其他财产，仅仅因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建于城市小山坡上的房子所占用的土地的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一路飙升。现在，这些山坡上盖满了摩天大楼，全然不见当年为了建造这些大楼，强行将这里的居民赶走的野蛮和粗暴。在中国，也有数以万计的人们被剥夺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占用的土地。因为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政策，政府只须要给予微薄的现金补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撵走，然后政府转手将土地使用权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取厚利。在某些地方，人们心甘情愿地就搬走了，但是大规模抵制拆迁的事例也时有报道。另外，随着城市向外扩张，农民们也没能逃过强制拆迁、土地被征用的命运。印度农民也有同样的经历，打造经济特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现在都很偏爱的做法，这引发了针对农民的暴力事件，其中最为荒唐、最为残暴的就是在印度共产党的指使下，发生在西孟加拉省兰迪格兰地区的大屠杀，而这不过是为了给大量对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兴趣重于其对工业投资的兴趣的印度尼西亚资本让路。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类似前面提到的城市化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到人们的抵制。事实上，各地都曾爆发社会抵抗运动。有时候，这类社会运动追求的目标比较狭隘，单纯地反对乡绅化，或者捍卫人们应享有的支付得起的住房的权利。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类运动可能会演化出更多的诉求，比如，巴西人所追求的“居住权”，或者换个说法，即所谓的“城



市权”——打造一个更注重社会公平原则、更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新型城市的权利。

因此，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地域扩张中的权利是一项通过斗争才能争取来的权利。虽然在当前关头，权力关系毫无疑问更偏爱政府和资方相结合，但是反对的力量也不可谓不强大，而且不管是资方还是政府都处在被动防守的一方，他们曾宣称要为他人利益服务，但是在这一点上很明显严重失言了，就像他们也没能做到如他们所说的，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来提升全人类的福祉一样。

■ 城市建设中的获益者

尽管城市化进程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在其背后依然隐藏着一股重要的力量，不管是研究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过程，还是探讨资产阶级权力的演化过程，这股力量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开拓新的疆土意味着相应的土地从里到外都要发生改变，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好处多种多样，他们可以从土地价值的急剧增长中获益，也可以从土地租金及土地上所包括的“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中获益。地租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既取决于对这片土地进行的投资，又取决于改变空间关系（Space Relations）的投资，因为空间关系的改变可以通过改善访问的便利性而提高土地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土地开发利益集团绝对不能用土地贵族或封建帝王的“遗老遗少”来形容，事实上，为了提高收入、扩大权力范围，他们为资本主义在地域上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投资于土地、房地产、矿山及原材料，对所有资本家来说都成为了一个香饽饽。投机活动也变得猖獗起来。为了实现投机收益，只能推

动资本主义继续向外扩张。例如，在美国，只要启动向郊区发展的进程，周边土地的租金就会一路高歌猛进，投机分子很快就会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从投机活动中获利依赖于一些前提条件，那就是对高速公路、下水管道、自来水供应及其他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必须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投机者手中的土地才能升值。房地产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往往通过行贿、对政客的竞选宣传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来确保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种行为大大加快了城市向郊区扩张的步伐，而郊区化趋势本身又成为可以自我驱动的，在所有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土地价值大大提高。过度扩张总是可能的。毋庸置疑，总是会出现过度扩张的结果。日本土地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巅峰之后的结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倾斜”不仅可以产生向上的动能，同样也能导致急速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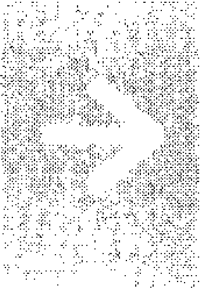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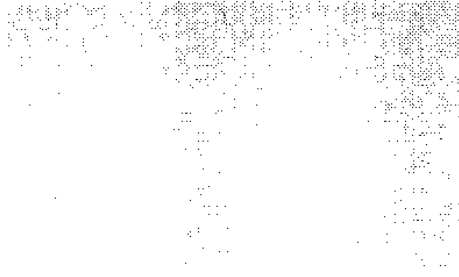
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地域扩张和打造新的空间关系中赚到的（或损失的）金钱通常来说都被忽视了。20世纪早期伟大的思想家、社会评论家凡勃伦就曾提到，美国的“有闲阶级”从与土地、城市发展有关的投机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决不亚于他们从工业生产中获得的财富。同样的结论很可能也适用于英国长期以来的情况，因为自17世纪以来，伦敦周边土地价值和租金的上涨看上去更多地增加了上层阶级的财富，而不是扩大了生产系统。另外，正如我们之前曾提到的，中国富有阶层的财富大部分也源于他们参与到了对城市发展工程的投机活动中。

如果从土地和资源的价值与租金在整个资本积累和周转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衡量，土地和资源所有者的影响力被大大低估了。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在所有经济活动中所占的百分比达到了40%。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当前各国政府为了支撑它们衰败的经济，能够选择的刺激工具中的重要一种。此外，把这种做法看做一种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权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地域的扩张，土地所有者（和开发商、建筑商，

当然还有金融从业者)在解决了过剩资本吸收问题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这个阶级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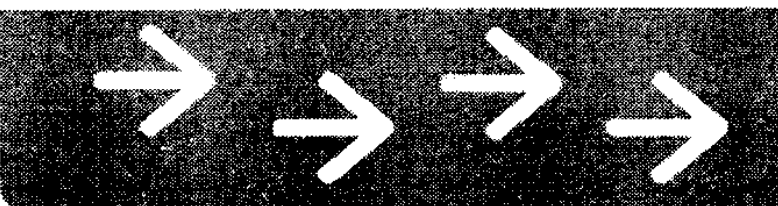
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资本家投资于土地并收取货币化地租,甚至连那些很多年前就已经摊销完所有成本的老房子也不放过,这相当于对其他形式的资本活动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人收取了等额的税收。原本是“自然的恩赐”(包括人类在土地上进行劳作所创造的“第二自然”的恩赐),现在却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一些生产者因为无力承担地租,而不得不被迫从租金很高的地方搬出去。随着某地土地价值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当地劳动力的工资也应随之上涨的压力变得不容忽视。在伦敦公共部门任职的人都可以领到一笔额外的补贴,以补偿生活成本的增加。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收租人和开发商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向郊区扩张,而且也对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长期停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凯恩斯曾满怀希望地假想有一天“收租人会安乐死”。不幸的是,直到现在收租人都还活着,虽然过得不是特别好——在纽约、孟买、拉斯维加斯和迪拜等地,散落着很多闲置的公寓。

政治经济学把地理、空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整合在一起以剖析资本主义,如果从这个角度对租金和土地价值划归类别,那么对于探究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理论而言,它们一定是最为重要的那一类要素。就像我们前面在利息和信贷问题中所看到的,租金问题处在分析的最前沿,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租金不过是从分配这个大类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小类。只有确定了这一立场,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正在上演的这场“造城”运动和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关系,弄清楚它们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第 7 章 资本与资源

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给环境造成破坏，地区间的差异性、国家行政制度都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国家间政治、经济力量的较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



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毁灭”

自然环境因为遭受了人类活动的破坏才发生了变化。土地被占用，沼泽干涸，人们建造了城市、公路和桥梁，同时植物和动物被驯化和养殖，栖息的处所也被改变了，树木被砍伐，土地被灌溉，河流通过筑坝被控制，还有山羊和绵羊贪婪地吃草的情景，气候也被改变了。矿物被挖掘，猎物损坏风景，废弃物流入河流和海洋，土地表面被腐蚀，由于人类的行为无数森林和灌木无地被根除，这些最终导致地球上的山脉减少了一半，同时亚马孙雨林也遭受了放牛人和大豆制造商饥渴的却不合法的侵吞。英国人喜爱在雾蒙蒙的乡间散步，并且珍视这些乡村房屋遗迹，威尔士人喜爱山谷，苏格兰人喜爱幽谷，爱尔兰人喜爱鲜绿色的沼泽，德国人喜爱森林，法国人对他们当地的葡萄酒和乳酪情有独钟。印第安人认为智慧在这些地方就可以体现，从亚马孙到英国哥伦比亚，甚至到中国台湾的各个山峰，各地的这些固有的群体都会庆祝他们长期以来没有被损坏的与他们居住地有着联系的遗迹。

对土地的创造性破坏的历史已经很长，这已经造成了有时候所谓的“第二自然”——自然由于人类的行为被改造了。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之前的“第一自然”如今已经所剩无几。即使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和最不受欢迎的环境，人类影响的痕迹也已经被记录下来，包括气候类型的改变、杀虫剂的影响、空气和水的质量的下降等。在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3个世纪，对土地创造性破坏的速度和分布范围都已经有了巨大增加。

在早些年，这些人类活动都被定义为人类战胜了自然的行为，部分还把与自然的关系加上浪漫的审美情感。如今我们在描述上更加慎重，其实

在实际中并没有必要。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预期之外的给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有时候是长期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影响是不可逆的，如物种和栖息地灭绝。最好不要想怎么去控制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而是应该考虑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尊重自然，考虑在以剧烈的、不可逆的方式改变地球面貌的人类生活网络内进行实践活动。

许多机构从事生产、再生产我们的第二自然的地理环境，在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最主要的两个机构就是各州和首都。首都的环境处于持续不断的演变中，很大程度上这种演变受资本积累的投机活动的驱动，而人的需要只能排在第二位。但是虽然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第二自然中没有纯粹的自然的东西，并且正在改变地理环境的自然的演进过程没有完全控制在各州和首都的手里，更不用说人们了，但是之后的活动家也许会做到这些。“自然的报复”这一说法昭示了一个倔犟的、不肯屈服的、变幻莫测的自然和生物世界的存在，它们和天气状况一样，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关系和本身就处在不停演化过程中的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

农业领域兴起的所谓“绿色革命”是关于七大活动领域是如何共同演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绿色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墨西哥，当时在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诺曼·布劳格的带领下（他已于2009年过世），一家新成立的农业研究所成功研制出一种新的小麦品种。到20世纪末，因为种植了这种新的转基因小麦，墨西哥的小麦产量增长了4倍，使丹麦自1945年以后就从一个小麦净进口国变成了一个净出口国。20世纪60年代期间，在美国一些基金会，如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以及越南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当这种小麦被引入南亚后，1965—1970年小麦和大米的产量都翻了一番，不仅引发

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讨论，还使得农产品的成本下降了 50%。“绿色革命”虽然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杜绝大范围饥荒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单一栽培方法意味着要大量使用化工肥料和化学杀虫剂。另外，参与农业生产的资本（主要是兴修水利、灌溉设施）一方面使得富有的农业生产者阶级更加团结（他们通常都会借助信贷机构的帮助），另一方面则使得除农业生产者之外的其他人沦落为无地农民。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质疑生产转基因生物是否符合伦理，而环保主义者更认为这件事情从道德角度出发完全不能接受。针对转基因生物贸易活动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已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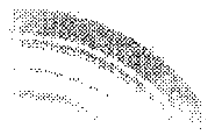
资本积累及人类对土地的创造性毁灭行为永远不可能只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如果不对人类为何会从事这类活动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不同地方的相同的演化活动是如何发生的，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无法准确地评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对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构成了障碍，而且不论从技术、文化、社会等方面做出怎样的改进，这个障碍都是不可能被转移或被逾越的。

当然，幸亏有环境科学的帮助，我们已经明白人类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那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来自工厂烟囱、发电厂的酸沉积自 1780 年以来一直在破坏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如曼彻斯特附近本宁山脉的泥炭沼泽。随着工厂开始采用高烟囱，硫化物也被排放到高空，导致污染范围从局部性扩大到地区性的。比如，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湖泊和森林就受到了英国产生的污染物的破坏，同样，新英格兰地区也受到了俄亥俄州河谷污染物的影响。各方也因此展开了艰难的政治协商和谈判过程。氟里昂在制冷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为保证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新鲜食物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如果氟里昂进入大气层，就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使紫外线强度增大，从而对地球上的生命，特别是赤道地区的生命构成威胁。各国政府为此展开了艰难的国际协商，并最终于 1987 年达成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约定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使用氟里昂。科学研究显示，人类的行为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使人们不再认为气候变暖不是科学家愚弄全世界人民的把戏，认为这个观点是科学家愚弄人们的把戏的人主要是得到了能源企业的支持。杀虫剂 DDT 于 1939 年投入使用时，一度被认为是攻克蚊虫等天灾的良药，但后来人们却发现它对很多物种的繁殖产生了毁灭性打击，并因此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迫停止使用这种药物。

资本家和他们的发言人在进行工厂的生产运营的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到第二自然的创造及其向不同地域的扩张中：在国家的纵容和包庇，甚至合谋下，扮演风险投机者的角色。19 世纪当美国国会批准企业可以在整个美国修建高速公路时，他们实际上就助长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活动，而且正如所预期的，这些投机行为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繁荣与衰败，导致了数不清的局部性经济危机。

认为自然是社会产物的说法和下面这个观点很类似：自然资源不过是文化、经济、技术评估的结果。从这个观点中可以衍生出两个结论。第一，资源是可替代的，比如，通过发明新技术，来使用不同的材料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认为煤炭是稀缺产品，而且会造成严重污染，那么我们可以转而利用天然气和核能。第二，新技术的采用和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受制于那些数量稀少或供给严重依赖于某个地区的投入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类似于风力涡轮机这样的所谓新型“绿色”技术，这类技术在应用过程中需要一些稀有资源，如钢、铅、钛、钨等，对这些具有磁性性质的稀有金属的需求不断飙升，而这些金属在中国的储备占到其世界总储备的 95%



这个事实引发了人们的恐慌。有迹象显示，中国可能会限制这些材料的出口，从而变相迫使那些绿色科技生产企业选择在中国建厂落户。这类情况并不罕见，历史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带来的垄断地位一直都是影响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国家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原材料的战略性供给，在必要时甚至会动用军事力量。

地球上自然环境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显而易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试图改善环境但以失败告终并带来触目惊心的恶果的例子。我很喜欢格雷格·格兰丁在他 2009 年的新书《福特之城》(*Fordlandia*) 中提到的一个故事，亨利·福特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时曾试图在亚马孙流域建造一家橡胶加工厂，为此，他在亚马孙流域买下了一大块地，并把自己计划打造的那个小城命名为“福特之城”，希望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的橡胶种植、加工工人们可以过上美国中西部地区人民所过的生活。福特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这里的橡胶厂为他在美国的汽车制造厂提供橡胶轮胎（当时福特几乎已经控制了所有其他原材料的供应）。“福特之城会修建中心广场、人行道，每个家庭都要安装室内管道，有着修剪整齐的草坪，有专门售卖鞋子和香水的商店，闲时人们可以去看看电影，或者去打打台球、高尔夫。当然了，街边一定还会停着福特的 T 型轿车。”格兰丁这样写道。但是在经过 20 年的尝试和努力，花费了大笔大笔的金钱之后，这些最后还是都化为了泡影。热带雨林打败了福特。1945 年，“福特之城”建造计划被迫终止，现在那里剩下的只是它的遗址。福特在那里一滴橡胶汁也没有生产出来。

福特之所以会有在亚马孙流域投资建厂这样一个离奇的想法，是因为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已经对贸易和投资活动敞开了大门，在他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过程中不会遇到任何空间障碍的限制，如国界。毫无疑问，福特非常确信，如果出现任何差错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地位来营救他。事实上，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海军一直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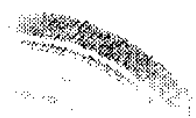
着中美大陆，随时准备动用其全新的航空导弹技术，来镇压尼加拉瓜的奥古斯托·圣蒂诺领导的农民革命，农民革命损害了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利益，而该公司当时的企图很显然是把“香蕉共和国”从一个称号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

危机的另外一种解读：时空布局的错位

不断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创造新的空间关系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随着空间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地理分布，不但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利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偏爱，也意味着残酷的创造性毁灭，例如，喷气式发动机成为内燃机的补充，甚至取代内燃机，成为交通工具的主要动力。互联网使得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更接近其“梦想”，即资本的完全无障碍流动。不幸的是，虽然关于商品和劳动力的信息可以在网络空间上流动，但是商品和劳动力本身尚且不能做到这一点。在购物网站买东西时你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支付，但是快递公司把商品送上门则往往要等上几天。

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在创造完全不存在空间障碍的世界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我们当前面临的这场危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时空布局过程中出现严重错位的一个证明。投资银行的头头脑脑们根本不可能时时紧盯着他们手下的交易员，从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最好的例子就是巴林银行的尼古拉斯·里森。这些交易员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在一个新建立起来的且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时空架构中工作，其结果就是高层监管和控制的缺失，并进一步导致了前面曾提到的种种后果。

社会秩序也存在很多类似的问题。例如，抚养孩子所处的时空与进行



金融投资活动所处的时空是截然不同的，人们要找到一个安全的私人空间——家进行日常生活的系列活动，并在那里按照一定的速度繁衍自己的下一代，如 20 年一次。但是要想拥有自己的家，他们就要拥有自己的房屋，因此就须要在信贷市场上抵押贷款，而这个市场构建在与家完全不同的时空逻辑上。现在，一些人放弃自己的房子，住在帐篷里，就是因为信贷市场依赖的时空逻辑出现了混乱。

这把我们引向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以及围绕这个过程构建的不同时空组合之间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一个深刻矛盾，例如，只有通过发生在特定空间的积极生产活动，资本才能自由地完成流动，这里所说的资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资本，从无货币到有形的商品、人力资本，以及服务等。但是，投资于土地的资本在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是无法流动的。这一动一静之间形成了两股扭在一起的力量，导致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如果附着在土地上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资本流动的需要，就必须把它们毁掉，并且按照全新的布局进行重建。否则，资本在流动时就要面临如何对投资于土地的资本进行补偿的问题。一个没有飞机进出的机场既不可能为投资者带来利润，也无法维持下去。

附着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或许有助于可流动资本的流动，但是如果流动资本并不遵循固定资本确定的地理路径，固定资本的价值就会遭受损失。此外，附着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生命周期通常都比较长，比如，建造机场或办公楼并偿还因此所借的欠款通常要花费好多年的时间。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永远在不知疲倦地追求速度，在永无止境地减少空间壁垒，但是它仍然须要调试自己，以适应固定在某个空间或处于在缓慢周转中的资本的要求。如果这个调试过程出现问题，就很容易爆发危机。

19 世纪因为过度投资于铁路而导致的金融大崩溃是一个预兆。当时，修建铁路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但是交通的便利不是万能的，附着在铁路上

的价值遭受了损失，而投资者损失惨重。佛罗里达州和纽约闲置的一栋栋公寓、加利福尼亚州停业的购物中心，以及加勒比地区门可罗雀的豪华酒店也是一样的情况。正如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指出的，资本在自己的领土内遇到了障碍。资本永无休止的循环和周转的要求与逐渐僵化的城市环境（想想纽约和东京所投入的数额巨大的固定资本）之间的脱节变得越来越戏剧化。

■ 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与资本积累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区域性社会组织对人类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资本的循环和积累是如何在满足了永无止境的复合增长率要求的条件下，适应、改变它们从前一个时代继承而来的区域性组织，创造出不同的空间，并且改变了全球政治权力的版图的呢？例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同时出现的，并且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帝国主义统治，这股浪潮在1870—1925年期间尤其凶猛，这些形成了现在世界上有组织的政治权力区域分布的基础。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资本积累不仅在很多老城市的改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伦敦、罗马和东京，而且打造了很多新的大型都市，如芝加哥、洛杉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深圳；而殖民活动则把约翰内斯堡、金莎萨、孟买、雅加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城市或地区定位为满足主要资本积累中心不断扩张的对生产资料、销售市场、新的生产活动，以及通过残酷剥削他人完成资本积累要求的地方。

但即便是在今天，也并非只有资本参与到了像底特律、青奈、佛罗里达州这样的地方的打造过程中，独立自主的个体所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去新泽西郊区或牛津的任意一家自助商店走一圈，你会看到熙熙攘攘



的人群，他们都是来购物的，来装扮自己的生活，如家和花园，使它们看起来具有独特风格。那些居住在城镇简陋的小屋里的人也会这样做，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使用一些废弃的商品作为原材料，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属于非法建筑，周围也没有配套设施，除非当地政府或世界银行尝试提供这些。空间打造，特别是围绕着我们居住的家园进行的空间打造，是一项属于个人而不是资本的活动，虽然当身为资本家的开发商想方设法想建设实现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时，人们围绕我们称为城市的这些空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们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嵌入到土地、城市、家这些不同空间之中，其背后的深层含义与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赤裸裸的商业化之间永远都是不一致的。

那么，我们的城市在设计规划时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利润为本呢？经常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一事实马上就把我们引向了通过一系列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来打造空间的话题，这一空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是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团结形成的地方，是各政治主体与象征意义形成的地方。资本家及与房地产开发相关的利益集团对这一话题非常了解，他们希望获取社区或城市的积极支持、精心培育人们对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归属感，这通常源于人们对某片土地或某个场所强烈的依附关系，通过这些方法，激发空间所代表的人性关系和意义。为此，他们邀请广告明星通过大量溢美之词试图说服人们，让他们相信向郊区新一轮的扩张将带来更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与生活相关的新技术，同时还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新空间。当然了，一旦游说失利，资本家们就会露出狰狞面目，不择手段地为他们的计划清空土地，从政治打击到法律制裁，无所不用其极。

相反，社会团结涉及的主体是那些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人——不同历史、文化、经历、宗教和语言的人，是那些不管游说者和“勾画大师”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消除他们对资本积累的机制、对市场价值观的厌恶和

排斥的人。很有意思的是，最近咨询行业衍生出一个新的业务活动——“城市构想”，希望能够消除这个鸿沟。

为了达成集体行动的目的，人们和各种组织共同结成了区域性的社团，借助这个社团来对处在他们保护之下的空间和场所进行管理，使这些地方具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征。他们遵循的管理原则是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信念，以及现实的需求、需要和渴望实现的目的。人们甚至制定了一些制度，以保证这些社团拥有相对的自治权，保证社团在其掌控的地域内至少在某些活动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些社团是国家性质或类似于国家性质的实体，实体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社区、城市或城市区，可以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如法兰西和波旁），也可以是联邦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也可以是松散的或更紧密一些的国家联盟，前者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后者如欧盟。世界政治版图表现为由不同区域单元构成的一个等级制结构，这些区域单元不仅面积差别很大（从城市里的社区到世界性大国集团），而且互相之间常会出现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活动与冲突。不同区域单元之间的边界后来成了资本流动的障碍。各个国家常常是在便利了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的同时，又阻碍着这种流动。

不同区域性社团的成员之间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关系密切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联结成员的纽带即对当地、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忠诚度，可能很强（如强烈的民主主义），也可能很弱。这些纽带的强度反映了成员在宗教、种族、语言或历史和传统方面存在的共性，使得某个国家或区域性政府具有独特的共同利益。这些区域性社团具有的类似于实体的性质往往会导致它们之间发生竞争。这些竞争在增强了不同社团的排他性、更强调差异化的同时，也强化了其成员对社团的忠诚度和彼此之间的共性。

以上谈到的这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什么关系呢？我在这里描述的人们基于某个地域所建立的联盟或社团先于资本主义出现，正如我在最开始就

已经指出的，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征。各种机构总是要把人们组织到某个区域或场所中，并在那里建立权力关系。举例来说，罗马天主教教会把自己的管辖范围划分为教区、主教教区、主教辖区 3 层等级结构，而教皇则生活在梵蒂冈。罗马帝国、中国在秦朝时期、奥图曼帝国都曾经采用类似的管理方式。诸如此类的区划组织形成了一系列初始条件，资本主义要想存活下去并实现繁荣，就要或者遵从这些条件或者改变这些条件。那么，有没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与行政结构独特的形成过程相联系的独特的区划方式呢？

■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区域组织方式

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独特的区划组织方式，反而是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通常是把各种活动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往往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资本主义活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其结果是在地理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结构一致”趋势。在某个特定区域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资本家有时候会聚在一起表达其共同的利益诉求，企业协会或商会应运而生，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强大的企业集团（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甚至是当地某个强势的“老板”（包括贩毒集团的大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促使当地利益集团追求某个共同的目标，其结果是区域专业化的出现。

提到底特律，人们就会想起汽车，提起硅谷则想起电脑设备，西雅图和班加罗尔则代表了软件行业的发展，巴伐利亚代表着汽车技术，“第三意大利”代表了小型工程产品和设计风尚，中国台北则以电脑芯片和家用科技闻名。

在每一个地区内部，发展的动力都各不相同。全社会共同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资料的获取、支持性研发活动的开展，以及便利的交通和通信设施、高效且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如自来水供应设备和污水处理设备，最后，还有关注社会需求的民主政府，如对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所有这些要素以一种互相支持的方式，被集中在了同一个地理区域内。如果它们不能和谐相处，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問題。而那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对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活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瑞典经济学家甘纳·马尔德尔戏称富有和成功的地区变得越来越繁荣，而贫困地区则陷入停滞或衰退的现象为“循环与累积因果”。

某个地区在劳动过程和生产系统方面的定位简单来说是由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考量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自然优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技术和组织形式、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系统、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感知（当地的文化取向通常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等之间的共同演化活动。几大活动领域之间特定的关系模式就在该地区独特的制度和行政安排的形成过程中定形了。国家是作为这种安排的地理载体，或者说这种安排的捍卫者的角色出现的。但是国家在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定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活动跨越国界和州界扩张到了很多地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给当地政府部门带来了许多行政性的和技术性的难题。过去50年间，伦敦的区划结构屡屡做出调整，有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有时则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是却从来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面对的问题。

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复

杂、艰难的过程。制度和行政安排的设计并不是由它和其他几个活动领域的关系所预先决定的。相反，不管是相对于其他活动领域还是相对于资本积累和循环来说，它都表现出相对的自主权。但是国家是从社会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并且会随着管理手段的变化而发展。举例来说，因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的再现，所以要弄清楚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人们过去认为国家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又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当人们的看法发生改变时，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转变其职能的压力。

关于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这个问题发起了激进的思想攻击。这场运动给日常生活（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及资本积累带来了很大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成功的（在更多情况下它也很失败）。1986年，玛格丽特·撒切尔解散了大伦敦议会，因为他们反对她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结果导致伦敦没有足以和当时席卷整个英国东南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的大繁荣、房地产价值上涨相适应的足够合作的行政当局。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最后，布莱尔政府不得不恢复区政府的一些权利。

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成功通常是由以下标准来衡量的：它吸引了多少资本的流入，创造了多少可以为资本进一步积累提供便利的条件，是否提高了其居民的生活水平。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它们都希望可以共同演化的七大活动领域集中在自己的领土之内，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实现的资本积累越多，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越富有。因此，对共同演化的七大活动领域的管理成为了国家或地区治理的目标。

用来指导管理实践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通常取决于所依附的正式规

则，比如，1945年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以及各国政府对资本和货币的跨境流动进行严格监管的基础上的。当我的学生听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从英国出境去其他国家旅行时，每年可以携带的资金最多只有40英镑，而且我所带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记录在我的护照上，以确保我没有违反规定时，他们都感到非常震惊。通过诸如此类的监管规定设定的障碍，这一时期绝大多数资本主义活动（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出口导向型企业及金融机构除外）都被严格限定在一国的国境之内。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资本管制也逐渐消失了。大国最后一次认真尝试进行资本管制，发生在1982年社会主义者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之后。他将法国银行国有化，并且试图通过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出，来组织资本外逃。然而，当法国人发现他们在国外基本上无法自由使用自己的信用卡时，他们几乎发起了一场革命，对资本的管制措施很快就被迫放弃了。不过，1997—1998年，马来西亚确实通过选择一种与传统智慧相违背的方式——资本管制，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金融稳定。

资本主义需要主权区划实体保持支撑资本主义运转的制度和行政安排（如财产权和市场法则）的一致性，甚至如果有必要，它会采取强制手段做到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也需要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存在，让他们参与到企业各种投机性和创新活动中，这些活动有助于资本主义保持活力和维持资本不断积累。这就使得政治组织内部出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主权国家和不考虑空间障碍、拥有自主追求利润（或者其他目标，如《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生存、自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讲的独立的个人不仅指资本家，也可以是拥有不同喜好的任何公民。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不稳定的、因情况而异的，并且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政治组织问题、公共生活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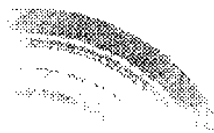
该如何构建的问题、国家治理与民主问题、政治当局的问题等才能通过独特的方式得以解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有自己的制度、法律和行政管理框架。然而，国家之间对可流动资本、财富积累和权力的争夺可能更有利于某些机构或制度安排，而不是对所有国家产生同样的影响。一些赋予人民有限的民主权利，但是奉行极其宽松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原则，同时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韩国，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的一党制的中国表明，强劲的资本积累与个人享有的民主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

政治体系及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或他们所居住的地区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显然不仅仅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副产品。人们的意愿总是扮演着很特殊的角色，就像人们对世界的感知会影响政治历史和传统一样，例如，美国特有的反威权主义及由此衍生出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使得它得以和德国、法国这样的国家区别开来，德国人和法国人对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更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印度的民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显然存在天壤之别，而这二者从政治角度看，和津巴布韦、芬兰又都存在差别。再比如，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美国人信奉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又强烈反对国家主义，很显然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但是他们又激烈反对由国家来提供医疗服务这个设想。因此，保险公司和民主党从来都不明确反对全民医保的主张。相反，他们谴责如果由国家承担医疗保健服务，可能导致国家权力过大。到目前为止，他们成功地利用这个策略遏制了全民医保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虽然到目前为止，究竟是谁反对全民医保计划还是个谜，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做法会伤害到无视一切但获得了高额回报的私人保险公司、华尔街的宠儿们的利益，或许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以，很显然，这是“华尔街党”希望看到的结果。

资本主义在各地的发展扩张过程中形成的国家系统采用的是等级制的形式。区域和地方政府拥有征税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权力，它们隶属于主权国家。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这样的机构及主要大国集团（如之前的八国集团、现在的20国集团）之间的合作在引导资本流动、保护资本积累过程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更高形式的国家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甚至更松散的地区性联盟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出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出于经济目的，在主权国家之外建立区域共同体的趋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对资本（以货币或商品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流动进行监管要求制度化的管理，以防止资本流动过程出现差错。

不同的行政管理区划所具有的权力存在很大差别，其可以采用的管理手段与治理形式也是如此。资本积累与行政区划所管辖范围的大小、所处的等级之间的关系一直以不够稳定而闻名，但还是有一些可以识别的模式。一些地方政府和区域政府可能会被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收买——通过直接的行贿，或者更隐蔽一点，通过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外，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可能还会和当地政府一些部门密切合作，共同从事某些活动，如房地产开发和经济发展项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的特征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有控制的去中央化被证明是实施与巩固中央统治的最好方法之一。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中国。不仅省政府和直辖市政府被授予了某些权力，某些经济特区，甚至那些有招商引资计划的乡村和城镇也获得了一定权力，结果是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升的同时，权力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北京。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权力下放过程。例如，自1975年以来，美国也越来越重视单个州或中心大城市的权力、个人权利和州政府的进取精神；



法国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也引入了去中央化改革；英国政府则仿效西班牙政府对加泰隆尼亚的做法，选择把部分权力让渡给苏格兰议会，等等。

■ 战争造成的创造性毁灭

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自己版图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战争构成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创造性毁灭的片段。在战争中，基础设施遭到了毁坏、许多人战死沙场、环境被破坏，制度被重建、社会关系中断，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新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上开始新的生活吸收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正如现在的黎巴嫩、1945 年后的日本和欧洲在重建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当然，战争并不是资本家为了吸收过剩资本和过剩劳动力而精心设计的，但是他们确实会尽最大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国家的出现及它们对领土的争夺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争则是冲突的终极形式。资本为现代形式的战争创造了一些必要条件，但仍然缺乏一些充分条件，这要到国家机器和希望利用国家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利益集团中去寻找，当然包括依靠制造冲突或至少引起人们对冲突的担忧才能生存下去的军工联合企业。

然而，针对领土争夺的法律条款在不同主体间的法律效应不同，包括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如欧洲、北美和东亚）、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区域性实体之间（如美国的各州、欧洲的加泰隆尼亚和苏格兰这样的地区性政府），以及不同大都市区、城市和地方城镇和社区之间。让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更有竞争力成为制定公共政策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好像让社区更宜居、对这个社区的目标住户更有吸引力往往是当地市政部

门追求的主要目标一样。因为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竞争，所以打破阶级界限、实现社会团结对于吸引资本流入变得非常重要。当面临既能带来投资机会又能带来就业机会的经济发展项目时，当地的商会和贸易联盟更可能互相合作而不是彼此竞争。

找到某地的卖点并为其贴上“商标”、为某地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图景，这些都是资本家在竞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据历史、文化及所谓的自然优势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差异性，也已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内生的一部分。引入地标性建筑，如类似于弗兰克·盖里在波尔巴鄂建造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这样的建筑，有助于提升城市对到处寻找机会的资本的吸引力。如果两个地区或国家之间不存在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异，那么在打造它们的过程中，就要通过不同的投资策略，对地理垄断条件的追求来形成独特的吸引力，而这种地惠的垄断条件要通过地理位置、环境和文化的独特性来获得。认为资本主义鼓励不同地区之间实现趋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多样性和差异化才实现了繁荣，虽然这种多样化和差异化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资本主义无法容忍古巴、智利这样的政体存在，也无法容忍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差点走上共产主义之路。

但是，某个地区的制度和行政安排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取决于人民自己的意愿的，这也就是说，它们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个观点给区域组织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相互关联的方式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很容易爆发反对过度商业化和粗暴的发展方式、反对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运动。反对的声音既可能来自左派（如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也可能来自右派（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谁掌控着暴力机器（传统意义上是指国家，但是现在也包括恐怖组织和黑手党这样的组织，或者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这样的更高形式的组织），谁就在

这些革命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监管手段和军事技术越来越复杂、精尖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 基于政治和经济两种逻辑的国家间力量对抗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各种歧视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谈到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更是不可能回避这些现象。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现象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呢？在一个反种族歧视、反军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环境中，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发展呢？如果就像杰奥瓦尼·阿锐基在 1994 年出版的《漫长的 20 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提议的那样，我们如果替换掉传统帝国主义理论中的霸权主义概念，并且坚持认为它和殖民统治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关系，结果会怎么样呢？

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经济军事国家，这是经济史学家在谈到 18 世纪的特征时很喜欢用到的一个词。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扩张，涌现出各种形式的国家-金融节和“国家-企业”节，它们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很残酷，甚至会引发战争，这在当时的国家体系中非常普遍。国家和区域性组织总是处在不断演变发展过程中，这一过程虽然有其自主性，但是依然内嵌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七大活动领域的共同演化过程。

于是，两种关于权力的逻辑之间出现了显著的不同，一种权力逻辑出于地区使命感和政治利益、专注于城市塑造和表达公共民众呼声；另一种权力逻辑来自资本权力的积累，私人和公司掌控的资本通过产生利润的过程寻求不断的扩大，因而关系到了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权力逻辑。

在这里我所指的第一种逻辑，即区域逻辑，是指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所采用的一切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战略。实施这些战略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和管理本国人们的活动，以及在本国范围内实现财富和权力的积累。这些财富和权力既可以用于为国内人民谋取福利（或者更狭隘一点，为资本和本国资产阶级创造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也可以用来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或展示自己的实力。例如，殖民地或受实力较强国家影响的实力较弱的国家要受宗主国的支配。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市场、劳动力和生产能力，这就保证了当本国的条件不利于资本积累时，过剩资本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这种敞开国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一国对另一国的武力征服或殖民统治，如英国自18世纪以来对印度的所做所为。不过，前述种种也可以通过互相协商、签署贸易协定或市场一体化等比较和平的方式做到，类似于英国在1812年战争之后，和它的前殖民地美国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

与此不同，第二种逻辑，即资本主义逻辑关注货币是如何在一国内及不同国家之间流动，以实现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这两种逻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之前曾提到的，存在一个融合点，在这里这两种逻辑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节，现在的典型代表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但是，所涉及各方的动机存在天壤之别，包括商人和政客甚至有时候是互相矛盾的，虽然他们是捆绑纠缠在一起的。持有货币的资本家希望把这些钱投入到可以获利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因此，资本家须要证资本进入更开放空间，即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而国界无疑可能会阻碍资本自由进入；政客及国家机构则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国家在国内、国外的地位、权力和拥有的财富，在当代社会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或者在国内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或者想方设法从其他地方掠夺财富。毕竟，货币是社会权力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和个人一样，国家也会追逐更多货币，并且受货币支配。在历史上，沿着这一思路的战略最显著的一个变体就是“重商主

义”。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为本国积累更多的货币（即金和银）。而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对他称其为“新重商主义”的一些当代政治主张做了描述。

一些人对待1997—1998年席卷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态度是“求助于重商主义者”。缺少现金（流动性危机）使得某地的经济很容易受到外部金融力量的冲击，当一些具有赢利前景的企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不景气时，国外资本很可能会以“跳楼价”买下它们。当经济状况好转时，国外资本就会转手以很高的价格把这些企业卖掉，从中赚取一笔巨大的价差。当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找到各自的办法（向繁荣的美国消费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走出危机后，它们无不有意识地积攒了足够的外汇储备以防止自己再次面临诸如此类的“被打劫”的处境。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要更大一些，从而使得它在面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时有着更强的灵活性。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剩余资本一窝蜂地涌向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但是这些资本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它们必须做点什么。它们中的大部分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以偿还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其结果就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财富从东向西的转移再次重演。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及这个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相对美国而言，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呢？毫无疑问，正如我在第1章所提到的，霸权似乎正在发生转移。但是，如果把这一现象称为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则是错误的。

我之前已经提到，控制一定空间也是社会权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这可能是通过一个团体对另一个团体和阶级的积极控制来实现，也可能是通过

帝国主义行为来实现，就好像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那样。这种控制力既具有扩张性，又具有强制性，其结果则是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引导资本流向有利于帝国主义者或霸权国家利益的领域，而这可能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的。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所积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可以用来便利、监督，甚至压制通过资本积累积攒在私人手中的货币权力。1917年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说明了国家机构中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在世界各地扩大势力范围过程中的重要性，当然也有局限性。但是，正如我之前曾经提到的，如果仅仅是征服了某个国家，尚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当处于同一个演化系统中的其他几个活动领域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时，才能称得上是从资本主义统治中彻底解放了出来。但是像一些人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转型政治的主战场须要转移到文明社会和日常生活方面。

尽管当代很多反资本主义思潮并不认同建立一个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政权，一些地区组织（如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革命组织）却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社会秩序的设计和规划。所以，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是处理社会事务的有效组织形式，而在于向其他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权力组织方式才是恰当的。就像从17世纪开始，前资本主义国家形式逐渐转化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一样，要想从资本积累过程中转化出社会生活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可以预期一定会出现国家权力的激烈转移和重建。另外，还要创建新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机构。尽管这听上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30年间，在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这些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不难发现大范围的转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资本主义正上演的共同演化过程不可获缺的。

国家的形式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基

本上是按照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行事，为它们的利益服务。1870—1925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边界是由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划定的。1945年之后兴起的去殖民化浪潮认可了绝大多数边界的效力，产生了很多名义上独立、名义上拥有自治权的主权国家。我之所以说“名义上”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宗主国通过帝国主义行径和殖民地建立的一些隐形联系被保留了下来。例如，新殖民主义在非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整个非洲大陆相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自1945年的去殖民化浪潮之后，各国的力量对比和分布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世界的版图开始发生变化了。联合国最初只有51个成员国，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92个。1989年之后，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出现了一系列的“再区域化”事件。除了国家层面的变化外，其他各级行政管理结构同样也发生了变化。按区域分配的规则似乎很难有变化，但是其发展史却表明它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此而带来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不断演化的各国关系的体系中，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间或大国集团间的政治冲突。这绝不仅仅是用赢家和输家来考量国家之间的竞争及其结果的问题，这还牵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以及掌控着国家机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何看待本国在国家间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等。感觉很安全、感觉受到威胁、害怕被其他国家吞并、通过激发外部威胁或树立一个假想的敌人来平息国内的斗争，等等，不同的感受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此时，主观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危险的边缘政治

在当前这个时代，简单原始的地缘政治观念的黑暗面很容易就能大行

其道，并且可能带来致命的影响。例如，国家一度被认为是一个须要维持自己生存的特殊有机体，而不是建立在国际合作框架内的一种开放式政治组织，那么，正如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指出的，国家有合法权利去寻求对某个地区的控制权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卡尔负责的地缘政治协会大大助长了纳粹的扩张行为。按照卡尔的理论，国家是一个个存在于达尔文式世界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有机体。除了为生存而斗争，没有其他选择。目前，诸如此类的想法有卷土重来的趋势，这一点很令人担忧。

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的干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呢（奥巴马政府之前，美国颇有点出人意料地宣布将继续在阿富汗的战争）？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都在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因为那里有丰富的石油储备。可以这样说，谁控制了油田，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的目标是，阻止这一地区形成任何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维持以美元计价的单一世界石油市场的存在。这既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同时也赋予美国在遇到麻烦时发行世界货币的权利。美国已经参与了两次海湾战争，同时把触角伸到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此外，对伊朗来说，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威胁，它拒绝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且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它和美国支持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曾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美国的干涉范围从核心产油国扩张到阿富汗，甚至进一步达到中亚腹地，很显然带有对抗俄罗斯的崛起的意味。

诸如此类的地缘政治观念不管它们错得有多离谱，多么没有必要，一旦它们在主要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就很可能落实到现

实中。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观点和企图在 1914 年之后发生了冲突，其结果就是它们都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甚至战争手段，重新确立世界版图。令人奇怪的是，地理学，如我们所知道的，常常被认为与社会科学是没什么关系的，却也借助地缘政治学，重新成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一门社会科学。这一点应该是在地理决定论的掩饰下形成的，而且这可能会而且确实已经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在危机期间，比如现在，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很多。毫无疑问，1929 年的大萧条期间也有很多人信奉同样的主张，回想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

毫无疑问，国家权力的扩张要求在其境内积聚起尽可能多的货币和财富，而不受资本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更深入的流动的影响，这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流动标志着资本积累已经扩大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不可避免地就会鼓励各国对资本主义历史上挥之不去的萧条、衰退、经济危机采取防卫措施。人们渴望避开一切形式的经济灾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可能导致人们采用绝望的，甚至咄咄逼人的政策，不择手段地（包括军事手段）压制其他国家的崛起，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国力，来维持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不平衡发展。任由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危机从美国扩散到了世界各地，这是不是美国政府有意而为之呢？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知道真正的答案。

最后的结果是地区发展差异不断加深、扩大，世界版图变得更加不稳定。很多结果都取决于政府实施怎样的政策。提高关税壁垒、保护新产业、用本国生产的产品代替进口产品、国家对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支持，诸如此类的做法表明在主张自由贸易的框架内，仍然存在很多保护主义的行为。贸易壁垒几乎随处可见，它的存在影响了资本家通常更喜欢的开放市场战略的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会招致报复，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战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普遍，而其结果则充满偶然性

和不确定性。

当然，在历史上，欧洲列强和它们建立的独特的殖民体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们采用的做法是在全球范围内根据行政、制度、贸易及发展等主题，围绕着世界性大都市进行布局，如马德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柏林、莫斯科、罗马等。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限定了资本的流动方向，使得世界上的大量资本集中到了那些生活在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手中，这种状况因为去殖民化浪潮而逐渐得以扭转。去殖民化最早发生在美洲和大洋洲，但是自1945年起（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为世界所有殖民国家接受，它们为了民族独立往往经历了多年痛苦的斗争，这为其转变为新的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很显然，去殖民化浪潮没有终止某些国家的霸权和统治地位，也没能阻止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继续蔓延。

从最开始（以及经历一些失败之后），美国追求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而不是传统的建立在领土占领基础上的欧洲式（以及后来的日本式）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美国并没有彻底摒弃领土控制的目标，不过，它希望通过控制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非正式地，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正式地（如韩国和中国台湾）接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主地位的当地政府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有时候会招致对美国的武力抵抗；此外，这还导致形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新殖民主义关系网，其中实力较弱的，通常也是较小的国家，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但是，过去30年间金融活动的空前繁荣，以及生产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有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说法不像为霸权而斗争这个说法那么常见。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其实就是为了获得霸权而斗争——尤其是金融霸权，虽然军事实力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为了直接控制哪个地区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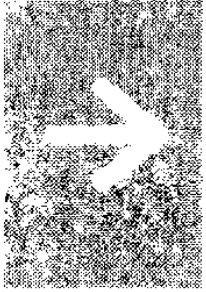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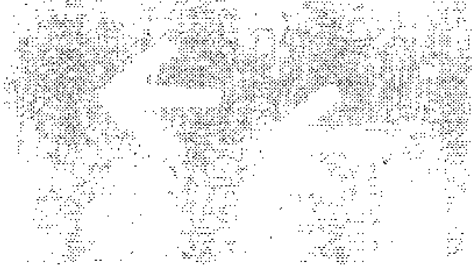
■ 地理决定论

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资本主义的运转来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相反，它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我们无法掌控地区发展差异将朝着怎样的方向的演变，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某个地区的脆弱性袒露在公众面前，反对力量也得以团结起来，这使得它成为产生新的资本家的肥沃土壤。如果中国 1979 年之后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那么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将受到很大限制，也一定将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资本积累的障碍。随着中国在东亚及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它在决定经过本次危机的洗礼之后资本主义将呈现什么面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霸权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转移，当北美和欧洲陷入停滞时，中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地区发展差异从地缘经济（地缘经济指通过受企业利益主导，但得到国家力量支持的贸易活动）和地缘政治方面（地缘政治指借助外交和战争手段）将如何体现出来，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重要影响。

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的是地理决定论的复杂性。一方面，资本家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地理壁垒，不管是空间还是环境他们永远在试图征服和逾越这些壁垒。另一方面，资本家积极开拓新的空间，以包含了大量固定和不可移动资本（他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资本，否则其价值将蒙受损失）的人造环境的形式，制造新的地理壁垒。另外，他们还把劳动力按照所在地区进行划分，这一方面使得资本家从周围获得了很多支持性服务，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范围。一些区域性行政安排及国家机构也是按照限制流动性的原则来确定其边界或国界的。除此之外，确定边界或国界还必须考虑到人们打造自己独特的生活空间的方式，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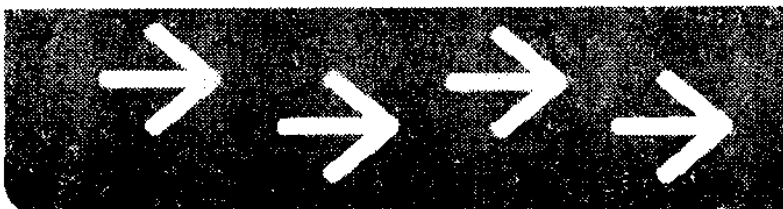
人们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看法，考虑到恰当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以及人们对于哪些因素构成了令人满意的、物质丰裕的、有意义的日常生活的认知。

把资本主义领土的扩张纳入到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中的原因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晰了，那就是这个过程不仅存在深刻的矛盾，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随机性、迷惑性。对于这个过程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维持差异性，而不是实现各地均衡发展。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对困难出现在哪里，它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进行一点解读。我们所面对的经济气象是不断变化的、不可预测的，正如其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长期的经济变迁虽然在纷繁的表象的掩盖下更难识别，但是这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有一点现在也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包含着新的地理空间的开拓，而且毁掉原有空间创造出新的空间是解决剩余资本吸收问题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尽管人们总结出了当前这场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间的诸多共同之处，但是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共同点被忽视了，那就是国际协调机制失灵，各国在地缘政治中成为彼此的对手，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创造性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



第 8 章 应对措施

面对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未来有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将发展向哪里？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好？



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

在危机期间，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并存，然而在这个人们生活艰难、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的时刻，两者的结合看似不可能。2009年仲夏，在美国，资本设备的1/3闲置着，然而，大约17%的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被迫打零工，要么就是泄气的工人。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不正常的呢？

对于资本积累，要想恢复3%的复合增长率，将须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保证赢利、吸收大量剩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过去，人们所采用的不合理的方法是通过战争破坏之前的时代的业绩、使资产贬值、降低生产能力、放弃一些东西或其他形式的“创造性毁灭”。不只是在全世界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领域能感受到这些影响，人们的生活也会被打乱，甚至身体上的伤害，人们的职业生涯面临危机，一生的成就也岌岌可危，内心深处的信仰发生动摇，心灵受到伤害，对人类尊严的珍视也丢到了一边。创造性毁灭降临到那些美丽的、邪恶的和丑陋的东西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危机就是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正确的合理化。

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从目前的创伤中幸免于难吗？首先，这是肯定的。但是以什么为代价呢？这个问题掩盖了另一个问题。资产阶级面对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及地缘政治和环境方面的困难，能够重振其雄风吗？再次，答案是“是的，它能”。然而，这将要求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成果无私地献给拥有权力的人，要求人们放弃很多权利和来之不易的资产价值，包括从住房到退休金在内的每一样东西，遭受环境恶化带来的大量的灾难，更不用说生活水平的连续下降，对于已经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求存的人们来

说，生活水平的降低就意味着饥荒。只要有一点政治风波，就需要警方武力和国家军事力量来镇压接连而来的骚乱，但是资产阶级力量在地理上也会经历痛苦的转移。以史为鉴，如果资产阶级不改变其性质，不使积累以一个不同的运动轨迹继续前进，转向新的空间（如东亚），那么它将不能继续维持它的力量。

上述种种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加上全球经济的地理分布如此多变，于是危机时期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提高了。一些地方的新生资本家为了抓住机会向旧阶级和地方霸权发起挑战，因此而导致各类区域性的不确定事件频繁发生，或者，向不稳定的再产生系统发起挑战从而削弱阶级力量的激进运动也引发各类局部地区的不确定事件。我们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能够存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注定他们一定能这样做，也不代表已经赋予了他们未来的角色。危机时期充满矛盾和悖论，在这种情况下，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供选方案，包括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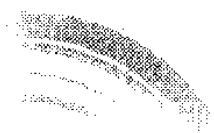
那么在这个时刻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我们要重新回到 3% 的增长率，就意味着要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全球性投资机会，从 2010 年到 2030 年，使 1.6 万亿美元增长到接近 3 万亿美元。这与 1950 年和 1973 年的必要的新投资形成对比，其投资分别为 0.15 万亿美元和 0.42 万亿美元（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元币值）。为剩余资本找到适当的出路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在 1980 年以后开始浮现，与中国的对外开放、苏联的解体时间相差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困难通过虚拟市场的建立得到了解决，在虚拟市场中，投资活动能够在任意一个监管机构的介入下终止。现在，这些投资将会转向哪里呢？

撇开自然（很明显，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的不置可否的限制，市场中限制有效需求的其他潜在障碍，与技术、地理和地理政治分布相关的障碍可能是最主要的，甚至假设（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对持续的资本

积累和进一步巩固阶级力量的明显的反对势力。在全球经济中为新一轮的空间调整（适用于吸收剩余资本）留有哪些空间？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越来越快；虽然非洲没有完全连成一体，但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具有吸收全部剩余资本的能力。有对吸收过剩资本开放的新的生产领域吗？面对资本主义危机，没有有效的、长期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除了回归虚拟资本操纵）。在某种程度上，量变导致质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可能恰好处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个拐点，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否作为一种适当的社会制度的质疑，应该成为当代讨论的前沿话题。

即使关于人性完美的传统的歌颂听起来越来越空洞，也似乎没有人热衷于这样的讨论，过去，人们借助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私人财产和个人责任、低税收和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国家参与这些方式来体现所宣扬的人性化。合法化危机在慢慢露出手脚，但是它通常以和股票市场危机不同的节奏和速度展现出来。例如，对于1929年的股市崩盘来说，因股市崩盘而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包括进步的社会运动和法西斯的社会运动）的发起要花3~4年的时间，这些运动在1932年以后才崛起。通过多大的政治力量来寻求摆脱这次危机的方法，反映了统治阶级对于渐渐发起的非法运动的担忧。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存在着裂缝，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破碎的，也并不代表因为某些东西很空洞，人们就能立刻辨别出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坚信自由市场思想体系的潜在假设，信心还没有丧失很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除了不满者）正在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改变，尽管有许多人承认他们不得不在这或那节省更多。在美国，初步的调查显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人们通常会由于他们没做到（有时由于坏运气）无愧于自有住房的个人责任，而自责。虽然公众对



银行家的欺诈行为及其分得的红利感到气愤，但是在北美或欧洲，人们似乎没有发起运动来对这一情况进行彻底的、深远的改变。在地球南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政治将如何发展下去是不确定的，在这些区域，经济还在继续发展，政治在围绕不同的中心运转，这些地区的问题是经济虽然在增长，但增长的比率太低了。

危机的爆发是有其系统根源的，这一观点很少在主流媒体中提出了。到目前为止，在北美和欧洲，大多数政府的行动只是商业行为的延续，这种延续被认为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在银行的求助措施中，“道德事件”将迅速触发财政困难这一观点被提到新的高度。新自由主义运动（与乌托邦理论对照）在实际中常常公开表现出对金融资产和资本主义精英的支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金融机构，国家政权有责任为持续牟取暴利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这一点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通过不太确定的两个论点，即资本家所付出的努力的高涨“浪潮”将会“颠覆所有的船”，以及复合增长率所带来的好处将会“慢慢消逝”，通过诉诸这样的观点，可以证实前述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活动。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我们都经历过一个惊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政治是脱钩的，并且已被商品化。只有现在，随着国家不断帮助金融界人士脱困，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和资本比以前交织得更紧了，包括制度和个人方面。负责管理的是统治阶级，而不是作为代理的政治阶级。

那么资产阶级该如何快速地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呢？尽管股票市值的反弹是一个好的信号，从上海、东京到法兰克福、伦敦、纽约股票都有所上涨，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失业率却在上升。我们注意到这其中的阶级性，我们会为资本家庆祝股票市值的反弹，是因为在股票反弹之后经常会跟随着“实际经济”的复苏出现，而在“实际经济”的复苏可以为工人创造工作，这之后便是使他们获得收入。美国 2002 年之后的最后一次股票

市值反弹事实证明是一次“失业型复苏”，这件事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对英国萨克逊人来说，他们要学会遗忘，轻易地忘记并原谅资产阶级的过错，以及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周期性的灾害，资本主义媒体很乐意宣传他们这种健忘的特性。

与此同时，由少数人掌控的原始货币权力也揭示了民主政治的真实面貌。

在美国，用于医药、健康保险和医院建设的开支，在2009年的头3个月超过了1.33亿美元，以确保他们在卫生保健改革方面可以随心所欲。麦克斯·鲍克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医疗卫生法案）的负责人，他因为一项交易而获得了150万美元的收入，这项交易为保险公司带来了一大批新客户，但这份保单并没有任何针对残酷剥削和投机活动争取暴利提供保护的条款（这下华尔街的人们高兴了）。

另一轮的选举开始了，显然它已被金钱带来的权力严重侵蚀了。在美国，华盛顿K街和华尔街的政党们会定期展开新一轮的选举，他们会说服工人阶级努力摆脱当前统治者所带来的混乱局面。我们记得，以前只要身陷绝境，每次美国工人都会卷起袖子，勒紧腰带，把资本主义从某些带有自我毁灭性质的机制中拯救出来，而对于这些机制，资本家否认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毕竟，个人责任只是针对工人阶级而不是资本家而言的。

然而，资产阶级必须说服人们，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不只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他们一定会提到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了250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乏类似于现在这样的创造性毁灭阶段），并且提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过程将走向终结。毕竟，资本主义社会永无止境的革新为各种奇妙的新技术奠定了基础，这些新技术有利于整个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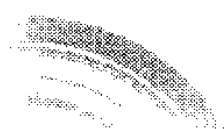
社会的发展，同时人类还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造新的产品线，寻找新的市场，而这对于经济的持续扩张是极为必要的。绿色科技、排污限制将会帮助我们拯救地球。在接下来的创新中，更可能的领域是在生物医学和基因工程方面，这里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新技术通过化学和生物手段创造生命，而国家（如果新兴的美国模式可以继续下去）则保证医疗、医药和保健产业的巨额利润。像盖茨和索罗斯这样最富有的人，已经在利用他们的捐款发展这个领域。在未来，知识产权和专利将会给拥有它们的人带来收益，想象一下，当生命本身就是专利时将发生什么。

日益增长的跨国垄断（包括国家垄断和企业垄断）将使经济体制更少受到破坏性竞争的侵害。利用国家赞助的市场，有效需求的问题将会得到更好的控制（这是人们所希望的）。这种市场是通过印钞票给予资金支持，不同于通常的军事防御、治安和监视。即使政府的支持最终流向了私营企业的口袋，它对个人需求的帮助也被描绘成是多数民众的民事和民主权利的扩散，对个人需求的帮助包括保健、住房、教育等领域。

如果某个地区的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么为什么不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即它们再次出现时你能够以某种方式避开，从而将危机转移（在地理空间上转移危机）？或者也可以将危机的发展趋势进行灵活地转移，从这个发展障碍转向其他的障碍。面临有效需求的问题，对吗？好吧，那我就投入大量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投入大量钱导致的后果就是5年之后可能会爆发通货膨胀（很好，5年刚刚超出了竞选的周期）。当然，对通货膨胀危机的回应将会是收回劳动人民在财政赤字年代获得的所有微薄收益，但是银行家和金融家依然过富裕的生活。这就像资本家集体进行越野障碍赛，以完美的姿势跳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并且形成这样一种错觉，那就是我们总是或即将处于无尽的资本积累这片乐土上。如果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几乎非常肯定的是，我们会在5年内陷入另一种困境。事实上，令人

不安的迹象表明，这场危机没有按常规模式发展。2009 年 11 月，迪拜世界集团突然宣布它没有能力按期偿付贷款，此后一直到富产石油的阿布扎比伸出援助之手，全球股市都一直处于极端低迷的状态。在那之后不久，人们对于希腊的债务比率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一些分析师开始担心爱尔兰、西班牙，甚至英国会成为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欧盟会集合力量去支持它的成员国吗？它在经济压力下会瓦解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基于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及新的生产能力的产生，以 8% 的速度发展，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处置旧的生产力。但是，正如在这类繁荣中通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个由中央政府授权、在银行的大手笔投机性贷款刺激下导致的过剩生产能力通常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但是中国人面对如此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剩余劳动力储备还能做什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市场的综合活力激发了当地的有效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口市场不足的损失。同样，印度的发展也不容忽视。除了在服务领域（与其他部门相比，服务领域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其经济增长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而弱化了其对出口的依赖，但是增长利益的分配很不合理。在 2008 年的危机中，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印度亿万富翁的人数从 27 个增长到 52 个。显然，不管是危机还是复苏，其地区发展都是极不平衡的。

我们如果在现在越快度过这场危机，损失的过剩资本越少，那么给恢复长期的、活跃的经济增长留下的余地会越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诉我们，就在写这本书时（2009 年中期），全球资产价值的损失至少在 55 万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全球一年的商品和服务的产值，我们已经回到了 1989 年的产出水平。在摆脱这场危机之前，我们可能看到资产价值会损失 400 万亿美元或更多。事实上，在最近的预测中，有人认为，单单是美国，就有总值达 200 万亿美元的资产处于危险之中。所有这些资产成为坏资产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有一种观点是很值得思考的，那就是这些资产的大部



分会成为坏资产。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美国政府管理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拥有超过 5 万亿美元的住房贷款，而这些住房贷款中的很大部分都已经很难保全（仅在 2008 年的记录中就有 150 万亿美元的损失）。那么有什么备选方案吗？

■ 谁将替代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对资本主义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替代品进行定义，并且通过发动人们共同寻找更好的生活的激情让其合理地到来。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对这些替代品（历史上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进行了尝试。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作为一盏希望的明灯指明了方向。但最近，它们失去了光辉，这不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为兑现承诺而进行的历史尝试的失败及共产主义政权有通过镇压掩盖错误的倾向，而且也由于它建立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这些假设关注人性、潜在的人类个性的完美性和人为设置的机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之处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社会主义旨在以降低暴行和重新分配共同利益的方式进行民主的管理，同时对资本主义因素进行规范和控制。社会主义通过累进税制来平均贫富差异，然而基本需求，如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则由国家提供，不受市场干预。1945 年以后，在欧洲及另外一些地方，社会主义力量取得的成就深深融入社会中，使得它们已经不惧怕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在美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些也是由政府资助的社会项目，右翼势力几乎进入不了这些领域。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不可能碰触到国民医疗保健这一领域，除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这一块似乎是社会秩序的根基，

不可动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量过剩一般通过积极地干预市场或通过所谓的经济制高点（能源、交通、钢铁、汽车）的国有化来进行管理。资本流动的地理环境是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进行管理的，甚至通过贸易协定和国际贸易使之平稳地兴旺起来。劳动力在工作场所的权利和在市场上的权利，都得到了加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所具备的这些因素已经衰退了，这种情况几乎到处可见。实际上，自由主义革命成功地将产量过剩私有化了，它将资本主义生产者从限制（包括地理上的限制）当中解放出来，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破坏了国家职能当中的再分配特征，这导致了社会不平均的快速增长。

另外，共产主义试图取代资本主义，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商品和服务的新的生产和分配模式。现存的共产主义历史上，社会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意味着国家控制及系统的国家计划。当代复苏共产主义的尝试者通常发誓要放弃国家控制，并且寄希望于其他社会集体组织形式来取代市场力量，资本积累作为安排生产和分配的基础。水平型管理结构而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自动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协作组织被视为新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核心。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这样的系统是可行的。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模式的小规模尝试，在这些尝试中，经济和政治模式仍处于建设中。在这当中，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某些传统有会合，这个会合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那是在欧洲，他们之间有广泛的协作。这种协作发生在他们分裂成敌对阵营（1871 年巴黎公社之后）之前，同时也在马克思和当时的激进派领导之一迈克尔·巴库宁的无政府主义决裂之前。

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仅仅处在一个会持续很久的动荡的开端，在这个动荡中，宏大而深远的选择问题将会渐渐

地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涌现出来。不确定性和痛苦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目前做事方式的合理性就会质疑得越多，同时，对建立与众不同的事物的需求也就会越高。然而，修正金融体制的激进的、临时性的改革似乎更有必要。

比如，如果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压抑的“凯恩斯时刻”再度出现（以拯救上层社会为目标），为什么不将它引导向凯恩斯最初视为目标点的工人阶级呢？讽刺的是，采取的政治转变越多，经济达到暂时稳定这种表象的可能性越大。然而令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是，在这种导向方面的任何举措都将激起经受掠夺、不满、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对权利的要求，也就是说，给他们一寸，他们就会要求再给一丈，即所谓的“得寸进尺”。在任何情况下，拯救资本主义本身都要求资本家放弃他们的一些个人财产和权力，在历史上，他们一直强烈反对这样做。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的不均衡发展已经引起各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遍及拉丁美洲的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相比，在大部分东亚国家，其经济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人们的不满情绪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不同，在拉丁美洲，波利维亚的民主权利革命运动以一种与资产阶级利益非常奇怪的关系而存在，欧盟各成员国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政策和策略越来越显示出其差异性，即便是在构建一个统一的欧盟的第二次努力正在进行之时。虽然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都不是什么积极的方式，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边缘地区我们可以见到这两种形式。人们已经开辟了一些新的空间，在那里，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生产能力和对世界的认知方面，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得以蓬勃发展，比如，塔利班和共产党控制的尼泊尔，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尽管这些地区的运动在目标、战略和战术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波利维亚的本土运动及印度乡村地区的毛派运动，这些都属于上述情况。

核心问题是，总体上没有坚决的、足够统一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可以对

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及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力量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和挑战。既没有显著的方式可以用来攻击资本主义精英特权的堡垒，也没有方法限制他们的金钱力量和军事实力。但是，我们有一种隐约的感觉，那就是，不仅另一个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就像20世纪90年代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兴起所证明的那样（即在1999年，西雅图战役之后这个运动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当时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彻底被街头游行示威的群众打乱了），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另一个共产主义也是可能实现的。虽然在向新的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方面断层，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断层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政治力量能够清晰地阐明，更不用说发起一个诸如此类的运动，就放弃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该做些什么呢？”对于列宁的这个著名问题，在缺乏谁可能做、在哪里做的概念时，很难得到解答。但是在缺乏关于做什么、为什么做的远景蓝图时，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不可能出现的。这里存在双重障碍：对未来远景的展望阻止了反对运动的形成；缺乏这样的反对运动反过来又阻碍了关于远景的展望。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做什么、为什么做的远景和围绕特定地点的政治运动的形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旋涡。无论哪个已经真正做好了，它都会推动另一个。否则，潜在的反对党将永远被困于一个封闭的圆圈中，这个圆圈会挫败所有建设性变革的前景，只给我们留下不能避免的永久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日益增长的致命的后果。

充满各种可能的未来世界

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已经非常明确了，永久的复合增长是不可能的，在

过去的 30 年里，困扰世界的难题预示着在持续资本积累上是有一个限制的，除非创造出一个神话，否则持续的资本积累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制。此外，我们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些事实：世界上很多人生活在贫困水平；环境问题严峻，几乎失去控制；尽管富人积累起越来越多财富，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尊严受到冒犯；政治、体制、司法、军事和媒体都面临困境，教条的政治控制无力维持长久的稳定。

政治变革应该做到解决资本的复合增长的难题，并最终使资本主义消失，因为要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需要我们对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有深刻的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了，这个失败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在那极其复杂的历史里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然而，一个连贯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运动是绝对有必要的，这一点应该为人们所理解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关于实施生产和分配盈余的社会指令。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第 5 章提及的共同演化理论，这个运动可以成为共同演化理论的基础吗？一场政治运动可以始于任何地方，在萦绕精神概念的劳动过程中、自然关系中、社会关系中、革命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构思中、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改革体制和行政机构的尝试中（包括重构国家力量）。诀窍就是以互相增强的方式，使政治运动从一个作用范围移动到另一个作用范围。这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起于封建主义的，以及一些完全不同的事物，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诸如此类的，如何起于资本主义的。以前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原因是这些尝试没有保持不同作用范围之间的辩证运动，也由于没能接受在辩证运动中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资本主义恰恰由于保持了辩证运动、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包括由此产生的危机）而得以存留下来。

那么，想象一下，一些地区的人清醒地认识到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人们不希望的，因此，人们认识到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

可能存在的，而且必须有这样一个世界。那么，人们这种一致的认识，又是如何在多样社会形式的选择中进行探索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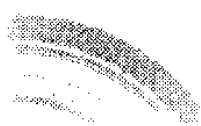
改变产生于现有事物的状态，在现有的情况下，变革必须能驾驭各种可能性。从尼泊尔到玻利维亚，到非工业城市密歇根，以及依旧蓬勃发展的孟买和上海，还有虽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彻底毁掉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它们各自面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不同地域范围进行的社会变革的各种尝试都使得开创另一种社会成为可能。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貌似当前形势的某方面控制着通向不同的政治道路的关键。但是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在没有仔细确认怎样调整与其他所有事物的关系之前，不要把所有赌注都押到某个尚未彰显出来的动能上面。

可行的未来可能性来源于不同领域之间关系的现状，同一领域和跨领域的战略性政治干预逐渐地使社会秩序转移到一个不同的发展道路上。针对当地的情况，明智的领导人和前瞻性机构一直这样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有任何空想的或乌托邦式的行为发生。

首先，必须承认发展不同于增长。比如，由于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与自然地关系的不同，发展就有可能不同，这时候不一定会带来增长和资本。认为增长是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先决条件是错误的，同样，认为环境政策（如有机食品）是富人的奢侈品也是错误的。

其次，每一个领域的变革都须要对制度安排的内部动态和科学技术进步（与其他所有领域相关的活动）有深刻的理解，在各领域工作的人们之间应该建立联盟，这意味着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比围绕社会关系或日常生活问题的群组更广泛。例如，应该克服技术、科学、行政专业知识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的传统的冲突。

再次，在全球经济中，面对来自其他领域的影响和冲击是必然的。不同地方的历史、文化、位置和政治经济条件会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在一些



地方，有些发展可以起到支持和补充作用，但有些发展可能就是有害的，甚至是敌对的。某些区域内部存在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好坏取决于竞争的内容，是经济增长指标的竞争，还是日常生活的适宜居住性？如柏林，它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但是所有常见的资本主义支持的经济成功的指标都将其描述为一个落后的地方。土地价值和房地产价格相当低，这意味着没有很大能力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不错的地方居住。如果纽约或伦敦也像柏林那样，开发商是会很悲惨的。

最后，对于一些共同目的较宽松的约定，可以制定一些普遍的指导准则。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尊重自然，社会关系上的彻底平等，基于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民主管理程序，直接生产者组织劳动生产，将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关系和生活新方式的自由探索，专注于服务他人的自我实现的心态，以及以追求共同利益（不是拥护军事力量和企业的贪欲）为目标的技术和组织创新。这些可能是大变革的要点，围绕它们，社会行动可以聚合和循环。当然，这是乌托邦。但那又怎样？我们不能不如此。

假设人们偏爱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自定义的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绝对的平均主义，这是经过几个世纪政治斗争总结出来的，对平等的追求激起了无数的政治风波和革命运动。绝对平均主义还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而且这一理念看上去还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强调平等原则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合理基石，而且也是把不同个人、社会团体联系起来的纽带。赋予奴隶者、妇女、同性恋者及残疾人应有的民主与政治权利的运动虽然早在 200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要求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大进步的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而且是对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也应该平等的一种诉求。在美国，通过政治活动消除对精英人士的敌视的方法也是出于这种平均主义观念。

尽管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本身看上去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在和其他活动领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对社会团体的定义总是有争议的，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包容在绝大多数自定义的社会团体之间实现平等这一理念，但是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就是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阶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必需的一种不平等关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当权者要么矢口否认阶级的存在，要么说“阶级”这种分类方式太复杂，很容易令人迷惑（与种族、性别这样的分类方式很简单相对），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这样一来，阶级这个问题就被淡化、否认或者忽视了，全然不顾其在世界的发展历程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民族、性别、种族、宗教、性取向、年龄、消费者选择及社会偏好等政治议题不同，有关阶级意识的探讨少得可怜，除了把它视为先前社会（如古欧洲）的“遗物”之外，绝大部分情况下当权者都选择否认阶级的存在。

很显然，阶级身份和种族身份一样，也是多种多样的、互相重合的。我是一个工人，但是我的养老金是投资于股票市场的，我凭借辛勤劳动而拥有了一套住房，并且我可能会把它转手从而可以享受房价上涨带来的收益。阶级是一种角色，而不是某个人身上贴的标签。我们总是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但是我们对此并不言明，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总是同时扮演着司机和行人的角色，围绕着司机和行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无法使得城市更和谐更美好。资本家的角色就是利用金钱来支配工人和其他资产，并利用这种支配权获得利润、积累资本，进而扩大自己对财富和权力的掌控权。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要面对资本家和工人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也要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约束。与此前对阶级问题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不同，我们希望通过一场革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理念——阶级关系完全就是多余的。一个没有资本积累的社会在本质上和一个没有汽车



的城市没有差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不划分阶级，和他人一起并肩劳作呢？

因此，在七大活动领域共同演化的过程中，绝对平均主义和其他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阐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同时，使得问题复杂化了。当平均主义所承诺的个人自由被一些制度，如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所削弱时，就像与自由主义相关的理论或实践提到的，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正如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曾指出的，约翰·洛克在 17 世纪提出的个人权利自由理论为不平等打下了基础，这种不平等是指正在形成中的所有者阶级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者所组成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哈耶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自由与不平等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提出，在国家暴力（他指的是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面前，保障绝对平均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将私人财产权不容侵犯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核心。要想对资本积累和阶级权力的可持续发展发难，首先必须对哈耶克提出的这个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观点正面出击。因此，在制度安排方面，为了保证以绝对平均的方式实现绝对平均主义，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财产观念——公共财产权，而不是私人财产权。所以，围绕制度安排而展开的斗争将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市场中所遵从的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在我们深入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隐秘之处”时被打破了，在建筑工地、在矿井下面、在农田、在工厂、在办公室及零售店里，所谓的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消失不见了。因此，自治运动坚持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对于任何反资产阶级力量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工人自治、工人自我管理的主张可谓恰逢其时。当我们试图把绝对平均主义原则和日常生活的管理联系起来时，也是一样的道理。面对私人财产权和市场规则，绝对平均主义导致穷人无家可归，富人却住在奢华的封闭社区中。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应有之义。

对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的检视向我们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著名的绝对平均主义原则是如何被践踏、丧失价值的。对此我们并不应该觉得奇怪。私人财产权和全心全意捍卫和保护这一制度安排的政府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虽然说是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死存亡。《联合国人权宣言》并不能杜绝不公平的结果，使得拥有民主和政治权利与拥有经济权利之间的差别成为权利争夺的雷区。对此，马克思曾写道：“人们被迫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做出选择。”不管怎么说，阶级斗争变成了对绝对平均主义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们必须想办法切断绝对平均主义和私人财产权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提倡公共财产权和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研究的重点现在应从绝对平均主义转移到制度框架中来了。举例来说，城市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打造一个新城，这里没有那些过于私有化、过于排他性的东西（这往往是和国家所有权或私人财产权联系在一起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里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接近或者享用这些东西的。

同样，我们有必要按照工会、自治组织、合作社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组织所倡导的思路，重新思考绝对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劳动过程的运转之间的关系。争取绝对平均主义还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自然不应该再被视做“一个巨大的加油站”——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用这种说法来表达他对人类所作所为的不满，而是应该被看做很多须要被保护、被照顾、被尊重、体现其内在价值的生命形式的发源地。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自然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商品，也不应该把它看做为我们提供原材料、矿藏、水资源、排污地等的一个期货市场，更不应该仅仅为了实现租金、土地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而应该认识到，对于大自然，我们每个人不仅有权利向它索取，而且同样都应该承担各自的义务。



如果我们能够转变观念，改革我们现有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框架，敞开心胸接纳其他政治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只是海市蜃楼的东西很可能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那么，观念的转变能否改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呢？

以新的视角看待经济问题

2008年11月，伊丽莎白女王参观伦敦经济学院时曾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测到了金融危机的爆发？”6个月后，英国皇家学院的经济学家给她写了一封类似道歉信的东西，信中写道：“亲爱的陛下，虽然说有很多理由使得我们没能预测到危机的爆发时间、波及面和严重性，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没能意识到整个系统存在的风险。”他们承认“太一相情愿、无视一切了”。每个人，甚至可能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是“拒绝承认的心理”占了上风。在大洋彼岸，《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用类似的口吻写道：“我们碰到的是几十年不遇的投机性经济和金融危机……那些穷尽其毕生精力研究经济的人基本上都没能预测到它的到来。”但是，美国的1.3万名左右的经济学家却不愿意为自己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集体犯错是因为他们对复杂的数学模型过于痴迷，不愿意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找思路，正是这一点打垮了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部分同意萨缪尔森的观点，他写道：“经济学家们误入歧途了，因为他们整体都把美好、令人过目难忘的数学错误地当成了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里在写给女王的公开信中用词更苛刻：“经济学家已经变得越来越自大、狭隘、头脑僵化。”

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针对经济学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现任主任萨默斯在谈到 1987 年股票市场崩溃，政府对金融机构施以援手所产生的影响时，就很清楚地看到这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但是他认为政府袖手旁观产生的后果可能比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救助的结果更糟糕。政府的政策不是要杜绝而只是降低道德风险。不幸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当萨默斯出任财政部长时，他完全忘记了这番分析，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进行任何约束。就像他之前的分析，这可能会毁掉整个经济（他是言行不一的范例）。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 2004 年，就曾警告说有可能在 5 年之内爆发经济危机。但是，主流观点站在伯南克这一边，当时他还没有当选美联储主席，当时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完善已经降低了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使得衰退发生的频率和危害都大大降低。这也是“华尔街党”的看法。现在，我们只能希望伯南克 2009 年 8 月认为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的预言能够成真。

任何想法都会带来一定的后果，错误的想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依据错误的经济学思考做出的错误决策不仅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而且使得我们看上去无法从萧条中走出来。尽管关于哪些政策出了问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人们一直认为，解析危机所使用的知识架构须要进行变革。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承担了这项工作。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很显然，凯恩斯式的政策工具毫无用武之地了，强调供给的理论，以及对微观市场行为建模的方法取代了凯恩斯式的对宏观经济进行整体把握的思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占据主流的货币主义观点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现在也碰到了麻烦。

为了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理念。在知识生产常常会出现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情况下，这些新的理念是什么？谁会最先提出来

呢？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学者的新自由化、企业化主张相关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理念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觑。例如，如果不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对金融系统、银行部门、国家-金融节及私人财产权应该采取哪些“动作”这个问题根本就无从提起。这要求包括学者、媒体、政府及金融机构自身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转变思维方式。

马克思虽然并不接受唯心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依然承认思想意识是历史的重要推动力。毕竟，对世界的认知是他的革命性变迁理论中提到的 7 个范畴之一。因此，在认知支配的自主发展和内部矛盾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撰写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一起）、《资本论》在内的大量著作。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及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虽不完整但系统的批判。但是，正如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只有当这些批判性的思想落实到制度安排、组织形式、生产系统、社会关系、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时，世界才会真正改变。

既然马克思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他的思想就必定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这毫无疑问就会引发他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为他们服务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冲突。马克思的思想成为被压制和排挤的对象，最近几年尤其如此，这一事实表明，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些主张仍然太危险，无法接受。尽管凯恩斯再三强调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他周围有很多人都读过马克思的书，并且对凯恩斯产生了影响，他的同事、同为经济学家的罗宾逊夫人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马克思的基本理念及辩证推理法持反对意见，但是对于马克思的很多精妙的结论，他们还是认可的，并且从中大受启发。在我看来，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的颠覆性的思想，就不会有凯恩斯革命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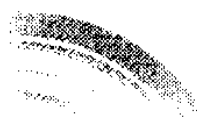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凯恩斯是谁，他到底站在哪一条战

线上，对于马克思更是几乎一无所知。对批判性或激进思潮的遏制给学术界及大众带来了一个很可悲的结果，本质上无异于让那些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银行家们利用使他们泥足深陷的工具来扫除所有的障碍。紧紧追随后现代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的主张，即忽视整体或大方向，只强调个体或局部，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局部或者个体是极其重要的，举例来说，那些忽视事物在地理方面存在差异的理论可能比一无是处还要糟糕（对此我前文曾再三强调）。我确信，伊丽莎白女王更愿意听到，已经投入大量精力，希望可以把事态的发展方向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方式描述出来。

但是，现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素质并不足以承担这项集体性的任务。对于萨缪尔森提出的经济学家应展开自我批评的说法，似乎也很少有人愿意响应。大学里仍在开设那些毫无用处的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政治理论相关的课程，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那些自吹自擂的商学院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两门和商业伦理相关的课程，或者教学生如何从他人的破产案例中寻找获利机会的课程。毕竟，危机的爆发源于人性的贪婪，对此我们完全无计可施！

很显然，现在的知识结构存在功能障碍，而且是不合逻辑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新一代学生有足够的洞察力（从更宽泛的角度说，他们渴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样的），从而他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坚持到底扭转这一局面，这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与历史上的很多重要时刻一样，认识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他们从媒体了解到的事情存在偏差的学生们，通过发起运动的形式，决定要对此做点什么。从德黑兰到雅典，再到欧洲很多城市的大学校园，这类运动的迹象很多很多。

由年轻的学生们发起的革命运动（这类运动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问题）是使得我们的认知发生转变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认知转变才能



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案，解决当前面临的增长问题。我们首先要牢记的一点，就是要想建立一个可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道德的、不存在剥削的、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绝不可能的，这些要求都是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相矛盾的。

■ 弱势群体的反抗运动

如果所有心存不满者、社会异类、被剥削者，以及一无所有者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资本家大联盟，结果会怎么样？事实上，这些人站出来要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合理权利的情况已经时有发生。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关注这些人的诉求，并且思考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心存不满者和社会异类主要是这样一群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者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至于有这种想法的理由，则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学家在内，都把环境的制约看做不可逾越的。把世界经济和世界总人口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是他们追求的长期目标。有必要创建新的和自然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对日常生活、城市化、主流的社会关系、生产体系及制度框架进行彻底重构，这还要求我们对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别给予足够的关注，必须创造出新的环境和新的地域来替代旧的。技术发展的路径也很可能要做出调整，从强调庞大和军国主义向强调“小的就是美的”及“少就是多”式的消费主义转变。这一切和资本家数量以复合比率增加相矛盾。

出于不同政治立场，或者从道德角度考虑，反对大众贫困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人，很可能会和反对独裁主义、专制统治、金钱至上等政策的人结成同盟。另外，为了摆脱种族和性别歧视，消除对那些和我们的生

活方式、文化背景、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的敌意，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还要做出很多调整。但是，如果不能根除日常生活、劳动市场和劳动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的话，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资本积累所依赖的阶级不平等通常以民族、性别、种族、宗教和地缘关系的形式体现出来。

因为有了革命理论的武装，被异化和心存不满的知识分子对深化有关如何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争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构造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来说明革命性政治转变为什么一定会出现，以及将通过怎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很好地表达出人们对应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活力，以及从复合增长率引申出的系统性问题的关注。破解资本的秘密，把统治阶级讳莫如深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任何革命性战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要想让这些主张具有实际政治意义，被异化的和心存不满的知识分子还必须和那些参与到资本积累和周转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所有物质、文化、自然方面的资源，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劳动条件和生存状况都深受资方影响的人团结在一起。

这并不是说让被异化和心存不满者来告诉一无所有者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这些社会异类、对当前统治不满的人，能做而且必须做的，是找出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根源。政治运动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上去似乎带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却发现这些东西很快就被纳入到了资本家再生产的主流活动中。回忆一下，历史上各种工人合作社或者参与式预算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主流活动才是值得强调、关注的点。清楚地揭示出这些主流活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创建全新理论的关键。

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那些在资本或资本家政府的掌控下劳动，却被剥夺了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人；另一种是那



些为了给资本积累让出空间，而被剥夺了所有财产、生活资料，甚至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人。

第一种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马克思主义者笔下的无产阶级形象，他们激烈抗争，解除了戴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枷锁，成为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战士。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属于这种类型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他们迈进工厂的大门或来到矿井下面时，对他们的剥削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他们在公共场合的一些集会，对于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体停止出卖劳动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

认为工厂工人是具有“真正的”阶级意识的人、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发起者的观点往往太狭隘了，有时候甚至会误导人们。在森林和田间劳作的农民、在非正式单位工作的临时工、家政人员或者更一般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及在城市扩张、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庞大劳动力大军绝不能被看做二级演员，他们的工作条件各不相同（如果是建筑工人，则通常来说工资很低，工作大多是临时性的，没有什么保障），他们流动性比较强，比较分散，各自的就业条件也差别很大，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实现阶级团结，也很难形成某种形式的集体组织。他们参与政治的方式是自发地发起暴动或者起义（如最近巴黎郊区人民的骚乱，以及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爆发的示威者运动），而不是成立永久性组织。但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对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粗暴干预感到非常不满。

现在人们口中通常所说的“不安定因子”（强调这些人就业和生活方式的不稳定），在劳动力大军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过去30年间企业重组及去工业化浪潮带来的劳动关系的改变，他们的重要性和以前相比甚至进一步提升了。

忽视其他劳动者的抗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很多革命运动都把整个城市牵扯了进来，而不仅仅局限在工厂里（如1848年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列宁格勒战役，1918年的西雅图大罢工，1969年的图库曼骚乱，1968年的巴黎、墨西哥城、曼谷，1989年的布拉格，2001—2002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革命的主战场是在工厂里，如20世纪30年代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大罢工，以及20世纪20年代期间成立的都灵工人委员会，其他地方的工人有组织的声援活动很少为人所知，但仍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弗林特罢工得到了妇女及失业人群的支持，都灵则出现了一个名为“人民之家”的公社组织。

传统左派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忽视了工厂及矿井之外出现的社会运动浪潮。和工厂一样，在街道、酒吧、俱乐部、教堂、社交中心及工人阶级聚集的社区里，人们的阶级意识都觉醒了。很有意思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做出的最初的两个决定，一个是面包店取消夜班（属于劳动过程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拒绝支付租金（属于城市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城市和工厂一样，都是阶级运动的发源地，要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性转变构筑一个广泛的联盟，我们必须从整个城市而不仅是工厂的范围和水平来看待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形式的农村和农民运动。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受剥削者，他们的构成及阶级成分相对来说要复杂得多。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被剥夺而聚集在一起。通常来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被剥夺”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属于这一类的人员名单很长，蔚为壮观，它包括所有不管是通过合法（及通过国家征用土地的形式）还是非法手段，通过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途径，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被剥夺了自然资源所有权、被迫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到市场交换（与物物交换或者日常



交换形成对照) 活动中的农民或者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土地由公有向私有的转换标志着这个过程的结束。土地本身开始成为一种商品。这种形式的剥夺现在虽然也可以看到, 但是主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采用, 它在现代衍生出很多类似的形式。例如, 资本家通过城市化进程, 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低收入人群手中的高价土地。在私人财产权受保护程度不够的地方, 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违章居留地, 利用国家权力强行占有低收入群体土地而不给予任何补偿的事情常有发生。即便是在私人财产权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政府也经常代表私人资本征用他人的土地。另外, 经常会有人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向穷人们施加经济压力, 即不断上涨的财产税和租金。有时候看上去似乎有人有计划地要让低收入群体或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群体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一样。

但是, 信贷系统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侵蚀他人资产的最重要的杠杆。为了为那些有钱有权者剥削他人提供便利, 任何形式的掠夺性活动(比如, 信用卡的高利率, 在关键时刻拒绝向企业提供资金从而迫使他们放弃抵押品的赎回权, 等等), 包括法律在内, 都可以采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金融化浪潮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劫掠。抬高股价和操纵市场; 庞氏骗局和公司欺诈; 提高债务承受能力, 使得每个人, 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 都负债累累; 剥夺他人的资产(因为股市崩溃或企业倒闭给养老基金带来的损失)——所有这一切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通过剥夺他人权利, 一种全新的积累机制也就形成了。例如, 借助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 即通过了所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将一些生物物质都作为私人财产, 因而可以向大众收取使用金, 全然不顾大众的活动本来在这些生物物质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物剽窃活动极为猖獗, 窃取世界遗传物质储备的事件时有发生, 制药公司坐收渔利。把文化、历史、智力创造活动等转变为商品进行出售, 是对

人类过去及将来的创造力的剥夺。流行音乐因为剥夺了草根的文化和创造力而声名狼藉。不幸的是，这种剥夺使得相关创造者遭受了经济损失，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社会网络的断裂及社会团结的瓦解要严重得多。很多的社会关系不是用金钱就能够弥合或者重建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危机所扮演的角色。毕竟，危机说到底不过是对人们资产（既包括文化方面的资产也包括有形资产）的大范围剥夺。毫无疑问，富有者和贫困者一样都遭受了损失，比如，一些人放弃了住房抵押的赎回权，而另一些人因为麦道夫疯狂的庞氏骗局而丧失大笔金钱。但是，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财富和权力在阶级内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因为银行破产而大幅贬值的资产被那些拥有充足资金的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并重新投入资本周转过程以赚取利润。因此，过剩资本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沃土，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和周转。

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可以对危机进行引导、管理和控制，把资本主义这个非理性的系统理性化。这正是国家主导的紧缩计划，即借助利率和信用体系的主要杠杆，所希望做到的。受到控制的危机在外力作用下可能会在某个部门或者某个领域爆发，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长，其结果就是，某只在某个时期贬值的股票，或者更一般的情况下，世界各地被低估了的资产，被那些有着大量剩余资本，但是缺少投资机会的人用来谋利。这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情况。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问题。

利用国家政策和企业的集体行为点燃危机的导火索是一个很危险的游戏。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次危机是一些人有意而为之，但是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颇具影响力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秉持机会主义信条的企业家，他们认为，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来一次成功的创造性毁灭，从而保证资本主义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能够重新形成一个资本

家阶级。他们坚信，政府通过刺激性政策工具或其他手段试图避免危机的做法是误导性的，在他们看来，到目前为止，更恰当的做法是让市场主导的“结构性调整”过程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这是一剂很有必要的药方。资本主义离死神越近，治疗的过程就越痛苦。当然，关键是不能让“病人”真的死掉。

■ 有组织的变革运动

对于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任何运动而言，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斗争力量和那些被剥夺了文化、政治、经济资产的人结成统一战线似乎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我们梦想有一天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可以团结起来，目标则是为了所有人的长远利益，控制过剩产品的组织、生产和分配。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要解决面临的两个主要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很多剥夺他人资产的行为和资本积累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它们也不一定会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大清洗、北爱尔兰的宗教大清洗、20世纪90年代早期孟买爆发的反穆斯林骚乱，以及以色列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和饮用自来水的权利，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如果移民、同性恋者或不同肤色的人取代之前的居民，成为城市的主流，那么后者也可能会进行反抗。大部分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喜欢或不喜欢谁，谁有权利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地球上生存等问题展开的。安全问题、对他人心存畏惧、社会偏好和偏见等对于不同社会团体争夺空间、资产的冲突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各个社会团体及个人都希望某物或者某地是他们专有的。由此可以得出的推论是，人人都担心归自己所有的东西被他人剥夺。

并不是所有抗议自己的财产被剥夺的激进运动都是反资本主义的，例

如，在盲目自大的学术精英、贪婪邪恶的华尔街银行家（往往会错误地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教唆下，美国老一代白种男性工人就对少数民族、移民、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者社会地位的提升感到非常愤怒。自奥巴马当选总统以来，极右翼势力和武装组织发起很多可能引发 1995 年俄克拉荷马州大爆炸那样的事件的运动。显然，这些人无论如何不会参与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尽管他们对银行家、企业家、精英人士，甚至美联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很不满），他们不过是代表那些感到被社会抛弃、被剥夺了某些权利的人发起反抗，希望不管用什么办法，有一天可以重新夺回他们热爱的这个世界。

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为资本家剥削他人提供了可能。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很多城市，房地产业的暴利行为广泛流行起来（现在仍有这样的情况），具体做法就是把黑人家庭介绍到此前完全是白人的居住区，希望引起白人的恐惧和抗议，由此导致的房屋价格的下降为投机者低买高卖创造了机会。感觉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白人的反应不一，有人进行暴力抵制（如烧毁打算搬到白人居住区的黑人的房屋），有人的反抗要温和得多（在民权法的范围内争取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些人则尽可能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

第二个难题是，有些剥夺行为是必需的或者是有进步意义的。任何革命运动都要想方设法剥夺资本家手中的房屋、财富和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剥夺”的整个历史图景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尽管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采用的暴力行为可能看上去令人憎恶，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剥夺了封建专制机构（如君主专制或者教堂）的权力，解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开创了新的空间，而且通过交换关系使得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推动了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革，打破了原来那个建立在无知和封建迷信基础上的世界，代之以文明开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把整



个人类从物质需要中解放出来的潜能。如果不是一些“剥夺”行为，前述种种根本不可能发生。

当然，资本主义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关于这一点，最近几年争论很多）。不过，即便如此，依然可以把通过剥夺他人完成资本的积累，即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看做一个必经的过程，因为要想建立资本主义或者其他替代制度，如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就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举例来说，对于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被毁掉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其即便有价值的话也是很低的，他也没有像现在的一些人所做的那样，要求恢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者生产形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积极的那一方面的基础上的。这些积极的方面包括土地改革运动、民主政府的出现（在后来往往会被权钱交易玷污）、言论自由及民权法案的制定。

尽管捍卫自身权利和财产不被剥夺的斗争为激进运动提供了温床，但是革命的关键不是要保护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是直接对阶级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发起攻击。

如果我们不能转变观念，摒弃一直以来持有的信条和偏见，放弃平时享受的一些便利和权利，遵守新的社会秩序，转变我们的政治和社会角色，重新调整我们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改变我们的一些行为，从而更加符合集体和公共愿景的要求，革命性巨变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变，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处在共同演化过程中的其他几个活动范畴也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选择回避这些问题，而不是直面它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认为这一切可以以和平、自愿的方式完成，我们进行自我剥夺，主动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会阻碍一个更加平等、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的东西，这种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是这种想法，即认为事情会和平演变，不需要任

何斗争，甚至不需要任何暴力行为，也是极不切合实际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提到的，资本主义经历了水火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说在从资本主义中摆脱出来和融入资本主义两者之间，我们可能更适合完成前面这项工作，但是要想到达目的地，根本不可能有和平的路径可走。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剥夺”是发生更积极的转变所必经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的剥夺。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的传统，在那些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剥夺或者强占人们的资产通常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某些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通过暴力手段完成，比如，斯大林就曾强行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即消灭富农。与此相关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也不一定是美好的。

最近几年，针对剥夺和强占，而不是劳动过程的造反运动都是反共产主义的。某些时候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考虑到这些运动斗争的本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仅仅是出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资本主义社会对剥夺的反抗斗争多种多样，令人吃惊，甚至都很难想象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尼日尔三角洲奥甘尼族人认为壳牌石油公司降低了他们土地的价值，并因此发起反抗；针对生物剽窃和土地强占的农民运动；针对转基因食品和当地生产系统真实性的抗议活动；要求保护当地人享有森林资源、限制伐木公司的行为的斗争；反私有化浪潮；发展中国家要求保障工人和妇女应享有的权利的政治运动；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存环境免遭破坏而发起的社会运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紧缩开支的主张；反对世界银行支持的在印度和拉丁美洲修建大坝的项目。以上种种只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席卷世界各地并牢牢占据媒体的新闻头条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运动最后基本上都被国家以维持社会“稳定和有序”的名义通过暴力手段瓦解了。



■ 五种革命力量

针对剥夺行为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大行其道，但是不管是从地域范围，还是从它们的发起原则、所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来看，都只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它们内部常常会存在冲突，举例来说，当本地居民希望夺回某个地区土地的所有权，而环保专家认为那里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时，革命运动内部就产生了矛盾。一部分是因为孕育了这些革命斗争的发源地在各种条件方面存在差异，这些斗争的政治导向和组织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别。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动因是人们对失去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对其文化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感到极为不满，但是起义者并没有打算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或发动政治革命。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用一种更加开放、灵活的态度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满足他们特定的文化诉求，让他们重新获得被尊重的感觉。起义者们拒绝组建一个政党，相反，他们选择以墨西哥的一支武装力量的形式存在，希望尽自己的努力保护他们的本土文化，使之处于核心位置，而不是成为政治的附庸。

这类革命运动的普遍效应是把政治组织表现形式从传统的政党或工厂里的劳工组织转换成了不那么受人关注的一股政治力量，但正是这股力量为在整个民主社会内部掀起社会运动注入了动力。于是，形成了一种与历史上围绕劳工运动建立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组织模式。这样一来。两种形式的剥夺行为就形成了相互冲突的目标和组织形式。

关于如何解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金融危机，在左派内部存在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缘于激进革命的历史，以及左派政治理论的宗派主义一直存在。左派人士并没有忘记，19世纪7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的决裂，托洛斯基分子和正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决裂，希望掌控国家政权的集中力量和秉持反国家统治论的自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大了，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如果这些人都得了健忘症也许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革命环节及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之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活动整体来说还是经历了一些激烈的变革。政治斗争的战场，以及可以实现的政治可能性，不管是从空间来说，还是从组织方式来看，都发生了转变。

第一股革命力量来自非政府组织。现在，大量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却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踪影。这些组织有的是政府资助的，有的完全是私人发起的，其成员主要是信奉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和组织者，关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单一的，如环境、贫困、妇女权利、反农奴制度和交通问题，虽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但是他们并不和资本主义进行正面对抗。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是积极的新自由主义者，投身政府福利职能的私有化，推进机构改革，希望借此帮助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加入到市场活动中来（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或小额融资项目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虽然说非政府组织中有很多激进、专注的参与者，不过他们的工作取得的成效不过尔尔。整体来说，大的突破和进步很少，尽管在某些领域，如妇女权利、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等，他们确实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为人类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要想依靠非政府组织发起革命性转变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组织的出资人所秉持的政策和政治主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虽然他们帮助进行反资本主义的尝试，但是他们却并没有阻止将这些尝试重新纳入主流资本主义实践的行为，他们甚至还鼓励这种行为。现在，非政府组织的集体力量反映他们在“世界社会论坛”中所发挥的作用，过去10年来，这个论坛一直致力于追求创

造一个公平的世界，希望可以推行新的主张替代新自由主义。

第二股革命力量来自无政府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和草根组织，他们拒绝接受外部资金的帮助，即便他们中的一些确实不是以资本主义作为制度基础的，如天主教会，其“基层社区”最初在拉丁美洲，后来扩大到美国内陆城市的教堂资助。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事实上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例如，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尖锐地称为仅仅生活方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存在矛盾。但是，他们都对与政府协商这种方式表示反感，都强调变革应该在民主社会这个范畴之内进行。在日常碰到的各种情形中，这些人自我组织的能力是建立任何反资本主义机制的基础。水平型组织是他们选择较多的组织模式；建立在物物交换、集体和当地生产系统基础上的所谓的“合作经济”是他们偏好的政治经济形式。他们通常都反对有必要做出中央指示的观点，拒绝等级制的社会关系、等级制的政治权力结构和传统的政党组织形式。这类组织随处可见，在某些地区，它们甚至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中有些人是站在反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有时候会鼓励消极怠工或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动，这与他们受到意大利“红色旅”极端组织、德国恐怖组织、美国20世纪70年代甚嚣尘上的地下气象组织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但是，除了行为更加暴力之外，这些组织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因为它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把行动提升到足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层面。不过，毫无疑问，这些组织还是为反资本主义尝试提供了广泛的根基。

第三股革命力量来自转型后的传统劳工组织和左派政党，从社会民主传统到更激进一点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党组织。他们并不排斥国家权力和实行等级制的组织。事实上，他们把后者看做一种必要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治组织的融合。在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如日中天，甚至在美国也颇具影响力的年代，国家对剩余的分配成为消

除不平等的一种重要工具。没能控制剩余的生产，从而不能真正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构成挑战，是这个政治派别的死穴。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所带来的进步，尽管很显然现在重新回归这个政治模式、回归社会福利主义和凯恩斯的经济主张是远远不够的。

过去30年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劳工组织还是左派政党都遭到了沉重打击。他们都被说服或者被强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正如我们之前曾提到的，对待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场宏大的、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的将剩余产品私有化，或者至少组织它们进一步社会化的运动。

虽然劳工组织和政治左派的力量都有逐渐复苏的迹象（这与英国首相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提出、被欧洲很多社会民主党效仿的“第三条路”形成了对照），虽然世界各地都显露出更激进的政党的出现已在酝酿之中的信号，完全依靠工人的力量还是不行的，正如左派的能力也没有强大到可以获得政治力量，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去处理资本积累的動力不足这个问题。德国绿党执政以来的表现和作为与在野党时相比并没有显著的改进，而社会民主党则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应有的作用。但是左派政党和工会的地位仍然很突出，他们（如巴西的劳动党，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运动组织等）控制了某些方面的政权，这个事实不仅影响了拉丁美洲，而且影响了所有左派的思考方式。

之前提到的共同演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不能夺取国家政权，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对当前保护私人财产权、市场制度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宪法和制度框架进行修改，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与货币、贸易、谁应该拥有领导权等相关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问题同样不能只依靠局部的社会运动来解决。如何对国家-金融节的结构进行调整，如何处理货币在衡量价值时充当着一般等

价物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些都是建立一个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

第四股力量由符合如下条件的所有社会运动组成：他们不受任何特定政治哲学或主张指引，而只是出于抵抗（通过乡绅化、自来水私有化、消除公共服务和公共教育机会等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朴素的诉求。他们关注城市、乡镇，以及其他为反抗国家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危及弱势群体利益提供了现实土壤的地方的日常生活。

同样，可以划归到这一大类的社会运动非常多，其中一部分可能会逐渐变得激进起来，随着他们越来越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系统性的，而不是特定的和局部性的。所有这类社会组织联结在一起，这提醒了我们或许可以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战线，来讨论和解决乡绅化、修建大坝、私有化等诸如此类的特定问题背后隐藏的系统问题。虽然遵循现实主义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引，这类运动组织还是能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系统思考。因为组织的成员大多位于同一个地方，如在大都市中，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再结合自身经历，他们逐渐意识到了是什么维持着资本主义的运转，如果他们团结起来，结果会怎样。在这方面，20世纪初著名马克思主义作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反复提到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通过痛苦的亲身体会来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会在更一般的层面形成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更有发言权。聆听巴西的农民领袖或印度反对企业强占土地运动的领导人的讲话，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受教育机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听众”的任务则是放大那些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人的呼声，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剥削和压迫得以存在的条件，以及消灭它们的办法，并把这些思考贯彻到反资本主义运动中。

第五股可能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是围绕身份问题进行的解放运动，不

管是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少数民族群体、少数种族群体，还是宗教少数分子，都希望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样的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而且人们往往根据他们的诉求从地理上对这类活动进行分类。但是，世界妇女大会（1985年的内罗毕会议推动了1995年通过的《北京宣言》的达成），以及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2009年在德班召开的会议上分歧则大得多）则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各自的共同点，而且毫无疑问，不管是从保护妇女权利，还是从反种族歧视角度衡量，至少在世界的部分地区，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从本质上来讲，这类运动对阶级斗争可能是一种阻碍。但是，全球劳动力的贫困化、随处可见的贫困者的贫困化、把性别歧视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工具的做法，这一切使得把妇女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成为了增强阶级斗争的战斗力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其他形式的身份符号。种族主义、对妇女和儿童的剥削和压迫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条件。不过，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现在，即便没有了各种歧视和剥削行为，资本主义也不会灭亡，而且随着一个更加团结的阶级的出现，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歧视的能力一定将被大大削弱，即便不是完全丧失的话。企业界，特别是美国企业界对多元文化及妇女地位的提升表现出来的宽容，证明了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接受社会关系在这些方面发生一些转变，虽然他们仍然再三强调突出阶级划分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

前面提到的这五股革命力量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政治活动的组织模式也并不是只有这五种而已。有些组织就是通过从这五股力量中各取一部分，然后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但是，要想把这些力量结合在一起，用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在物质、社会、精神和政治层面做出一些转变，做到既能改善很多地区已经出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悲惨关系，又能实现以复合

增长率的长远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对现状心存不满的人需要不停地反复思考、提问，尤其是当他们希望从那些亲身经历各种痛苦的人、对复合增长带来的恐怖后果极其抗拒的人那里学到什么的时候。

■ 新世界的呼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使用了共产主义者这一说法，共产主义者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只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弱点、死穴，以及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主要通过媒体）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而给资本主义蒙上的神秘理论面纱，以及荒谬的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共产主义者指的是所有努力奋斗希望实现一个与资本主义所预示的结果截然不同的未来的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定义。虽然说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太美好了，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根据这个定义，会发现我们周围有很多活生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信仰，随时准备为推翻资本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真的如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全球化运动所宣称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能说另一个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呢？如果要实现重要的变革，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条件需要这一类主张。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这个词语是如此沉重，以至于很难把它重新引入政治表述中。在美国，做到这一点的难度要大于法国、意大利、巴西，甚至中欧国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或许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我们的运动定义为反资本主义运动，或者称我们自己为“愤怒党”，目标是打败“华尔街党”和他们在各地的走狗和附庸，任何诸如此类的说法都可以。追求公平的革命斗争不仅仅还在继续，它开始改头换面了。

当人们对一个看上去全能的资产阶级利益社会心怀不满和愤怒时，必然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跨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政治运动。

为了理解这个过程的政治必要性，首先就要解开资本的秘密。一旦罩在资本上的面纱被撕开，资本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很容易就能看出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如何去做。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自行灭亡，只能依靠外力来推倒它。资产阶级永远不会主动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必须有人主动去对他们进行反抗。

为了做到应做的事情，需要意志、决心、耐心和技巧，同时还需要对经济以复合增长率增长给人们的生活、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所带来的影响做出政治承诺。针对这一使命的政治动员过去曾经出现过，未来也一定会再次出现。